

临沂市在山东省的位置

临沂市政区地名图

临沂城市名片

LINYICHENGSHIMINGPIAN

全国文明城市

东夷文化发祥地

战争年代华东暨山东解放区首府

全国双拥模范城市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全国红色旅游重点城市

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市

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地区

中国市場名城

中国地热城

中国书法名城

国家园林城市

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国家卫生城市

图例



市 政 府



县(市、区)政府



乡、镇(街办)



铁 路



高速公路及道号



国道及道号



省 道



县 道



省 界



设 区 市 界



县(市、区)界



2013 · 07, 4

主 办：临沂市地方志办公室
协 办：临沂市地方志学会
临沂市望族文化研究会
临沂大学沂蒙文化研究院
编委主任：赵爱华
编委委员：徐福田 李克彬 秦鸿伟
何相军 赵建民 王长利
赵宗远 王培栋 刘兆东
李凤军 王泽远 孙建中
李延杰 曲文军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胡拙安
钱 进 尹传贵 王士岭
顾怀亮 杨沂成 卢廷运
李忠山 董保东 韦瑞芳
朱海涛 王瑞柱 伊永航
于 芹
主 编：朱海涛
副 主 编：曲文军 刘兆东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本期执行主编：呼国英
责任编辑：杜 帅 宋希芝 贾 梦
孟玉玉
美术编辑：胡拙安 宋夏娟 周轩正
编辑出版：《沂蒙史志》编辑部
刊 号：鲁连内资第Q1023号

目 录

【本期特载】

黎玉在沂蒙 辛鸿义 04

【峥嵘岁月】

临郯费峰四县边区抗日锄奸纪实 穆振昂 07

沂蒙大队天目山区剿匪记 尹作让 13

【史海撷萃】

吾乡
——《昨天的云》节选 王鼎钧 16

【文化掇英】

“伏羲女娲”在临沂汉画像石上的形象特征（上）
桑玉厚 20

【蒙山沂水】

平邑：六崮景观美沂蒙（上） 李 莹 25

【名人素描】

战斗在沂蒙山区的抗战老英雄
——范明枢传奇 牛之营 30
封面人物——王羲之 唐士文 38

【古城旧事】

老城夜话（连载） 刘家骥 40

【探索发现】

平邑汉阙形制及阙身画像浅释 李常松 46

	费邑曾氏奉祀生	李洪廷	51
【影像沂蒙】			
	抗战时期沂蒙略影——		
	军民鱼水情	本 编	54
【诗画赏析】			
	沂河千里碧 灵韵诗情长		
	——《沂蒙诗话》之八续二	李兴河	56
【百家渊流】			
	姓氏百家漫谈——杨姓（下）	赵丹峰	61
【史料辑存】			
	中国共产党在临沂最早创办的警察学校		
	根据刘少儆口述整理		65
	沂蒙山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序列表（上）	高 雷	68
【沂蒙名医】			
	圣洁祥云		
	——王圣祥“自传”	刘凤才	70
【沂蒙乡亲】			
	管虎：电视剧当饭吃 电影当酒喝	高雪萍	77
【史志动态】			80

封面：临沂人民广场雕塑·文韬武略之王羲之

封底：书法/胡石



地 址： 临沂市北城新区
天元商务大厦634室

邮 编： 276000

电 话： 0539-8727560

邮 箱： yimengshizhi@163.com
szbyw2010@126.com

博 客： yimengshizhi.blog.163.com
blog.sina.com.cn/u/1914056311

网 址： <http://www.linyisq.gov.cn>
《沂蒙史志》栏目

印 刷： 临沂玉峰印刷有限公司

黎玉在沂蒙

辛鸿义



黎玉是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县）人。到山东之前，以中共河北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在中共直南特委工作，先后兼任直南特委书记和冀鲁豫边特委书记。1936年，奉中共中央北方局之命，到山东恢复重建遭敌人严重破坏的中共山东省委，并担任省委书记，赵健民、林浩为委员。随后又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与分散在山东各地的500多名共产党员取得联系，并通过他们，积极而稳步地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仅一年的时间，全省就发展党员2000多名。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黎玉根据中央关于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以及北方局关于“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与省委研究，制订出在山东发动武装起义和组织抗日武装的十条纲领，提出建立十个军的规划。之后，派大批干部、党员分赴山东各地组织武装起义。1938年1月，黎玉亲自领导了徂徕山武装起义，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洪涛任司令员、黎玉任政治委员。四支队一成立，黎玉就重视部队的政治工作。在他的建议下，中队设立政治指导员，排、班设立政治战士。同时，成立宣传队和募集队，以扩大抗日宣传和解决部队的供应。

4月，为了确定起义部队今后的发展方向及有关问题，黎玉从蒙山前的万寿宫出发，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高兴地向大家介绍了黎玉，赞扬了山东党的工作，并号召全党，把开创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为工作重点。此后，党中央根据黎玉所反映的山东实际情况，先后派干部到沂蒙地区。其中，5月随省委书记郭洪涛前来的约50人；8月，随黎玉、张经武到来的165人。

1938年12月，山东分局根据中央决定，在沂水县的王庄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的指挥机关，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山纵指挥部对分散于山东各地的人民武装

实行统一建制，统一领导，使原来分散的若干游击队，成为在战略上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1939年，根据中央指示，由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治委员的第一纵队成立。黎玉协助徐向前对山纵及其所属部队进行了整军。整军和实战锻炼，有力地促进了部队的正规化，增强了战斗力。同时，部队也得到迅速发展：由原来的2.4万人增加到5万人，编为4个旅、三个支队和两个特务团。

在抗日战争中，黎玉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早在徂徕山起义之前，他就派员到聊城，与国民党山东省第六区行政专员范筑先商讨抗日问题。1938年8月，他到延安汇报工作回来，途经聊城，向范筑先面交毛泽东的亲笔信，使范筑先很受鼓舞，大大地增强了范筑先与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决心。在贯彻统一战线中，黎玉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指使其第四梯队司令王尚志，在太和镇伏击八路军三支队派往沂蒙学习的干部队，杀害干部、战士100余人，制造了“太和惨案”。对此，黎玉和张经武联名通电全国，说明“惨案”真相。同时，组织山纵第三、第四、第八支队各一部，于4月20日，对太河镇发起强攻，将守敌王尚志部击溃。

1940年8月，在青驼寺召开的山东省各界代表联合大会，选举产生了全省统一行政机关——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黎玉当选为主任委员。在他的主持下，战工会制订了《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确定了发展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十四项重大任务。强调各级政府人员要深入民众，倾听民意，贯彻民主作风，纠正任何包办代替现象。会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权发展更加迅速，普遍实行“三三制”。在保证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各党派、无党派的忠实于抗战建国的各类人才，坚持团结爱护，诚心相待，共同合作。对于他们中参加八路军或其他机构的真心抗日人士，则给以优于同级职务的共产党员的特别待遇。一时很多各类专业人才，齐集沂蒙山区，参加根据地抗日和建设。

1941年8月，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指示，以中共山东分局为统一山东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由朱瑞、罗荣桓、黎玉、陈光组成，朱瑞任书记，黎玉主管政府工作。稍后，成立山东省军政委员会，罗荣桓任书记，黎玉等七人为委员。

1942年3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根据刘少奇来山东检查工作时提出的批评和意见，决定加强群众工作。分局设立群委会，黎玉任书记。他亲自派干部到鲁中区沂南县进行试点。在调查研究的的基础上，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取得经验，及时推广到各地，使“双减”运动迅速开展起来。当时开展“双减”的村庄达到50%—80%，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贫苦农民的积极性，更加密切了党群关系。

8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山东纵队改编为山东军区，黎玉任政治委员。冬季，黎玉率军区机关、省战工会和沂蒙军分区一团反“扫荡”，在沂水县对崮峪遭敌8000人包围。他在指挥突围时负伤。第二年3月，山东军区与八路军一一五师合并，组成新的山东军区，罗荣桓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黎玉任副政治委员，萧华任政治部主任，下辖鲁南、鲁中、清河、冀鲁边、滨海、胶东等六个军区。在军区的领导下，山东地方部队和一一五师配合作战4500余次，歼日、伪军9万余人，使山东抗日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与扩大。

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黎玉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8月，山东省政府成立，黎玉任省政府主席。

解放战争初期，罗荣桓率山东主力部队挺进东北，黎玉代理山东分局书记。1946年10月，为截断津浦路，阻止国民党军北上，成立津浦前线指挥部，由陈毅统一指挥。黎玉协助陈毅胜利地进行了津浦线阻击战，共歼敌2.8万人，控制津浦铁路200公里。就在津浦战役进行期间，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华中局与山东分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华东局，饶漱石任书记，陈毅、黎玉任副书记。第二年1月，津浦前线指挥部撤销，组建山东野战军；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黎玉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山东野战



后排左起：陈毅、黎玉、饶漱石、粟裕在沂蒙

军政治委员。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9月1日，根据中央指示和华东实际情况，黎玉主持分局会议，讨论制订出《中共华东中央局关于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的指示》，即“九一指示”。从此山东各解放区普遍开展土地改革运动。黎玉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进行指导。到1947年，山东解放区大部已实行土地改革。分到土地的广大农民，对参军、支前等各项工作，表现出空前的热情。从1947年1月至1948年8月，全省进行的十次较大的战役，农民供应军粮达4亿多斤。

1947年山东进行土改复查。6月下旬至7月上旬，华东局于诸城寿塔寺举行扩大会议，在饶漱石、康生主持下，对黎玉进行不公正的“批判”，又于1948年形成《关于克服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加强纪律性的决议》，给黎玉扣上了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富农路线等不符合事实的政治帽子，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黎玉以大局为重，在遭受巨大冤屈的情况下，继续努力为党工作（1986年3月13日，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对黎玉的错案在澄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彻底平反）。1949年3月，黎玉随华东局南下，从此离开战斗、生活了13年的山东。

1989年，在黎玉逝世三周年之际，由中共山东省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辑、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深切怀念黎玉同志》一书问世。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姜春云写了题为《缅怀·继承·奋进》的代序言。徐向前、段君毅、王从吾、赵健民合写题为《鞠躬尽瘁六十年》的纪念文章。文章说：“黎玉同志为党为人民兢兢业业工作了整整六十年。这是革命的战斗的六十年，是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六十年。他虽然已经逝世，但是，他为共产主义事业无私的奉献精神，却永远激励和鞭策后人，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勇往直前。”



临郯费峰四县边区 抗日锄奸纪实

穆振昂



1939年2月，鲁南特委在大炉开会时留影。前排右1为郯临费峰四县边联县委书记邱励。

193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抱犊崮山区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成立中共临郯费峰四县边区县委和统一战线性质的“四县边联办事处”，简称“边联县办事处”，1941年2月，成立边区抗日民主政府。1941年3月，为进一步加强公安锄奸保卫工作，四县边联县委社会部成立敌后工作站，任命第十一区指导员郑书箴担任敌工站站长，在卞庄、向城一带敌占区做敌伪军工作。这是一项隐蔽性强、风险性大的任务，当时只有郑书箴一人，困难重重，郑书箴经过秘密艰苦的活动，建立联络点，设立联络员，使力量逐渐扩大。在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上下紧密配合，开创了隐蔽战线对敌斗争的新局面。

—

当时鲁南根据地遭受日伪军和顽军南北挤压，日伪沿临枣公路设有十几个据点，不断对根据地侵袭、分割和封锁，致使基本区域日益缩小，敌后交通线面临被隔断的危险。在主力部队地方化的形势下，八路军武装只能靠机动灵活开展游击战争，同时抽调精干武装工作人员，利用各种关系，组成敌后隐蔽战线，深入敌人内部，开展瓦解伪军工作，打击坏中坏。

边联敌工站人员首先利用关系作掩护，深入敌占区，开展政治攻势，教育敌伪军政人员，促其改恶从善，改邪归正。他们经常向敌伪据点周围散发传单，张贴宣传画，或通过

敌占区的区长和其亲友转交信件和宣传品，有时也通过适当的关系，与伪军政人员取得联系，面对面地对其进行教育。开展政治攻势的内容非常丰富，主要是通过事实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及其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揭露日伪“以华制华”、“曲线救国”的阴谋。对这些人进行全国形势和民族气节教育，告诉他们：“日本鬼子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当汉奸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卖命对不起祖宗后代。卖国可耻，救国光荣。为人要为自己留条后路。只有向人民投诚，才是唯一的出路”等等。敌工站在开展宣传教育的同时，利用各种途径，在敌人内部发展关系，建立联络点，使我敌工人员有落脚之地。

1941年5月，边联敌工站首先同向城镇北孙家庄据点宋茂厚取得联系。宋茂厚30多岁，印王山人。刚当伪乡长时，经常骚扰边区县村庄，老百姓对其行为非常愤恨。敌工人员通过其亲友做工作，使其态度有所转变。不久，郑书箴、李其中通过关系与宋见面，开导他：“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民族气节，当汉奸卖国贼是最大的耻辱。不要只看到当前敌强我弱，日军侵华战争是非正义的，最后胜利是我们的。”宋茂厚当面诉说苦衷：“是警察将妻子抓到临沂当人质，我是被迫当的伪乡长。”郑书箴向他指出：“当汉奸既然是被迫的，就不该做对不起乡亲们的事。你也有家，还住在边沿区，八路军经常去，你也应该考虑给自己留条后路”。宋茂厚当场表示，愿意为抗战出力。郑书箴提出三条要求：第一，不许伤害老百姓；第二，及时向我们汇报敌人活动情况；第三，要掩护我们的工作人员。宋茂厚一一答应。后来，鲁南军区二科科长崔梦坡与宋茂厚见面又对他进行教育。此后，宋茂厚便配合我方，提供敌人动向，使边联县的敌伪工作打开突破口，敌工人员可以随便出入孙家庄据点，可以和这个据点的伪军自由闲谈，进而争取了伪乡公所电话员刘茂德，通讯员小孙等人。

敌工站通过宋茂厚与朱村据点宋忠礼重新取得联系。宋忠礼是宋茂厚的堂伯父，过去有关系，后来由于敌人把朱村隔阻，与宋忠礼的联系中断，恢复关系后，他主动为敌工站办事，并为后来在杭头村掩护我军伤病员发挥了作用。

敌工站还通过宋茂厚认识了伪临沂县政府的下派特工焦永和。焦永和将家临时安在向城北孙家庄据点附近，与宋茂厚来往关系密切。敌工站在孙家庄建立联络点后，焦永和日夜提心吊胆，害怕我方把他除掉。焦为了自家的安全，通过宋茂厚和县敌工站人员见面，敌工站趁此对其教育，并与他约法三章。在我方压力下，焦永和一一答应，后来为我提供一些军事情报。1942年春天，我军急需卞庄伪警察机构情况，敌工站让焦永和为卞庄伪警察所出具介绍信，站长郑书箴身穿大褂，头戴礼帽，一派绅士风度，只身进入卞庄伪警察所，门岗向这位持有伪临沂县政府特务介绍信的不速之客敬礼，警察所长设宴招待，并将作陪的一个警官、三个警长、一个文书，一一作了介绍。郑书箴在酒桌聊天中掌握了伪警察所机构设置及人员配备情况，所内设有司法、经济、特务、警察四个系，还有三个班的武装警察，全所共有50人左右。郑书箴胜利完成了侦察任务，及时为边联支队提供了情报。

1941年夏，边联敌工站通过开明士绅姚贵轩，结识了高屯（今属苍山县兴明乡）据点伪乡长魏传忠。经过教育，魏传忠表示不再反对共产党八路军。敌工站派去了共产党员赵邦秀（魏传忠的外甥）到伪乡公所当书写先生（文书），可以掌握情况，提供情报。后来20多岁的王延平接替魏传忠伪乡长职务，又通过姚贵轩带领敌工站联络员孙治武、孙林武二人与王延平见面。地下党员赵帮秀经常对王延平进行教育。王转变很快，后来主动向我方提供情报。在他的影响下，争取了伪乡队班长范长青。根据形势发展，边联县委决定除掉高屯据点无恶不作民愤极大的伪乡队长赵士凡。确定范长青在据点门口按照县大队到达的时间站岗，以便接应。但县大队没有按时到达，范长青已被换岗，错过时机，军情泄露，赵士凡逃出据点，奔向卞庄，向伪大队长王成贵报告，王成贵立即派人到高屯抓捕我方人员。在这紧要关头，王延平连夜告知在据点内的敌工站人员孙治武，迅速撤离据点，

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后来，敌工站联络员孙治武与卞庄伪区公所电话班长孙宪伦和总机电话员朱敬启、王三姐建立了联系，得到情报及时向敌工站提供。孙林武与贾庄据点的伪乡长宋振发、小岭的伪乡队长赵可言建立了联系。这样，建成了从高屯至卞庄的地下联络线。

1941年秋天，敌工站站长郑书箴找到为卞庄伪大队长兼伪区长王成贵当文书的表姐夫杨俊峰。杨俊峰，又名杨松，卞庄大新庄人，年轻有文化，擅长交际。他到卞庄伪大队部是在王成贵多次“邀请”的形势才出来的。郑书箴叫他在敌人内部帮助抗日军民做些好事，并商定在他家大新庄建立地下联络点，以掩护我方人员经常深入卞庄一带开展工作，他都表示同意。郑书箴等以大新庄联络点为依托，经常以杨俊峰亲戚、好友的身份到卞庄、埝头等地活动，也能随便出入王成贵的大队部。同王成贵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混得很熟，很快掌握了卞庄伪大队部的情况。经杨俊峰介绍，还认识了中队长李翠之、郭俊杰、胡步云等人，一有机会就对他们进行教育。在李翠之中队伪军学会唱《保卫黄河》等抗日歌曲后，本想进一步争取这个中队起义，但因李翠之病亡，这个中队官兵自动瓦解，各自回家种田。郭俊杰、胡步云两个中队长，也成了我方的关系人，都表示不再与我方为敌，以后郭俊杰不论到那里安据点，都将据点的地方和内部情况向敌工站报告。杨俊峰也能够经常向王成贵施加压力，要他保持中立，不要伤害老百姓。他还利用工作之便，把获得的卞庄日军中队部的番号、人员编制、三个中队驻地以及武器装备等情况，报告敌工站。

1941年冬，敌工站成功地争取了伪军小队长陈桂勋。陈桂勋，25岁，临沂县七区高屯乡孙家于沟（今属苍山县兴明乡）人。家庭富裕，从小上学，受到国民党正统教育，抗战爆发后，受汪伪“曲线救国”思想的影响，认为八路军打不了日军，抗战还得靠国民党的正规军。1941年，他离家当上了伪临沂县警备队小队长。陈秉性好客，讲义气，从不与土匪流氓来往。他的小队有30多人，多数是当地人，其中有一个干过八路军，因经不起艰苦环境考验而动摇回家，后来跟陈桂勋出来当了伪军。陈桂勋小队驻郭家庄（今属苍山县车辋镇）山上据点。敌工站即派孙治武（陈桂勋的邻居）进入据点内部做工作。过了一段时间，经孙治武、孙林武二人介绍，敌工站长郑书箴与陈桂勋会面。几次接触，发现陈还有爱国之心，并不是心甘情愿当汉奸。经过多次谈心教育，陈桂勋有了很大转变，帮助敌工站做了很多工作。

隐蔽战线在卞庄伪军王成贵部的敌工活动，引起了王成贵的怀疑和警惕，他设法寻找我方的关系人。卞庄伪区公所的电话班长孙宪伦、小岭乡的伪乡长赵可言的秘密活动不慎被王成贵发现，先后被枪杀。还有王成贵大队部教练邵永坤，也是我方关系人。邵永坤一直小心谨慎，从未暴露过自己的身份。但是王成贵的亲信特务排长刘西海嫉妒邵永坤，多次向王成贵谗言陷害邵永坤，说什么“邵永坤通八路，卖军火”等等，王成贵便指使刘西海暗地盯梢邵永坤。一个深夜，邵永坤去卞庄街里办事，走到埝头桥上时，早已埋伏在此的刘西海，朝邵永坤的背后连开数枪，邵中弹后坠入河中身亡。

二

政治攻势对教育争取敌伪军政人员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对那些死心塌地为日军卖命，作恶多端的汉奸、特务不起作用，应予严惩，杀一儆百，以体现我党争取和打击相结合的对敌策略。在边联地区，伪临沂县日本顾问川本定雄直接指挥的解洪太、蒋中一、朱连喜3名特工人员，分别活动在贾庄、向城、尚岩等地，对我根据地危害极大，必须铲除。同时，对依靠政治攻势不起作用的日伪重要据点进行坚决的拔除。根据县委敌工站提供的情报，我地方武装开展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

1941年12月26日贾庄除掉日特解洪太。解洪太，大仲村小吴宅人，系临沂日特头子川



八路军在青纱帐待命伏击

本手下的特工人员，在卞庄、贾庄一带活动，经常派他的亲信混入边联根据地刺探军情、收集情报直接向川本定雄报告。在我军打下长新桥据点一年多的时间里，滂家河伪乡长刘知禄不敢再干，地下党组织安排王成增打入去当伪乡长。为此，我党组织通过王成增提供的情报，利用解洪太与刘知禄的矛盾，让刘搞解的情报。日军为切断我党由滨海地区通过鲁南至微山湖奔赴延安的交通线，计划增设坞丘和长新桥两据点。川本派解洪太负责督办，要求贾庄伪乡公所负责筹划建立据点的经费、物资和民夫。边联县委负责敌伪工作的崔梦波得知这一情报后，报告鲁南军区首长。1942年12月，由军区二科侦察员李景先、赵魁武、孙傻子，县公安局李之秀，边联敌工站长郑书箴以及联络员孙林武、胡凤桐等，组成锄奸小组。于12月26日（农历十一月初九）在贾庄集上进行严密设防，顺利地将解洪太击毙，为民除了一大害。致使敌人两个据点都没安成，此举被人们传颂为“一枪打掉两个据点”，保证了敌后交通线的畅通。

1942年除夕之夜拔除孤山屯据点。孤山屯（今属贾庄乡）据点是敌伪指挥中心卞庄的相距4公里的前哨阵地，驻有两个伪军小队和一个日军班。伪中队长高中义为了给他的小队伪军助威打气，整天随日军一起活动，白天跟日军班去孤山屯，晚上跟日军班一同返回卞庄。他们经常到各村要钱要粮，榨取百姓财物，还以清查八路嫌疑为名，威胁抗日群众，搞得鸡犬不宁，人们对他们恨之入骨。边联县委和边联支队决心拔掉孤山屯据点。根据县委敌工站提供的情报，决定由八路军边联支队（教二旅五团）一大队和敌工站人员共同执行。一大队队长王芎南、敌工站长郑书箴研究决定在除夕之夜行动，利用敌人过年饮酒作乐麻痹熟睡之际，冲进据点，一举歼灭。2月14日的除夕午夜，根据敌工站联络员胡凤桐白天深入据点掌握的情况，按照预定时间，3个连队按时到达指定地点，主攻连队竖上梯子，迅速飞越墙头，顿时手榴弹、枪弹声如同雷鸣，杀声震天，直扑据点中心。醉如烂泥，睡如死猪的伪军不知所措，纷纷举手投降。战斗不到半小时，敌军全部被歼。除一小队长朱祥林和几名伪军被击毙击伤外，另一小队长王伯志和大部分伪军当了俘虏。这次战斗共缴获机一挺，步枪60多支。战斗结束后，军民联欢，共庆新春佳节。

1942年6月23日智取向城据点。向城据点位于朱村和孙家庄两据点之间，处在临枣公路和潍台公路的交叉点上，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42年初日军派临沂剿共大队长赵云现到向城安了据点。赵云现，外号赵大麻子，系当地的恶霸、土匪、流氓，作恶多端，群众对

他恨之入骨。他当了剿共大队长后，更变本加厉，神气十足，对老百姓敲诈勒索，无恶不作。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经常残害我干部党员及其家属。同时封锁交通要道，为日军卖命，自甘认贼作父。向城据点的存在，直接威胁着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安全。为此，鲁南军区和边联县委决定拔掉这颗钉子。任务交给边联支队（五团）一大队执行，命令边区县敌工站联系内线配合行动。向城据点有县委敌工站安插的内线刘文义、张守信二人。一大队长王芑南和敌工站长郑书箴派可靠人员通知内线。刘文义秘密到石龙山向王芑南、郑书箴报告据点内部情况：向城据点共有伪军150多人，圩墙工事坚固，武器装备较好，靠火力强攻一时难以奏效，最好的办法是趁其不备，进入据点，突然袭击，以智取胜。王芑南、郑书箴赞同这一方式，随后确定了攻打据点的时间和内线联络信号等。边联支队一大队随即召开部队军事干部会议，部署作战方案。配备一支150多人加强连作为突击队，届时冲进据点，其他部队密切外围防御，注意敌人动向，以防敌人逃走和增援。要求准备好梯子、绳子等攀登工具，我军人员以左臂扎白毛巾为标记。6月23日（农历五月初十）夜11时，王芑南带领部队到达向城桥北头，并按规定的信号与刘文义取得联系。部队开始向伪据点附近运动，加强连在敌据点东北角圩墙下，从刘文义、张守信的岗位上，顺着梯子一个跟一个神不知鬼不觉地迅速进入据点。在刘、张二人的指引下，兵分三路进击。一路扑向敌人的其他岗哨，哨兵还没来得及弄清情况，就被缴械俘虏。二路奔向伪军的营房，三路包围伪军大队部。伪军刚与我进攻部队接火时，伺机进行抵抗，战斗中有3人当场被击毙，其中有敌卫士刘宝玉、投敌分子李文献。伪临沂县派来的顾问特务张成志，平时无恶不作，都在我军包围后钻进床底，被刘文义找到，从床底拖出后击毙。有些平时与刘文义、张守信二人关系较好的伪军，自动放下了武器。战斗不到一小时顺利结束，我军无一伤亡。除伪军头目赵云现带极少数人逃窜外，其余伪军全部被俘，武器全部缴获。智袭向城伪据点的胜利，为民除了一大祸害，震慑了日伪势力的嚣张气焰，便利了我方人员在这一地区活动，使敌后工作得以开展。

1942年8月14日（农历七月初三），边联县大队派侦察员于守平化装赶尚岩集，在内线金益山的配合下，将金良喜处决。金良喜是尚岩人，日军占领尚岩后充当汉奸，他依仗日军势力，多次残害抗日军民，民愤极大。镇压金良喜，为民除了一大害。

1942年9月，边联县敌工站和县公安局一起，在向城集上除掉了日本特务蒋中一。蒋中一又名蒋春之，原来是我鲁南行署行政科的科员，后来携带驳壳枪一支、现款一宗叛变投降日军，充当了伪临沂县日本顾问川本直接指挥下的武装特务，接替原在贾市集市上被我除掉的特务分子解洪太的职务，经常到边区县边沿的向城、朱村和梧桐村一带，搜集我军政情报，为日军卖命。因蒋中一对我鲁南地区党政领导干部大都认识，知道我党政机关不少情况，如果不早日铲除这个祸害，将会给根据地和区、县领导人及机关安全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鲁南区党委、鲁南军区和边联县委指示县公安局和敌工站，秘密侦查，布控跟踪，坚决把蒋中一干掉。

蒋中一自知罪孽深重，共产党不会放过他，活动中非常狡猾，行动诡密，惯用的手段是声东击西，我敌工部门曾两次要搞掉他，均被逃脱。一次是蒋中一从梧桐村去朱村，我方埋伏在王家楼临枣公路以北的高粱地里，在炎热的高粱地隐蔽等待两个多小时，没见人影，后得知他抄小道溜走。另一次是我方埋伏在张家桥等他，又落了空。县委敌工站寻找原因，认为是凭主观臆断所致，没有掌握蒋的活动规律。因此改变策略，深入敌人内部，摸透情况，然后采取对策。敌工站先找到已被争取的特务焦永和了解蒋中一的活动。焦永和是伪临沂县政府的便衣特务，蒋是临沂川本顾问直接指挥下的武装特务，手下红人，二人不是一个系统。蒋依仗川本，一贯盛气凌人，骄横跋扈，监视伪军政人员的行踪，看是否有被共产党争取的人员。蒋中一瞧不起焦永和，二人有矛盾。敌工人员在与焦永和的谈话中，了解到蒋中一在梧桐村讨了小老婆，尚未成亲，但哪天迎娶没搞清楚。为了弄清蒋

中一娶亲的日期，郑书箴到捻头据点王占牛伪军大队部找杨俊峰了解情况。杨结交面广，能从多方面掌握敌人情况，情报也比较准确。郑书箴到了捻头据点，两次出入王占牛的大队部，没有找到杨俊峰，却引起特务孟季华的注意，他跟踪监视，郑书箴好不容易将其甩掉。当得知杨俊峰在家养病时，他秘密到大新庄杨俊峰家，杨俊峰提供了情况。蒋中一老家在临沂是大户人家，与梧桐村宋家是亲戚。蒋当了武装特务后，在梧桐村一带有名，宋家想找个靠山，就把闺女许给蒋中一当小老婆。蒋准备在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迎亲。卞庄据点有些人还准备送礼。郑书箴认为杨俊峰提供的情况较可靠。又接到内线提供的情报，蒋中一要在八月十四到向城集置办结婚用品。敌工站将情报向边联县委书记刘子见汇报，县委在黎丘召开专门会议，县公安局长郭华主持，鲁南军区二科科长崔梦坡、县公安员房永典和敌工站长郑书箴参加。会议决定在9月23日（农历八月十四）向城集上动手，乘蒋中一筹办结婚用品之际，将他干掉。这一任务由房永典和郑书箴负责指挥，于守平、陈廷秀、李之秀、宋玉和、宋宝林等七人组成除奸行动小组。于守平、陈廷秀、李之秀负责铲除蒋中一；宋玉和、宋宝林负责对付伪乡长宋茂厚。为防意外，另派6人分两个小组，在集市附近设防，配合行动。

中秋节前一天的向城集比往常人多，也更热闹。这一天，县公安局执行任务的人员化装进入集市，有的穿着大褂，戴着草帽，背着捎马子；有的穿着对襟短褂，戴着斗笠，挑着担子，随着赶集的人群，来到向城集市上。在集市的北边，看见蒋中一带着几个武装特务在集市的东边耀武扬威地由南向北走过。郑书箴向所有人员示意，密切注视蒋中一的行动。当时有人想动手，郑书箴提示：“稳住以后再行动。”蒋中一围着集市转了一圈，没有发现可疑人员，中午时分，便与前来赶集的朱村伪乡公所副乡长赵乃文一起钻进酒铺喝起酒来。随后，几个武装特务、乡丁也陪他们猜拳行令喝起来。此时，孙家庄伪乡长宋茂厚钻进了一个不远的饭铺，由我方宋宝林陪着喝酒，宋玉和则在旁边活动监视。房永典、郑书箴、于守平、陈廷秀、李之秀在蒋中一背后不远的地方活动。当蒋中一正在用筷子夹起一个煎包往嘴里送时，于守平、陈廷秀一个箭步过去，陈廷秀掏出左轮手枪，对准蒋中一的脑袋开枪，恰巧是个哑弹，没有打响。蒋中一听到身后有动静，咬着半个煎包，扭头向后看，于守平举起驳壳枪，朝他的后脑勺连开两枪，蒋中一栽倒在地。喝得酩酊大醉的几个特务、伪乡丁晕头转向，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是什么情况，行动小组的5枝短枪同时对准他们，大声喝道：“不准动，你们赶快躺下，我们要打掉的是特务蒋中一，谁动就打死谁”。这些怕死鬼吓得浑身筛糠，趴在桌子底下。在另一饭铺的宋茂厚听到枪声，刚要站起，宋宝林叫他坐下，他不听，正要掏枪，宋玉和立即把驳壳枪顶到他胸前，警告说：

“坐下，你别动！没你的事，你动就打死你！”宋茂厚看到情况不妙，只得乖乖地重新坐到凳子上。这时行动小组7人立即散开，同时对空鸣枪，边打边喊：“我们打的是特务蒋中一，当汉奸的要躺在地上，不准乱动，谁动就打死谁！”集市外的人员也对空鸣枪配合行动。赶集的群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前拥后挤，向四面八方散去，行动小组混在人群中，安全撤出集市。不大一会赶集的群众基本走光，躺在地上的汉奸伪警慢慢抬头四下张望，看看周围没有什么动静，才爬起来逃之夭夭。最后剩下蒋中一这条“死狗”，仍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赵乃文兔死狐悲，看看周围没有人了，带上几个伪军，哭丧着脸，找来席子卷起蒋中一，狼狈不堪地抬回朱村据点。当天夜里，敌工站郑书箴、李其中二人，在向城南门外张贴布告，公布了蒋中一的罪行。八路军武工队深入虎穴，为民除害，群众称快。



沂蒙大队天目山区剿匪记

尹作让



临沂县公安局
欢送南下
干部合影

1949年，我担任山东省沂南县公安局局长，带领全局大部分同志奉调军编渡江南下参加解放浙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兵团暨省军管会谭震林、王建安等决定把我们临沂沂蒙整个大队分配到杭州西部的天目山区。

60多年前，新解放的天目山地区初期的敌我斗争非常激烈，任务是繁重的。临安、於潜、昌化等县山区位于浙皖边界，崇山峻岭，地势险要，土匪容易隐藏、活动，抗战期间又是国民党浙西行署所在地，国民党的党政军特有着特殊的基础。刚解放时，这里聚集了来自全国12个省、25个县的千余名土匪，是全省匪患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主要股匪有：以吕国华、张云鹏为首的“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部反共救国军第四纵队第一支队”800多人，以李去非为首的“国民党浙江保安司令部富春江游击纵队第七支队”100多人。当时各县的伪自卫大队，在解放军大军压境时，慑于人民军队的强大威力，不得不伪装投诚归顺，在解放军主力部队离境南下后，又重新纠集在一起，有的如於潜的吕国华把队伍拉到山里，有的继续伪装，开展猖狂破坏活动，引起群众的极度恐慌。

浙西县城的一场血战 挫败了“六·二八”武装暴乱

1949年6月上旬，先是李去非匪徒两次攻打昌化县城，入城抢劫武器、财物，后被南下干部和武装人员击退。随后，吕国华匪部便在於潜县制造了震惊全省乃至全国的“六·二八”反革命武装暴乱。6月13日，吕国华、张云鹏在藻溪东福寺纠集百余名匪徒骨干开会。吕国华调集匪徒准备偷袭於潜县城，消灭南下干部。当天拂晓，吕部第二大队大队长柯志强率匪徒将寄宿在藻溪对石村的7名解放军伤员全部杀害。为配合吕国华的行动，李去非纠集100多名匪徒再次攻打昌化县城，以吸引我剿匪力量。吕匪又在藻溪九里桥附近将从藻溪赶往县城的潜东区委书记孙遵杰、县文教科王运洲杀害。吕国华并指派所属第一大队大队长唐铁英，利用“投诚”后“开明士绅”的身份，邀请特务扮成嵯县

“戏班子”准备当晚在潜城里为南下干部“慰问演出”，企图在演出时里应外合，将南下干部一网打尽。梁震县长等人及时识破了匪特唐铁英的阴谋，查封了戏班子。匪首吕国华见里应外合的阴谋破产，当晚又重新调兵遣将，将所属5个大队的数百名匪徒聚集在九里桥一带，准备在6月28日晚强攻潜县城。

6月28日清晨，匪首吕国华获悉县长出差不在县城后，立即决定将攻城行动提前至当天上午。8时左右，匪徒先在九里桥袭击了一辆解放军运粮汽车，杀害了押车的解放军战士，抢走大米7000余斤。然后，匪徒切断交通、电话线，伪装成农民潜入潜县城。9时许，匪徒兵分四路袭击：先是抢走城隍庙存粮1万余斤，劫走前不久以“投诚缴械”名义藏放在县银行里的重机枪2挺、轻机枪2挺、步枪150余支及一批物质。四路匪徒得手后又合力围攻县政府大院。

那天，县委书记张剑霆正在地委开会，县长梁震出差在潜东区，县城内只剩下值班人员和从各区赶来准备开会的十几名干部。但南下干部大多富有战斗经验，又配有武器。枪声一响，就纷纷进入县政府大院保卫首脑机关。南下干部组成战斗队，一部分抢占制高点，居高临下向外射击，一部分以大院围墙为依托，采用流动防御战术，发现匪徒从哪里进攻，就集中火力予以反击，打退了匪徒一轮又一轮的进攻，终于夺回和保卫了县政府大院。

在藻溪的县长梁震得知县城遭袭的消息后，立即带领武装班战士赶回县城，突入大院与干部会合，梁震率领干部战士连续打退了匪徒的多轮进攻，又派当地百姓一路绕道分水县电告地委，抄小路给临安送信。傍晚时分，干部战士夺回后山碉堡，转移至碉堡内固守待援，战斗一直持续至深夜。地委接到潜的求援电话后，立即派解放军驻临安第三一一团部队星夜驰援。吕国华匪徒闻讯仓惶逃走。在整个战斗中，击毙匪徒4名，击伤2名，我们有7名干部战士壮烈牺牲。

吕匪在逃窜途中，一股在下埠溪伏击客车一辆，打伤群众2人；另一股攻占太阳乡政府，打死南下干部1人。第九专署专员程鹏前往潜慰问，车行至对石乡军地里，遭遇柯志强匪部伏击，专员程鹏中弹负伤。

在“六·二八”事件前后，潜县共有19名干部战士和群众遭土匪杀害，有3人受伤。7月间，潜县潜川区政府、波前区政府、临安县青云区政府、横畈区政府、板桥乡政府等又先后遭到武装匪徒的袭击。

匪特的猖狂暴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威胁新生人民政权。当时肃清匪特，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也是刚刚成立的县委、县政府面临的第一要务。

全面开展剿匪斗争，誓死安浙西、保杭州的西大门

1949年6月，解放军浙江军区召开剿匪工作会议，遵照华东军区关于“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武装自卫”三者密切结合的剿匪方针和省委有关剿匪的指示精神，对全省剿匪斗争作出军事部署，将全省划为4个清剿区，临安地区为第二清剿区。会议还针对天目山区土匪集中、匪患严重的状况，将三县确定为重点清剿地区。会后，浙江军区陆续向有关县派出剿匪部队，进行重点清剿。

6月28日深夜，先是解放军第三一一团两个连抵达潜，次日，部队获知吕国华匪部行踪，立即出动追剿。在对石村与吕匪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毙敌多名，将敌击溃。7月6日，剿匪部队侦知吕匪在军地里活动，便火速赶往清剿。激战后，吕匪狼狈逃窜，吕国华慌不择路，过松溪（现藻溪镇境内）时正值雨后山洪暴发，被洪水冲走淹死。

吕国华死后的第二天，张云鹏接任匪支队长职务，搜罗200余残匪至东福寺整编。不日，匪“京沪杭警备总部反共救国军第四纵队”纵队长张逸民也从上海潜来东福寺。张逸

民向众匪打气道：“只要有人，美式武器即会空投到孝丰”，并狂妄叫嚣“八月半（农历）打下南京吃月饼”。东福寺整编后，匪徒分成数股转入山区分散活动。

7月中旬，剿匪部队在太阳金竹庵、景村围歼张云鹏匪部第一大队，打死匪徒10余名，打伤20余名，俘获20余名。25日，剿匪部队与临安县公安部门在青云乡由口村剿灭张云鹏匪部特务大队，击毙土匪4名，俘获副支队长赵剑秋等34人。8月6日，昌化县公安部门抓获从安徽省宁国县流窜来昌化的匪“京沪杭警备总部反共救国军第四纵队三大队四中队”中队长及匪徒20余名。

进驻浙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十五师，分别进驻三县要地，加强了剿匪的力量，鼓舞了天目山地区军干群的士气。其中进驻临安县横畈区一个营的兵力迅速围剿张云鹏所属匪部，击毙匪大队参谋冯炳根等多名匪徒。不久，横畈地区的残匪被肃清。

抵达昌化的解放军和昌化县公安部门获悉李去非带领匪徒在石瑞蒲村五亩一带扰乱，迅速出击，击毙匪徒4名，其余缴械投降，李去非被活捉。企图东山再起的唐铁英也被活捉。去於潜的剿匪部队在鸡毛坞与张云鹏部相遇，激战后，张云鹏率残匪逃往天目山。在莲花峰一带将张云鹏匪徒大部歼灭。下旬，又将张匪第二大队大队长柯志强和政治部主任俞培根抓获。10月初，匪首张云鹏被活捉。22日，匪纵队长张逸民在杭州被擒获。

同在6月，临安县从“起义的武装大队”内部破获一起内外勾结，企图组织武装暴乱，妄图消灭我临安县级机关的匪“国防部青年救国军组织”。他们开始时伪装投诚归顺起义，蒙蔽某部个别同志，仍以原建制原装备，全部佩戴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以天目（县）大队名义，而且各中队分别驻扎在我县机关边上。当时老百姓看不懂、敢怒不敢言。

据此，省军区和军分区接受了於潜血的教训，依据约法八章的规定，命令该组织人员全部放下武器，并进行彻底改编。临安县机关干部和县城衣锦镇的居民得以幸免于难。解放军、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三结合、军民合作，给土匪以有力打击。如此一来，匪特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惶惶不可终日。

在开展军事清剿的同时，政府向匪特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召开了万人公审大会，公开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匪特头目，全县群众有的放鞭炮，有的鸣枪，人心大快，奔走相告。会上严正警告匪特人员：一切与人民为敌、顽强到底的分子，只有死路一条。对主动投降归顺人员宣布当场释放，既往不咎，立功者给予奖励，生活困难者给予生活出路。同时大力宣传党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在强大的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他们纷纷向人民政府投案自首，对改恶从善者一律兑现政策给出路，不戴“帽子”。

通过军事清剿和政治瓦解，至1949年10月，三县共歼灭土匪15股，890人，缴获各类枪支325支及大批弹药，土匪头目或被击毙或被擒获，股匪基本剿灭。此后由公安、人武、民兵、群众负责长效保平安。



吾乡

——《昨天的云》节选

王鼎钧



自拟简介

王鼎钧，山东临沂人。正式写作由一九四九年算起，迄今未敢荒废，曾尝试评论、剧本、小说、诗、散文各种文体，自己最后定位于散文。已出版《左心房漩涡》等散文集十四种，其他十一种。在台湾为及早力行将小说戏剧技巧溶入散文之一人。诵前人“良工式古不违时”之句日求精进。为基督信徒，佛经读者，有志以佛理补基督教义之不足，用以诠释人生，建构作品。吾生有涯，而又才力不逮，常引为恨。曾仿佛家四弘誓愿作铭以励天下同文，铭曰：“文心无语誓愿通，文路无尽誓愿行，文境无上誓愿登，文运无常誓愿兴。”

一九四三，对日抗战第六年，我在离家千里以外的地方读流亡中学。一天，教本国地理的姚蜀江先生讲完最后一课，合上书本，提出一个大家意想不到的问题：

“你们已经读完本国地理，你们对整个中国已经有清楚的认识。你们最喜欢哪座山哪条河？你们最喜欢哪一省哪一县？抗战胜利以后，你们希望在什么地方居住？”

当时，我举手发言，我说我仍然愿意住在自己的故乡。

姚老师问我的故乡在哪里，我告诉他，在山东省临沂县的兰陵镇。

姚老师想了一想，欣然点头：“你们那个地方的确不错。”

从地图上看，山东像一匹骆驼从极西来到极东，卸下背上的太行山，伸长了脖子，痛饮渤海里的水。然后，它就永远停在那里。

这骆驼身上有两条黑线。一条线由肩到口，几乎是水平的，那就是胶济铁路；一条线由背至膝，越过前身，几乎是垂直的，那就是津浦铁路。这两条铁路夹住了绵亘三百里的山岭冈峦，地理书上称之为三角山地，写书的人把山东境内的津浦路看成“勾”，把胶济路看成“股”，把骆驼颌下的海岸线看成“弦”。

三角山地又分好几个山区，它的西南角叫沂蒙山区。沂河由此发源，向南部平原流去，到山势已尽，这出山泉水映带的第一个城市，就是临沂。



兰陵是临沂西南边境的一个大镇。兰陵北望，那些海拔一千多公尺的主峰都沉到地平线下，外围次要的山峰也只是地平线上稀薄透明的一抹。兰陵四面都是肥美的平原，东面到海，西面到河南，南面到淮河。清明踏青，或者农闲的日子探望亲戚，一路上眺望这么好的土壤，是一大享受。尤其是春末夏初麦熟的季节，原野放射着神奇的光芒，浴在那光芒里的人，自以为看见了人间的奇花异卉。唉，必须田里有庄稼，必须有成熟的庄稼，那大地才是锦绣大地。

北伐前后，土匪以沂蒙山区为根据地，抢遍了鲁南的乡镇，兰陵也不例外。但是，到兰陵来的土匪不杀人，不奸淫妇女，只要财物。这股土匪有自己的哲学，他们相信做土匪等于做生意，将本求利，“本金”就是自己的生命。干吗要流血？血又不能当钱使用！强奸？何苦来，明天上阵第一个挨枪子儿！

兰陵当然也有地主，而且有大地主，清算起来，个个俯首认罪。不过“样板”地主——《白毛女》里那样的地主，倒还没有。

近代的兰陵很闭塞，很保守。可是放足，剪辫子，写白话文，兰陵都有及时开创风气的大师。南下黄浦抗日，北上延安革命，闭门研读《资本论》，都有先知先觉。

兰陵的城墙东西三里，南北五里，宽可驰马，是我小时候散步的地方。四面城门都有名家题字，东门是“东海镜清”，北门是“文峰映秀”，南门为“衢通淮徐”，西门是“逵达邹鲁”。虽是小镇，气派不小。

范筑先做过临沂县的县长，是兰陵人的父母官。能在这样一个好官的治理之下为民，也是风水有灵，三生有幸。

范县长的第一个优点是不要钱。对身为行政首长的人来说，贪为万恶之源，廉为百善之媒。

他的第二个优点是不怕死，“仁者必有勇”。

那年头临沂的土匪多，军队纪律也不好，时人称为“兵害”、“匪患”。向来做县长的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敢认真，唯恐兵匪以暴力报复。

范县长不怕。那时允许民间有自卫枪械，大户人家甚至长年维持一支小小的民兵。范县长把这些乡勇组织起来，施以军事训练，又把各村武力联络起来，建立指挥系统，一村有警，各村来救，同时以正规军队作后盾，土匪遂不敢轻举妄动。

兵害比较难除。幸而那时国民政府也知道兵害严重，不得不扬汤止沸，下令规定县长一律兼任军法官，在某种情况下，军法官有权判处死刑。范县长拿起这个尚方宝剑，挥舞叱咤，有效地震慑了兵痞兵氓。

临沂城内的驻军，军官往往告诫士兵：“我饶得了你，只怕范大牙饶不了你。”范县长的门牙特大，有这么一个绰号。

范在临沂的任期是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六年。后来他调到聊城去升为行政督察专员。不久，对日抗战发生，日军进攻聊城。范专员曾在北洋军中做过旅长，原是一员虎将。他守土不去，激战中阵亡，吾乡尊长王言诚先生浴血参与此役，突围得免。

岳飞曾强调“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范筑先先生一身兼具这两个条件，超过岳武穆所悬的标准。料想成仁之日，精忠岳飞在天堂门口迎接他的灵魂。



范筑先

范筑先为政的另一个特点是“勤”。据说他整天工作，几乎没有私生活。

他奉命进行的几项大政，如土地测量，如严禁鸦片，如寓兵于农，都很容易以权谋私，因陋聚敛，但是范县长贯彻执行，没有苛扰。

一九三五年夏天，黄河决口，山东水灾严重，大批难民涌到，范县长顺顺当当漂漂亮亮地办好救灾。

当年的地方行政，有人称之为“绅权政治”，由各地士绅做政府的经纪人，做官的人只要得到士绅的配合就算圆满成功。

士绅和一般农工商学的利益究竟不能完全一致，因此有些良法美意不免遭士绅封杀。这个缺点，当时的制度无法补救，只有靠“贤臣”走出那分层负责层层节制的官僚体系，以个人魅力个人意志冲破士绅架构的长城，出入那“天苍苍，野茫茫”的世界。这样，“贤臣”必须勤苦耐劳。

范筑先先生就是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环境，做了那样的人、那样的事。

有两件事，我对范氏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我一共只有两次机会看见他。

第一次，他巡视兰陵，顺便看看我们读书的小学。我们停课，大扫除，奉命要穿干净衣服，洗脸洗到脖子，洗手要剪短指甲。当天在校门内操场上排开队伍，队伍临时经过特别编组，把白白胖胖讨人喜欢的孩子摆在前列。

县长出现，大家一齐拍手，照事先的演练。原以为他要训话，他没有，只是从我们面前走过，从排头走到排尾，仔细看我们。他的个子高，面容瘦，目光凌厉，门牙特别长，手指像练过鹰爪功。然而他并不可怕。他每走几步就伸出手来摸一个孩子的头顶，大家都希望被他选中。

他没有摸我。他的手曾经朝着我伸过来，从我的肩膀上伸过去。他的目标在我左后方。天地良心，那个同学的长相没有我这么体面。也许正因为他比我黑，比我憔悴。受他抚摩的，多半不是饱满娇嫩的中国洋娃娃，换言



之，位置多半在后面一排，以及排尾。

第二次能够看见他，是因为他要离开临沂了，去聊城赴任之前，他到临沂县的每一区辞别。兰陵是第八区。

在欢送的场面里，我们小学生是必不可少的点缀。主体是大街两旁长长的两列一望无尽的香案，香案后面站着地方士绅、基层官吏。这些人物背后墙上高挂着红布条制成的大字标语，感激德政，祝贺新职。标语连接，灰扑扑的兰陵好像化了妆，容光焕发。那年月，标语是用毛笔一笔一画写出来，兰陵很有几位写家，这一次都动员上场，不啻一场大规模的书法展览。

香案上并不烧香，摆着清水一碗，镜子一面，豆腐一块，青葱几棵，用以象征范县长的“清似水、明似镜”，“一清二白”。还有清酒两杯，主人的名片一张，表示饯别。只见县长在许多人簇拥下一路行来，区长、镇长、警察局长、小学校长，少不了还有随从护卫，鞭炮震天，硝烟满地。这一次他没有多看我们，一径来到香案之前。香案上有两杯酒。范氏站立桌前，端起右面的一杯，右面是宾位，洒洒于地。就这样，一桌又一桌。兰陵本来就满街酒香，这天更是熏人欲醉。随员取出范氏的一张名片放在桌上，把主人摆在桌上的名片取回来，放进手中的拜盒。就这样，鞭炮声中，范氏一桌挨一桌受礼，临之以庄，一丝不苟。

范氏的路线是进北门，出西门。西门内外，香案还在不断增加。四乡农民，闻风而至，带着他们刚刚摘下的新鲜果菜。来到兰陵，才发现需要桌子，需要酒杯，就向临街的住户商借。我家共借出方桌两张，酒杯六只。有些远道而来的扶老携幼，阖第光临。

据说，根据传统，卸任的官吏必须在鞭炮声中离去，最忌冷场。所谓辞别，通常是在前面十几二十桌前行礼如仪，自此以下，俗套概免，以免时间拖延太久。范县长那天打破惯例，即使是临时增添的那些桌子，那些没有铺桌布、没有摆名片的桌子，他也平等对待。那天，兰陵镇虽然准备了很多鞭炮，还是不够。这种长串的百子鞭，得到县城去采购，临时无法补充。范县长并不在意，他的诚意丝毫不减。

范氏出外，一向不接受招待，这一次更是在午饭后到在晚饭前离去。等他坐上汽车，已是夕阳西下。他还没吃晚饭，我也没有，我们的队伍这时才解散，所有的香案也在这时开始撤除。那时，我觉得好饿！我想，他也一定饿了。

毫无疑问，这个人也给了我很大的影响。

“伏羲女娲”在临沂汉画像石上的 形象特征 (上)

桑玉厚

伏羲、女娲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天神和人类的祖先。传说他们有许多了不起的业绩，比如伏羲画八卦、结网罟、造甲历；女娲炼石补天、抟黄土造人、始创嫁娶，等等。对于他们的传说，有的说为兄妹，有的说为夫妻，又有的说是由兄妹变为夫妻，但主要的说法是他们本为兄妹，遭遇洪水，世间仅存他俩，因而结为夫妻，繁衍人类，成了中华民族的始祖。

一、伏羲、女娲其人

伏羲，又名“太昊”，合称太昊伏羲氏。一作宓羲，庖牺、包牺、伏戏、炮牺、虑戏、包羲、伏牺。根据记录者对伏羲名号的不同理解而用字不同，但最普遍的用伏羲二字。伏羲亦称羲皇、牺皇，本姓风。传说他有圣德，像日月之明，故称太昊，在位15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追溯中华文明的历史，在中国人的意识里，几乎都把伏羲当作我们的第一代祖宗，都公认伏羲是我们最古老的“人文始祖”。伏羲居三皇之首，百王之先，是中国第一位人王。



天下第一陵
——太昊陵



图2

图3

图4

图5



图1

太昊伏羲的记载，在古籍中常见，但又说法不一。《鲁灵光殿赋》曰：“伏羲鳞身，女娲蛇躯。”《竹书纪年》说：“太昊之母居于华胥之渚，履巨人迹，意有所动，虹且绕之，因而始娠，生帝于成纪。”《路史·后纪一》注引《宝椟记》曰：“帝女游于华胥之渊，感蛇而孕，十三年生庖牺。”《诗含神雾》载：“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宠牺。”《山海经·海内东经》则说：“雷泽有雷神，龙身人头。”这里的庖牺、宠牺即伏羲太昊。所谓的履“巨人迹”、“大迹”与感蛇而孕，同是指与龙交而孕，是关于龙图腾的生育信仰。因为大迹出雷泽，而雷泽的雷神是龙身人头，正与王充在《论衡·龙虚篇》中说的“雷龙同类”相符合。

至于女娲，《路史·后纪二》载：“女皇氏庖牺（女娲），云姓，一曰女希。蛇身、牛首、宣发。太昊之女弟。”因此，汉画像中伏羲女娲被刻画为人面龙身或蛇身形象并不是偶然的，而具有其深刻的文化渊源。汉代画像砖与石刻上，伏羲与女娲的形象俱为人头蛇身，腰以上作人形，穿袍戴冠，腰以下，蛇躯缠绕相交。

伏羲一生做了很多好事，他上知天文，下懂地理，而且熟悉人间万物的自然法则。唐代历史学家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比较完整地勾划了伏羲的事迹和功绩。其事迹主要有：始作八卦，发明渔猎工具，制嫁娶之礼，造书契，创历法，人工取火，制琴作乐。其它还有尝百草、制九针、创立医学，立占筮之法、创立占卜学，立九部、设六佐、分部管理部族事务等。统观汉、晋以来记载伏羲的史料，都把甘肃天水地区当作伏羲氏族的生地。太昊伏羲陵位于河南省淮阳县，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十八大名陵之一，因太昊伏羲氏位居三皇之首，其陵墓被誉为“天下第一陵”。太昊陵庙以伏羲先天八卦数理兴建，是中国帝王陵庙大规模宫殿式古建筑群之孤例，分外城、内城、紫禁城三道皇城。太昊陵内有一座统天殿，俗称大殿，建于明代，是太昊陵内体量最大、等级最高的殿宇，也是全国所有古建



图6



图7

筑中等级最高的殿宇，因为没有任何殿宇能称统天殿的。它的东西两侧有一幅气势磅礴的楹联，上联是：炎黄尧舜禹汤文武周孔老庄无不追踪人文始祖，下联是：帝王将相三教九流诸子百家若非羲皇谁敢统天。由此可见此建筑的地位之高。

女娲，是被民间广泛而又长久崇拜的创世神和始祖神。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主神有两个：南方神话的开辟神是盘古，北方神话的开辟神是女娲。在三国时代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出现以前，古代中国最早的开辟神话是女娲，及至盘古神话出现了以后，女娲在神话中的地位才逐渐被盘古取代。伏羲女娲的传说始见于战国时代，在当时人们的信仰中，女娲是造物神。“女娲”之名，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屈原所作《楚辞·天问》。屈原在放逐期间，看到楚先王庙及公卿祠堂墙壁上涂画有女娲形象，遂提出疑问：“女娲有体，孰制匠之？”大意是说：女娲的身体是谁做成的呢？由此可知，女娲是荆楚一带人们崇拜的始祖神。东汉时第一个注释《楚辞》的王逸说：“传说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其体如此，谁所制匠而图之乎？”王逸的儿子王延寿在他写的《鲁灵光殿赋》中亦云：“伏羲鳞身，女娲蛇躯。”《山海经·大荒西经》云：“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野，横道而处。”这里说女娲用她的肠子化作十神，表现出女娲为造物神的地位。随后汉代的《淮南子·说林训》说：“女娲七十化。”她神通广大化生万物，每天至少能创造出七十样东西。《说文解字》亦曰：“女娲神圣女，化万物者也。”这是女娲化物之说的延续。至汉代，在人们的信仰中女娲成为造人的始祖。应劭《风俗通义》引《春秋运斗枢》曰：“伏羲、女娲、神农，是三皇也。”把她作为三皇之一。伏羲女娲同提始于汉代。汉画像石上伏羲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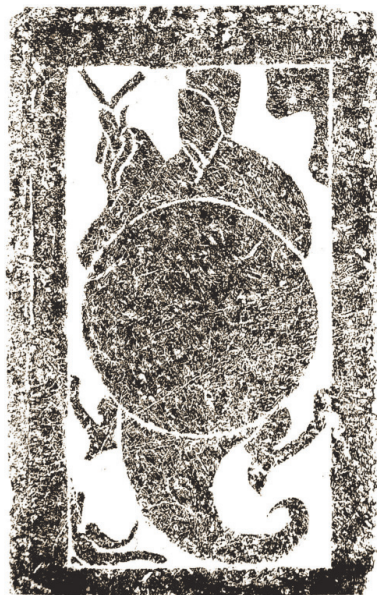


图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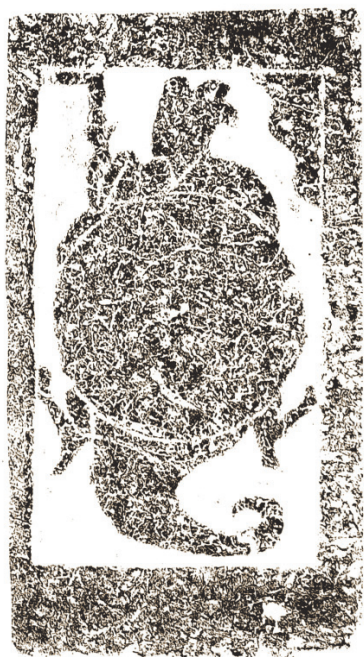


图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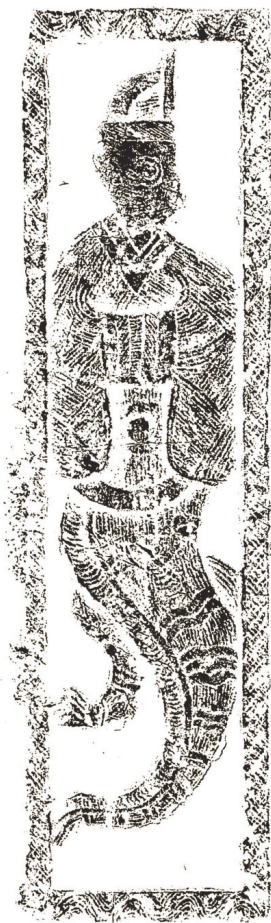


图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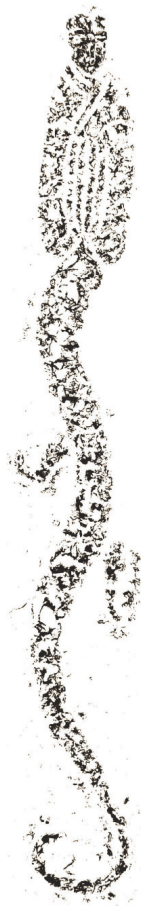


图11



图12

娲往往同时出现，或同一个墓，或同一石面上，其基本的形体特征是人面蛇身或人身蛇尾，大都双尾相交，手中分别执有规、矩，喻以规矩成方圆，开天辟地之意。

女娲在古代神话中的记载错综复杂。女娲神话分为两个系统：第一系统中的女娲并无配偶，先人类而生。她的功业一是造人，二是补天。第二个系统的故事梗概，中西方都有。在远古时代，发生了一次大洪水。原因是人心逐渐被物欲侵害，不敬神灵上帝，于是灾降于人类，造成的后果在古埃及、以及古巴比伦都有流传。不过，西方拯救人类的是诺亚方舟。女娲神话最为人熟知的就是“抟土造人”、“炼石补天”和“兄妹结婚”。

二、伏羲、女娲在临沂汉画像石上的形象特征

伏羲、女娲在临沂汉画像石上的形象特征主要表现为：

1、两者二尾相靠或相交。

图1伏羲、女娲、东王公图。沂南北寨墓群一号墓墓门东立柱画像。画面二层。上层刻伏羲女娲，两人均人首蛇身，两尾相靠。伏羲头戴平顶帽，上身着衣，右侧有一矩。女娲头梳髻髻，亦上身着衣，左侧有一规。两人中间夹一有胡须的大脸的人，戴尖顶帽，着花领上衣，其两只强壮的手臂环抱着伏羲女娲。下层刻东王公，羽人、青龙。

图2铺首衔环、伏羲女娲图。画面二层。上层刻铺首衔环，下层刻伏羲女娲交尾（沂南汉墓博物馆藏）。图3伏羲女娲图。画面刻伏羲女娲交尾，



图13

两边各一鸟（临沂西张官庄汉墓出土）。图4伏羲女娲、怪兽图。画面三层，上层伏羲女娲皆人首蛇身，相向曲尾相交（郯城县归义乡出土）。

2、二者分置于画像的上下或左右，两相呼应。

图5女娲执矩、戴日抱月图。画面二层，上层刻一人身蛇尾者执矩，右上角有一榜题，其四字不清。下层刻一人站立，头山有角，顶一圈轮，双手抱一圆轮，内有蟾蜍，上有榜题，刻字五行：“此□□□□日也□□□戴日抱月□□此上下皆□□□□圣人也”（费县城北潘家疃出土）。图13伏羲女娲、高谋图。画面刻伏羲、女娲皆蛇神人首，其间刻高谋（临沂金雀山汉墓出土）。

3、二者分立于墓门两侧。

图6女娲执矩、捣鸟巢图。画面上刻人身蛇尾女娲，手执矩，胸前一月轮，轮中有玉兔捣药和蟾蜍，右有朱雀和羽人。下刻一大树，树上有二鸟衔鱼，树枝间一鸟宿巢中，树下一人推树，一人执杆捣鸟巢。图7伏羲执规、祥禽瑞兽图。画面上刻伏羲，人身蛇尾，右手执规，胸前一日轮，轮中有金乌、九尾狐，右上露一羽人头，左有二羽人和一鸟首，下有两玉兔捣药，中蹲一虎首有尾神兽，双手持一网状物。下为一“山”字形斗拱，两边有蛇尾神人，尾部与柱相连，拱间二虎首，下有数小羽人（临沂吴白庄汉墓出土，临沂市博物馆藏）。图8伏羲执规图。刻伏羲执规，人身蛇尾兽足，身上一圆轮（费县城北潘家疃出土）。图9女娲执矩图。刻女娲执矩，人身蛇尾兽足，身上一圆轮（费县城北潘家疃出土）。

4、二者以单独形象出现。

图10伏羲图。画面刻伏羲，人身蛇尾兽足（临沂五里堡汉墓出土）。图11女娲图。刻人身蛇尾兽足女娲（苍山县城塑料厂出土）。图12羲和主日图。刻羲和主日（苍山县城塔山出土）。

以上前三种形式都突出表现了二者的密切关系，构成了二者对偶的人首蛇身形象的主体特征。

在全国范围内，伏羲、女娲的主体特征稍有不同：山东地区多以执规矩为主，即伏羲执规，女娲执矩，取规天矩地之意。河南南阳地区以执芝草为主，捧日月为其次，取长寿延年之意。四川地区以捧日月为主，即伏羲捧日，女娲捧月，取光明之意。虽然也有日月与规矩并存的现象，但不是主流。上述三种形式基本概括了伏羲女娲形象附属物的主要特征，各区虽并非完全如此，但其主流形象还是非常明显的。



平邑：六崮景观美沂蒙（上）

李莹

崮是沂蒙山区特有的地貌景观，地貌学上称之为“方山”，通常叫做“崮”，是古代寒武纪灰岩经受了中生代侏罗纪晚期的燕山运动和新生代第三纪的喜马拉雅运动中强烈的地壳切割和抬升，经过长期浸蚀、溶蚀、重力崩塌和风化等多重作用形成的，外表呈圆形、顶部平展、四周峭壁如削、峭壁以下坡度逐渐由陡变缓的一种地貌形态。

人们常说“沂蒙七十二崮”，事实上沂蒙山区有名可循的崮有数百座，加上没有名字的崮，总数达千余座之多。沂蒙山的崮数量多，造型美，分布密集，在我国乃至世界造型地貌中都属罕见。2007年，由地质和旅游专家组成的评审组通过现场考察评议，将其命名为“岱崮地貌”，是我国继“丹霞地貌”、“张家界地貌”、“嶂石岩地貌”和“喀斯特地貌”之后的第五种岩石地貌景观。



平邑县是“沂蒙七十二崮”的集中分布区之一。境内有名字的崮共18座，其中海拔500米以上的有6座，分别是摩云崮、茅草崮、马家崮、和尚崮、吴王崮和太皇崮。在这之中，摩云崮更是沂蒙第一高崮，海拔1025米。笔者试将这6座崮的突出景观胜迹和相关历史故事予以简述，以飨读者。

摩云崮

摩云崮俗称歪头崮，位于县城北偏东18.5公里处，面积1.5平方公里，海拔1025米。摩云崮是沂蒙七十二崮中最高的崮，也是蒙山山脉第三高峰，仅次于海拔1156米的蒙山主峰龟蒙顶和海拔1026米的第二高峰玉柱峰。

摩云崮与一般由古生代石灰岩沉积而形成的山崮不同，其山体由太古代泰山群系变质岩构成，主要岩性为黑云母斜长片麻岩、夹斜长角闪片麻岩、黑云母变粒岩和各种混合岩，岩层厚度大于5000米。片麻岩是一种深度变质岩，含有斜长石、黑云母、角闪石等多种矿物，并呈现定向排列的条带状。地球上岩石虽然多样，但可以总体上归纳为岩浆岩、沉积岩和变质岩三大类，前两类在地壳深部经过高温高压的改造，就可以形成变质岩。形成摩云崮的变质岩是山东最古老的岩石，它比古生代石灰岩的时代早得多，形成于地球的早期，至今已有20多亿年的历史，饱经了地球历史的沧桑，留下了多次地壳运动的痕迹。

摩云崮崮顶海拔千米以上，寒冻强烈，加上各种裂缝众多，经过千百年的风化、崩解和剥蚀，雕琢成三峰陡立、山势险峻而倾斜的特殊景观。当地将摩云崮三峰按高低分别称为大歪歪、二歪歪、三歪歪。从摩云崮东、北部观看，摩云崮三峰酷似一睡美人，其西部的大歪歪像美女头，中间的二歪歪像美女高耸的乳房，东边的三歪歪像美女的腹部。摩云崮森林覆盖率90%以上，崮上植被茂密，盛长松柏、刺槐等树木，人迹罕至。

摩云崮与北面茅草崮之间的山谷是蒙山西部有名的明光寺风景名胜区。这里清静幽僻，风光秀美，水声潺潺，石形突兀，峰腰山村，时微露于林木间，山岚映





带，景色极佳。游明光寺须从摩云崮西绕向北至山谷入口，然后自西向东沿溪而上，原为羊肠小道，现已修通柏油路，乘车可顺利直达。在明光寺景区中、东部向南、西南方向观看，可看到摩云崮顶睡美人景观。

摩云崮东南山连山，山套山，连绵起伏百余里。其偏东南1.5公里处，有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山体雕刻——蒙山寿星巨雕。寿星山东南不足1公里为蒙山主峰龟蒙顶。

茅草崮

茅草崮原名摩霄崮，位于县城东北21公里处，面积2.5平方公里，海拔高度777.5米。崮顶土层较厚，原盛长茅草，现松柏成林。茅草崮的山体结构以黑云母斜长片麻岩为主，其次为夹黑云母闪长片麻岩和其他混合岩，岩层厚度大于5000米，亦形成于地球的早期，是山东最古老的岩石，距今已有20多亿年的历史。

茅草崮处蒙山明光寺景区西北部，本身就是明光寺景区的一部分，其崮顶山形是景区中一处独特的自然景观。从明光寺景区西部向北观看或从茅草崮东南5公里处的蒙山主峰龟蒙顶向西北眺望，连绵起伏的群山中，有一白色山峰形如伟人毛泽东主席的头像，今称伟人峰，这名为伟人峰的白色山峰及附近群山就是茅草崮的各个山峰。茅草崮主峰南面山体呈白色，系长年雨水冲刷所致。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化了这一方的天地灵气，使伟人峰中的伟人像，五官清晰形像逼真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头像上那浑圆饱满的额头，方正赫然，深邃的眼睛，神采炯然，鼻梁匀称，鼻尖隆起，两唇丰腴，似开又闭。仔细观看，额头、眼睛、鼻子、脸孔、下额，无一不与毛主席本人面孔相吻合，连发型都与毛主席的惟妙惟肖。1999年，毛主席纪念馆管理局的范局长至此观看后连声说：“像，太像了，简直和真人一模一样。”此景观特别在晴朗的下午观看尤为清晰。

茅草崮以北为九女关。九女关西为大望山，大望山南有海螺寺，西北为白马关。九女关与白马关为蒙山主峰西麓两个险要关口，两关东西呼应，占之能控制蒙山南北通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马家崮

马家崮位于县城南17公里处，面积2.5平方公里，海拔高度690.5米。山体为沉积岩结构，顶端系厚层石灰岩。马家崮山形似马鞍，原名马鞍崮，亦曾称林家崮，后因此崮由当地马姓人家看管，故得今名。崮东北麓有林家洞，西北侧有马家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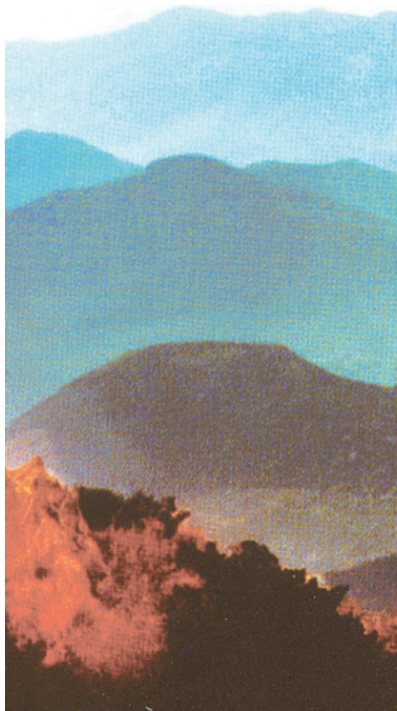
清朝咸丰、同治年间，鲁南地区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幅军起义，马家崮下水寨村村民程四虎领导的幅军就是其中的一支。程四虎，名九三，排行老四，外号程四虎，生卒年不详，清末幅军起义首领。其祖籍平邑县白彦镇石门村，后迁至马家崮下水寨村定居。1853年（清咸丰三年）7月，境内陈更池、薛得志等数十人在北部仲村镇仙姑山一带聚众起义，起义军与境内外各地幅军联合作战，势如破竹。程四虎得知后结幅聚众响应，首由白彦镇石门村起事，后于1860年（咸丰十年）立水寨为大营，树旗造反，修守寨圩，任用林献英为军师。张白旗，以白布缠头为识。势力迅速扩大。程四虎以水寨



摩云崮

为据点，率义军转战蒙阴、新泰、莱芜等地，攻打官府，杀富济贫，如有所获，交公分配。义军纪律严明，所向披靡。

1862年（同治元年）4月13日，程四虎联合滕县幅军马传山、岳相林部夜袭并攻占了平邑附近的南泉寨。4月29日，南泉寨幅军攻打平邑失利。5月份清军多次攻打幅军南泉寨，寨中义军奋勇抵抗，杀退清军。6月1日，清军先用火炮将寨墙炸毁，随后数千人从西、南、北三面向南泉幅军发起攻击。守寨幅军与清军激战半日后突出重围，退至马家崮下水寨大营固守。后清军纠集民团围攻水寨，程四虎联合周围张里寨、林家洞寨、大田地寨幅军凭险扼守。6月6日，幅军张里寨先失，6月23日，幅军林家洞、大田地两寨又失，水寨幅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6月24日，清军合地方民团七八千人进攻水寨，水寨幅军抵御不支，军师林猷英被俘，程四虎率部突围，退至宝泉崮。6月25日，程四虎联合邹县白莲池教军2000余人想分路突然杀回水寨，时清军重兵把守水寨各路险要，幅军、教军攻击受阻，激战3时许，毙清军把总司元魁后收兵。8月，清军会攻宝泉崮，程四虎率2000余人夺路东走，复回水寨大营。后因它处幅军此时已非败既降，程四虎势单力薄被迫投降清军。程四虎死后葬于马家崮下水寨之西苗家庄。其名字至今在当地广为流传，“程四虎，贾二郎，打起仗来真刚强。”



茅草崮

吴王崮

吴王崮因相传春秋时期吴王伐鲁时曾驻军于此而得名。位于县城东南14公里处，面积2平方公里，海拔653.9米。吴王崮下有二泉，名灵泉、东灵泉。灵泉前有元朝时创修的道观灵泉观，亦称大圣堂，现遗址尚存。

吴王崮所在的今平邑县西周春秋时期属鲁国。鲁国是公元前11世纪周初最早分封的几个重要的诸侯国之一，姬姓，开国君主是周公旦的长子伯禽，都邑曲阜。鲁国西周时期国力强盛，春秋中后期国势衰弱，战国时沦为小国，公元前256年为楚国所灭。春秋后期在鲁国日渐衰微的同时，建都于今江苏苏州的吴国却开始强盛。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一度帅师攻破楚国，后其子吴王夫差又于公元前494年战胜越国，迫使越王勾践屈服求和。吴国大将伍子胥请求夫差灭越以除心腹之患，但夫差因胜越而骄傲自满，不听伍子胥建议而许与越国议和。接着吴王夫差率师北上伐鲁，与晋国争夺春秋霸主。

《左传·哀公八年》载：“吴伐我，子泄率，故道险，从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于吴境田焉，拘鄆人之汙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吴师至，拘者导之，以伐武城，克之……吴师克东阳而进，舍于五梧，明日舍于蚕室……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水。”按此记载，公元前487年（鲁哀公八年）吴国攻打鲁国，先由鲁国人子泄作向导。子泄即公山不狃，鲁国人，他为使鲁国能有所准备，故意引导吴师走险路，称可从武城伐鲁以拖延时间。不巧的是，路上吴师又遇上一个从前曾因到边境种田与武城人发生矛盾被泼了一身污水的鄆国人给引路，并很快攻下了武城。接着吴师攻克东阳城，进军中又先后宿于五梧、蚕室、庚宗等地，一直打到当时鲁国的腹地泗上，即今泗水县泉林。而文中提到的武城、东阳、五梧、蚕室等地均位于今平邑县境内。

吴王夫差胜鲁后，一心北进争霸。公元前486年，吴人在今江苏扬州附



近筑邳城，邳城下凿邳沟，通过射阳湖至清江，沟通了长江和淮水。公元前485年，吴水师从海上北上伐齐。次年，大败齐军于今莱芜附近的艾陵。公元前482年，吴国挖运河北连沂水，西接济水，吴水师从吴都经长江、淮水可直达沂、泗、济三水。此时沂河水运上游可达今沂源县东里店。吴王为开挖运河耗尽了国力民力，而我国南北水上交通却从此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

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率大军到黄池（今河南封丘）会盟诸侯，与晋国争夺霸主。正当其踌躇满志争霸中原之时，南方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刻苦图强，越国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壮大了力量，乘机攻入吴国都城并杀死吴太子。吴王夫差闻讯匆匆赶回想与越议和，越王勾践不允，吴王夫差被迫自刎而死。《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曾引此故事作过一幅自勉联，联曰：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里秦川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战斗在沂蒙山区的抗战老英雄

——范明枢传奇

牛之营

范明枢是山东省重要党史人物之一。他的一生颇富传奇色彩，在山东的革命队伍中，他拥有好几个“第一”的桂冠：

其一，1940年7月，74岁的范老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当选为山东省参议会议长。他是第一任议长，在任7年之久，可谓两个“第一”。

其二，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他以79岁高龄由中共中央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号称八旬入党，在各抗日根据地轰动一时，当时延安的《解放日报》在头版以《我党和人民的光荣》为题，作了热情洋溢的报道。范老入党年龄之高，批准机关之高在山东独一无二，在全国大概也属罕有。

其三，1946年1月，在华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华东局、山东分局党政军领导破例隆重集会庆贺范老80岁寿辰，新四军首长陈毅、罗炳辉将军亲自到会为范老祝寿。其场面，其规格，在山东堪称空前绝后。

其四，在泰山之阳的范明枢墓碑上刻有两条题词，左为时任（建国初期）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长谢觉哉所题“永远是人民的老师”；右为时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所题“革命老人永垂不朽”。题词的内容，题词者的身份规格，在山东逝世的革命领导干部中，也是少有的。

范老一生以兴教办学、爱国正义、追求进步而享誉齐鲁。他把自己的生命与祖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中华民族屡遭列强欺辱的时代，每逢祖国遭难的关键时刻，他总有一段惊人之举，其情节感人至深，其精神永昭后世。



战斗的一生

范老家住泰安城元宝街，1866年1月出生。幼年家贫，其父以微薄的收入供他上学，时断时续。青年时期他先考中秀才，后选为增生。他一边在家乡兴学施教，一边继续学习。而立之后，先后考入泰安著名学府泰山书院，济南山东师范学堂。1905年8月，他和30余名优秀学生被政府保送赴日本留学，期间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力主推翻满清，建立民国。

民国建立以后，他全力倡行“教育救国”，专心投入教育事业，先后任山东省教育厅干事、教司，省立第六中学（菏泽）、省立第一师范（济南）学监兼教员，任省立曲阜二师校长8年，1930年底到济南乡师任图书管理员，1932年被隐居泰山的冯玉祥聘做古文教师，主讲《春秋》、《左传》。共同的爱国情怀使他俩相交甚密。范老与冯将军合作，在泰山前创办武训小学。冯玉祥出资，范明枢任校长，共办总校、分校15处，以半工半读形式收录大批贫民子弟入学学习，成为泰安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七七事变”后，年逾古稀的范老先后被推选担任“泰安各界抗敌后援会”主任、“泰安民众抗敌总动员委员会”主任、“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鲁、苏、皖地区）常委等职。1937年底日军占领泰安城前夕，泰安县委安排他到泰山后的郭家庄隐蔽。他积极配合县委开展抗日斗争，组织当地杂牌、会门武装共同抗战，1938年夏秋以动委会名义建立了“泰东人民抗日武装联防办事处”。同年10月，他被接到沂蒙山区的蒙阴县，跟随山东省委活动。

在沂蒙山区，范明枢先是担任鲁南抗日救国民众总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1940年7月被选为山东省临时参议会议长。他领导参议会积极推动山东民主政治建设，坚持团结抗战，为山东抗日根据地建设作出积极贡献。省参议会和范明枢出色的工作，赢得了党和人民的信任和赞誉。1943年9月11日，毛泽东主席曾致电表扬山东省参议会“坚持敌后，艰苦奋斗，不屈不挠，为民族申正气，为全国作榜样，凡属国人，莫不钦佩。”范老被根据地军民誉为“抗战老英雄”、“抗战老寿星”、“革命老人”、“泰山青松”等。

抗日战争胜利后，范明枢积极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而斗争。内战爆发后，他奋笔撰写了《为内战告全省同胞书》及《致司徒雷登一封公开信》，揭露美蒋狼狈为奸，发动内战的罪恶阴谋，号召全省人民团结起来彻底打败美蒋的猖狂进攻。

1947年4月，国民党军对陕北、山东实行重点进攻，党组织将他和省参议会的几位老人转移到后方的渤海区乐陵县（现德州市）五里岔村，他依然坚持看文件、阅报纸，关心战局。是年10月2日范老因病逝世。山东各界组成了以陈毅、黎玉等11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在乐陵县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华东局、山东省参议会、山东省政府、华东军区司令部均发出唁电，山东省政府、华东军区指示各地，自10月12日起各机关、部队、学校下半旗一天，停止娱乐活动3天志哀。

由于在战争环境中，范老被临时安葬于五里岔村东北边的一片桃林里。1950年12月，山东省政府根据范明枢生前的遗嘱，将他的灵柩迁葬于泰山脚下普照寺前原武训小学校址前面，墓葬由泰山花岗石砌成，松柏掩映，庄严肃穆，成为人们游览泰山的景点之一，也是纪念、祭奠范老的重要场所。

传奇故事

五四运动中——他头撞军警刺刀，带领学生冲出学校去游行

五四爱国运动发生在1919年5月，发生的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召开“巴黎和会”，中国作为战胜国出席，到会的帝国主义列强拒绝中国的正当要求，要把这次大战期间德国强占山东的各项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而卖国的北京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这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北京学生首先上街集会游行，5月4日遭到北洋政府镇压，运动很快波及全国。运动直接涉及山东，山东的规模声势更为浩大，中坚力量是广大青年学生。

这时，范明枢正在省立第一师范任学监和语文教师，他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身这一伟大斗争。6月12日晚，济南各校学生代表在省立一师召开秘密会议，决心对反动当局掀起

更大规模的斗争高潮。年过半百的范明枢和著名爱国人士、这次运动的山东教育界代表鲁佛民来到学生中间，一来表示支持，二来给他们出谋划策，他俩和大家一起研究了第二天的具体斗争措施。反动当局好像有所觉察，山东督军张树元和戒严司令、济南镇守使马良第二天一大早就派出几千军警包围了各校，妄图阻止学生出校活动。省立一师的师生们集合整队走到校门时发现学校已被反动军警团团围起来，一队军警荷枪实弹严严实实地堵在校门口，学生们与军警发生了争执，僵持在校门口，根本无法出去。站在队伍中的范明枢愤愤地走上前去大声质问军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们为什么阻挡学生的爱国行动？”

“我们是执行上头的命令。”军警们搪塞着，丝毫没有退去的意思。

军警不放行，范明枢气的嘴唇发青。他忽然大喊一声：“豁上我这条老命啦！”猛地低头向军警们的刺刀撞去。众军警猝不及防，吓得急忙向后闪躲，大门立刻闪出一道缺口，师生们立刻在范老的带领下潮水般涌上街头，汇成一股强大的革命洪流。

省立一师的带头作用，有力推动了山东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而范明枢的这一壮举也震动了泉城，感动了全省人民，他从此蜚声齐鲁。

“九·一八事变”后——他怒斥当局不抵抗，六十六岁蹲大狱

1931年初，范明枢被他的老朋友、济南乡村师范校长鞠思敏聘请来乡师担任图书馆主任。这是一所红色学校，在校长鞠思敏支持下，共产党活动很活跃。范明枢和年青党员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千方百计帮他们购买进步图书，并秘密跟他们一起阅读学习马列的著作。他更加倾向革命，被革命的师生尊称为“老青年”。

这年9月发生在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在山东，中共山东省委发出了《通告》和《宣传提纲》，组织爱国师生开展反日救亡斗争，范明枢和济南乡师爱国师生积极投入到反日救国的洪流之中。

初冬的一天，乡师师生召开声讨日寇侵略大会，范明枢早早地来到礼堂的前排坐下等待开会。声讨会开始了，主持会议的学生会主席、共产党员刘开浚（即潘复生，1908—1980，山东文登人，曾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东北局书记处书记，沈阳军区政委）刚说完开场白，年过花甲的范明枢就第一个疾步走上讲台。只见他一手摘下头上的瓜皮帽，花白的胡须抖动着，冷峻的目光扫视着全场，疾言厉色地怒斥日寇的侵华野心，抨击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呼吁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奋起抗御外侮。最后他高喊着说：“民国这个招牌已经挂了20年了，我们没有看到民主，却一下子失去了这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我不老，你们更年青，我们应当大家努力！”他充满激情的发言，句句打动着人们的心弦，有的学生掉下了眼泪。

声讨大会后，乡师派学生参加济南学生赴南京请愿的活动。当学生代表出发时，范明枢和鞠思敏亲到校门口送行，他对学生代表们说：“你们这次出行，关系到国家前途，我们等候你们胜利归来！”当学生们被当局阻挠而被困在济南火车站时，他冒着严冬的寒风到车站慰问学生，心疼地回来给他们筹集御寒的物品。

1932年3月20日凌晨4点多钟，军警包围了学校，在闪着寒光的刺刀下，范老和几位进步教师被逮捕。原来韩复榘任山东省省主席的国民党省政府在山东搞了一次大逮捕，目标是参加反日救国斗争的共产党员和爱国青年。范明枢的这次讲演等爱国举动，激怒了反动政府，他被怀疑为“共党”。和他一起被捕的有共产党员刘开浚、进步教师陶钝（山东诸城人，曲艺研究家、作家）等7名师生。

范明枢被带上铐关进监狱。一位66岁的老人因为爱国而受牢狱之苦。监狱阴暗潮湿，十几个人挤在一间狭小的狱室里，睡觉都难以翻身。同狱室的陶钝说：“范先生这么



范明枢（右一）
与黎玉

大年纪也来受这样的苦，我觉得非常痛心。”

范老回答说：“快别这样说，我能同青年们一起过这种生活，这是我的光荣！”青年们很受鼓舞，提高了斗争的勇气。

警察厅长两次过堂审讯范明枢，每次都被这个老头子耿直倔强的回答弄得无可奈何。譬如警察厅长问：“你为什么看那些异端邪说？”

范理直气壮地回答：“这些书是真理，我服从真理，所以我看。”

“你是不是共产党？”

“惭愧啊，惭愧！我现在还不够条件，将来够条件了我要争取加入共产党。”

警察厅长加重了语气说“当共产党要杀头的！”

“这个我知道啊。人生百岁，终有一死，我已是白发老人了，还能活几年？只要对国家有利益，参加了共产党，死了也是光荣的！”

在狱中，有一件放心不下的事始终折磨着范明枢。一天半夜，他忽然从梦呓中大哭起来，青年们都被惊醒，忙过来叫起老人家问怎么回事。范老醒来说：“噢！没什么，是做梦。”他定了定神解释说：“我别没什么心事了，儿子们都少亡了，女儿们也都出嫁了，我只挂念那个8岁的小孙孙。他一直跟着我，和我一床睡。被捕的那天，小孙孙被惊醒，很害怕的样子。当坏家伙们拉我走时，他拉着我的衣襟哭着喊爷爷，被坏家伙们一把推倒。我去安抚孩子，军警们打了我一耳光，硬硬地把我拉走了。刚才在梦里小孙孙哭着喊爷爷，把我的心都给搅碎了。”青年们听了都既心酸又同情，陪着他坐到天亮。

由于范老在山东很有威望，军警们不敢对他下毒手。两个月后，寓居泰山的冯玉祥将军受托过问此案。省主席韩复榘是他西北军时的老部下，冯玉祥修书一封让孙副官送去，以训斥的口气要韩赶快放了范明枢。1932年5月下旬，范老被营救出狱，结束了60多天的牢狱生活，回到家乡泰安。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被冯将军聘为古文讲师，为他讲授《春秋》、《左传》、《国语》，二人成为至交。

抗日战争爆发——他年逾古稀，奔走呼号，痴心抗日救亡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大举入侵中国。在新的形势下，共产党和国民党实现了又一次国共合作，以此为核心形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人民投入了伟大的民

族解放斗争。在这关系国家存亡的历史关头，年过古稀的范明枢，又以常人所不能比拟的毅力和激情走在了抗战的最前列。这里仅举几例。

领导抗战组织，致力抗日救亡。七七事变的第二个月，他就和泰安民众教育馆馆长、和党失掉联系的共产党员马馥塘发起成立了“泰安各界抗敌后援会”，被推举为主任。他不顾年迈，动员各界人士踊跃捐资，支援抗日前线，还组织抗战剧团下乡进行抗日宣传。与此同时，范老还被驻徐州的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聘为“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常委。9月，他以常委名义和刚建立起来的泰安临时县委成立了鲁南动委会泰安分会，即“泰安民众抗敌总动员委员会”，被选为主任。中共泰安党组织以此动委会的名义，放手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起义。范老曾南下宿县、滕县，以自己的名望，联络社会上层爱国人士、故友、学生等商讨抗战。殷切地鼓励滕县的社会名流、军人出身的孔昭同组军抗战。孔先生后来在当地党组织的支持下组建了抗日队伍，成为八路军总部任命的鲁南（曲、泗、邹、滕、费）五县游击司令。

自雇木轮车，四处奔走宣传抗战。这时候泰安党组织正按照中共山东省委的要求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游击队，配合省委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范老四处奔走，宣传抗战。他年迈走远路不行了，就自己花钱雇一辆独轮小车让人推着下乡。他花钱石印了许多抗日宣传画，还让画家用床单画了一幅，用两根竿子撑起来绑在车上，在集市，在街头，揭露日本侵略者侵占我国东北的罪恶，讲述东北人民做亡国奴的悲惨，鼓励大家起来抗战。老人家讲起来有时声泪俱下，使在场的群众也激愤掉泪。一天，范老让人推着走了50多里路到了泰安东南、徂徕山南头的东良庄小学，找到了青年教师赵一川。他坐下还没来得及喝茶，就神态严肃地说：“我这次来贵村，就是联络志同道合的有志之士参加抗战的。”赵一川对范老说：“村里许多爱国青年准备了大刀、红缨枪，鬼子来了就和他拼！”他听了十分高兴，不顾一路劳累，立即让赵一川从村里把青年们请来，范老很激动地向他们作了动员：“后生们，咱们都是中国的子孙，日本侵略军已经占据了咱华北大片土地，下一步就是咱们山东了，咱们能等着当亡国奴吗？”“……咱们要组织起来，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参加游击队，起来抵抗日本侵略军！”范老讲得言词激切，青年们都被这位老人的抗战情绪所感染，当场就有60多人报名参加自卫团。范明枢看到这动人的场面，高兴地说：“看来咱中国亡不了啊！”中午，他拒绝了学校的招待，借他们的锅灶煮了自己带来的两把挂面，赵一川让工友给他偷偷放上了几个鸡蛋，吃饭时他分给推车的两个，吃完就离开东良庄往回赶路。

热情支持青年参加徂徕山起义。抗战爆发时，范明枢还担任着泰山武训小学的总监，校长是张雪门。1937年9月份，“民先”山东省队部介绍“民先”队员胡寅、蒋平、刘春三人来泰安，由泰安临时县委书记、武训小学教师鲁宝琪领着来见范明枢，要求以任教为掩护筹备发动抗日武装起义。范老满口答应，立刻让车工拉着到泰山前的总校去找张校长。他说：“三位先生是我请来的，无论如何得上山（当教师）！”张校长面有难色，因为战乱，加上冯玉祥将军已离开泰山回南京一年多，学校运转困难，无法再增加人了。范老决心已定，遂让鲁宝琪（他们是亲戚）和他的孙女范立兰（又名范琳）辞职，让刘春三人接替他们到校任教。三名青年对范老的大义之举十分感动。不久，泰安县委在武训小学建立了由周明（王之盈）、蒋平、刘春组成的党支部，还组成了“学生联合会”，在范老和张校长支持下，学校的工作更加活跃。刻印抗日宣传材料，上街演出救亡剧目，动员同学参加游击队等。12月27日，刘春等接到了省委通知，到徂徕山集合举行抗日武装起义。武训学校的鲁宝琪、蒋平、胡寅、刘春、阎华、杨凤彩（后改名韩纪文）、李兆全、朱宝琪（后改名田琪）等10余名师生参加了起义。刘春等几人临行前去给范老告别，老人家正按照县委的安排准备到泰山后乡下亲戚家躲避，见几个青年到来，十分热情，连忙吩咐家人烙煎饼做饭给青年们壮行。即将走上抗日战场的几位青年吃着又脆又香的煎饼，心中感

到无比的亲切和温暖。范老的孙女范立兰早已父母双亡，她在武训小学辞职后就参加了县委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并决心跟未婚夫、泰安县委书记夏辅仁一起参加徂徕山起义。范老十分支持，在前几天已经打发他们上了徂徕山。1938年1月1日，在山东省委领导下，在徂徕山西麓的大寺成功举行了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武训小学的10多名师生成为光荣的八路军战士。

抗战周年纪念——他跪石宣誓，临险不动，高呼“鬼子来了我对付！”

1937年底，日军侵占泰城前夕（12月31日占领），范老携四儿媳和孙子范杭转移到泰城东北80余里、泰山之后的郭家庄亲戚家暂避。他在郭家庄办学教书，宣传抗日。因为他是泰安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主任，县委的一些领导同志经常来找他商量工作，范老积极地配合泰安县委开展地方抗日斗争。

1938年7月7日是抗战一周年，泰安县委、县动委会决定组织各界代表在山口镇召开纪念大会，进一步激发人们的抗战决心。范老带学生们去参加。山口镇在泰安城以东40里，郭家庄南30里。当他们快到山口镇的时候，只见泰安县独立营的战士们撤了过来，个个面色冷峻，说约两个小时前，县独立营在泰（安）莱（芜）路上的油坊村附近和日军打了一场遭遇战，副营长马子刚和一位战士壮烈牺牲，泰安县委决定会议转移到泰山后的麻塔村去开。听到这些，气氛骤然紧张沉重起来。范老带着学生掉头闷闷地往回走，没有一个说话的。

麻塔村在山口镇北的山里边，会场选在一座破庙前的场地上，碎石遍地。大会成了纪念会和追悼会两项内容，而且是追悼抗战牺牲的两位烈士，会场的气氛既悲怆又激昂。

会议开始后，各界代表依次发言。这时已到盛夏，天气酷热难耐，发言者挥汗声讨敌人罪行，表达抗战决心，追念牺牲的烈士。范明枢代表动委会发表演讲。他想起了“九·一八”以来，“七七事变”以来日本鬼子的罪恶，想起了亡国奴的悲惨，更痛惜马副营长两烈士壮志未酬身先死，激动得胡子直哆嗦。只见老人家站在众人面前，情绪激愤，滔滔不绝地控诉日军的罪行，大讲团结抗日，卫国保家。他不避酷暑，越说越激动，只讲得唾沫飞溅，声音颤抖，嗓子嘶哑。叫人端来一碗凉水喝了继续讲。最后，他为了表示誓死抗倭的决心，不顾人老骨瘦，夏衣单薄，噗通跪在满是碎石的场地上，领着人们宣读抗战誓词。全场会众被老人家救国的痴情所感染，纷纷跪到石子上，跟着范老一句一句地高声宣誓。抗日的呼声震撼山谷。

正在宣誓的时候，南山突然起火，有人以为日军从南边追过来了，县委领导立即派人去查明情况。为免发生意外，县委组织部长朱玉干、山口镇“抗委会”主任姚新府劝范老赶快转移。这时会场有些骚动，有的人开始撤离。可范老跪在地上就是不起来。他坚决地说：“你们带领群众转移吧，我老头子不走了，小鬼子来了，我对付他们！”

后来查清，原来是一个看山的窝棚起火，是一场虚惊。但是大家对73岁的范老更加敬佩了。

艰难岁月中——他深山住茅屋，山洞避日寇，耄耋老人坚持抗战

范老到沂蒙山区后，驻东里店（当时属沂水县，现属沂源县）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极力拉拢范老跟随他当抗战招牌。沈是个坚决反共的顽固派，他提出“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屡屡跟八路军搞摩擦。范明枢对此很反感，坚决不在东里店，住在靠近山东分局（省委）的蒙阴坡里镇，铁心追随共产党抗战。他担任了鲁南抗日救国民众总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积极推动抗战；参与筹办省第四联合中学，经常在《大众日报》发

表激励民众抗战的言论，深受抗日青年们的追捧。

1940年，德高望重的范老又担起了更大的抗战责任。这年7月下旬至8月中旬，在中共山东分局领导下在沂蒙山区的青驼寺（今沂南县）召开了“山东各界人民代表联合大会”。这个大会选举产生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范明枢当选为参议长。8月1日，省参议会举行隆重的就职典礼，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当监誓人，范明枢率81名参议员肃立宣誓，决心接受山东民众之付托，代表山东民众意志，彻底实行抗战建国纲领。随后他主持参议会选举产生了全省统一的政权机关——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黎玉被选为主任委员。8月17日，省战工会举行宣誓就职典礼，范明枢当监誓人，听取黎玉宣读了誓词。这时候，共产党领导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已建立了7个区党委，9个专员公署，66个县的抗日民主政府。参议会和省战工会的建立，统一了对山东抗日根据地政权和民意机关的领导，更加有利于全省的抗战工作。

此后，在范议长的领导下，山东各级参议会迅速发展，充分发挥了既是民意机关，又是权力机构，还是统一战线的组织的多种职能，为坚持山东抗战作出了突出的历史性贡献。

1942年，由于日伪军以主要力量对付共产党八路军，疯狂扫荡、封锁抗日根据地，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根据地军民英勇坚持斗争。这期间，76岁的范参议长在组织上的照顾下，多次转移，1942年秋把他安置在沂水县一个十分隐蔽的小山村桃花坪。为什么住这里呢？一来桃花坪位于沂水、沂南、蒙阴三县交界处。村庄座落于在高大的龙盘崮西头的山脚下，这里地势很高，交通闭塞，从山下上这村来，只能步行，而且要走近一天，是个很隐蔽的地方。二来桃花坪村党的基础和群众基础较好。70多户人家，300多口人，村民朴实善良；党员30多个，党支部很坚强，抗日工作很活跃，是沂蒙根据地的中心点。

村党支部为保证范议长的绝对安全，把他安置在村北半山腰一处看山的房子里，两小间北屋，两小间西屋，屋前有处羊圈，四周树木茂密，山下很难发现，而在山上却能俯瞰全村和其他村庄。范老在这里只有四儿媳车秀轩一人照顾，村里只派一个忠厚的青年王兴余给他们送水送饭，这样不易暴露目标。范老在这里住了四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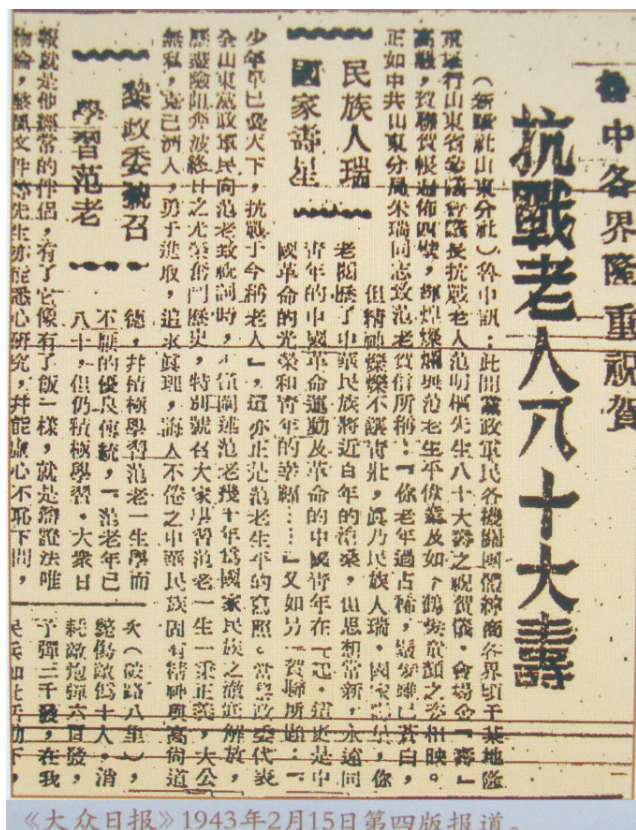
范老来到桃花坪不久，日伪军的大“扫荡”就开始了，远处传来了枪炮声，村党支部为保证范老的绝对安全，派人将范老藏进茅屋下半山腰一个山洞里，然后用石块把洞口堵上，村里每天派人给他老人家送饭。可日子一长，洞口踩出来一条路。村支书董廷会一看，坏了，不然要暴露目标。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在洞前垒了个羊圈，羊整天踩，就什么也看不出来了。范老在岩洞里过了17天，直到日伪军大“扫荡”结束，才把范老接出来。这17天在黑黑的洞里，就是年轻人也难以忍受，何况一个76岁高龄的老人？有人关切地对范老说“把您老人家寂寞坏了把？”范老一副不在意的样子，一向好说笑话的他风趣地说：“我不寂寞啊！晚上有羊做伴，廷会真有办法。”“你们看，我下了蛰，这不又出蛰了！”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范老在桃花坪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抗日根据地建设。1943年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78岁的范老别的不能干，就在山上带头植树，头年秋和第二年春他在居住的地方亲自栽种苹果树、花椒树和杂色树70多棵。他还发动村里的人都动手植树，开荒种地。为此他还作了一首《种树诗》，发表在1944年3月29日的《大众日报》：

人人都嗔我多事，我说无事不是人。

生性本来好栽树，那堪寂寞度新春。

范老有一把长长的胡须，一天他把胡子辫了起来，笑着对大家说：“我把它也组织起来了。”他为什么这样说呢？在1943年11月，毛泽东主席在陕甘宁边区英模大会上有个讲话，题目就叫《组织起来》，范老是引导党员群众学习毛主席这篇讲话，搞好大生产运动。群众看到范老先生带头，生产劲头更足了。党支部领导桃花坪村组织了变工组，集股



《大众日报》1943年2月15日第四版报道。

办起了纺织合作社，纺线织布供给部队，增加农民收入。1944年桃花坪又是大生产模范村，在鲁中区召开的劳模大会上得到一头大黄牛的奖励。这些成绩，当然与范老的带动、鼓励分不开。

范老虽然住茅屋，睡草铺，与孤单寂寞相伴，但始终对抗战充满信心，时刻关心着抗战事业。他每天看报纸了解抗战时局，山东分局、参议会和地委的同志时常来看望他，他总是十分关切地询问抗战情况。他常对干部们和村里的党员群众说：“别看小鬼子猖狂，但他们蹦哒不了几天了，只要大家齐心，一定能将日本侵略者赶出去！”1944年抗战形势好转，他对抗日军民艰苦奋战取得的这一大好形势感到是“最痛快最高兴的大事”。1945年7月中央特批范老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心情异常激动，郑重地向党向人民立下了“余现虽然年迈力衰，唯一息尚存必当奋斗到底”的誓言。他工作干劲更足了，不顾山高路陡，为抗战四处奔忙。他见到山外来的同志，首先打听反攻胜利的消息，恳切的对他们说：“我这七八十岁人，什么心事也没有了，只要看到小鬼子完蛋就足了！”

范老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上世纪九十年代，省委党史研究室把范明枢确定为山东省重要党史人物之一，要求为他立传，《泰山青松范明枢》一书，1996年5月出版。这部书由当时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薄一波题写书名，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赵志浩以《永远纪念范明枢同志》为题作了序言。赵志浩在序言中对范老作了四句话的高度评价：“范老先生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范老是山东德高望重的著名教育家”；“范老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范老还是不断学习，追求进步，追求光明，追求真理的楷模”。

王羲之

唐士文



羲之爱鹅图

王羲之（303—361年），字逸少，琅邪临沂（治于今山东临沂市兰山区白沙埠镇诸葛城村）都乡南仁里（今白沙埠镇孝友村）人。东晋著名书法家。系西晋光禄大夫王览第四子王正孙。其父王旷，官至淮南太守。

王羲之生于琅邪临沂，建兴元年（313年），11岁时随“临沂诸王”举族南迁建康（今江苏南京市）。王羲之幼时，说话迟钝，由于刻苦学习，不久便为人所重。当时陈留人阮裕负有盛名，为王敦的主簿。王敦对王羲之说：“汝是吾家佳子弟，当不减阮主簿。”阮裕也把王羲之、王应、王悦称为“王氏三少”。他13岁谒见吏部尚书周顗，顗察而异之”。当太尉郗鉴派人到王导家求亲时，王羲之在东厢坦腹而食，旁若无人。郗家门生回去将此情禀报太尉后，郗鉴遂将女儿郗璿许配于王羲之。今女婿被称为“令坦”、“东床”，实源于此。他于咸和二年（327年）出仕任秘书郎，与会稽王（司马昱）友。咸和五年（330年）任临川太守，咸和七年任吴兴太守，咸和九年任征西将军庾亮的参军、长史。咸康六年（340年）任宁远将军、江州刺史。朝廷数次征召入朝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在扬州刺史殷浩写信相劝下，于永和七年（351年）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故世称王右军。他为官主张实行清明政治。任会稽内史时，多次开仓赈济灾民，并上书减少老百姓的繁重赋役。他生活清简，反对骄奢淫逸，主张以敦朴为天下治。永

和十一年（355年）因和扬州刺史王述不和而辞职，定居会稽山阴。升平四年（360年）定居剡县（今浙江嵊州市），次年去世，享年59岁。

王羲之爱鹅，佳话很多：会稽有一孤居姥，所养之鹅善鸣，他以钱求购未得，便往观看。姥闻其至，烹鹅以待，他叹息不已。山阴有一道士，养一群好鹅，王羲之非常喜爱。道士说：“你给我抄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他欣然答应，写毕笼鹅而归。唐代大诗人李白有诗“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李白在《右军》诗中又写道：“右军本清真，潇洒出风尘。山阴遇羽客，邀此好鹅宾。扫素写道经，笔精妙入神。书罢笼鹅去，何曾别主人。”据说，王羲之爱鹅，与揣摩写字有关。他通过鹅的动态，体会用笔方法，达到执笔的十指如鹅头昂扬微曲，运笔时像鹅掌拨水而尽力挥洒。

王羲之初师从其叔父王廙和著名女书法家卫夫人（卫铄）学书法，后来，草书学东汉“草圣”张芝，正书学魏书法家钟繇，经过推陈出新，博采众长，一改汉魏以来的质朴书风，创造出一种妍美流便的新书体。有一次，王羲之在蕺山见一位老妇卖六角什扇，便将其扇上各书五个字。老妇因其将扇子弄脏，一脸怒色。王羲之说：“你只要说是王右军书写，每把百钱。”果然人们争相购买。其书法为世人所重，由此足见一斑。其书法对后世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唐代人李嗣真《书后品》始称他为“书圣”。当时的评论家认为其书法“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梁武帝认为：“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跃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古今书人优劣评》）唐太宗评其书法说：“详察古今，研究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风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晋书·王羲之传》）。

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年）三月初三那天，王羲之邀集谢安、孙绰、李充、许询等41位文朋诗友，“修禊”于兰亭，饮酒赋诗抒怀。他把诸名士的诗辑为一本《兰亭集》，自为此集作序，并将序文楷书，成为享誉中外的《兰亭集序》墨迹（原书28行，共324字），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

王羲之书法理论著作有《自论书》、《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书论》、《笔势论》（十章）、《笔势论十二章并序》、《草书势》、《用笔赋》、《笔经》等；散文有《兰亭集序》、《誓墓文》和《赞蜀中山水》、《月仪书》等；诗歌有《兰亭序》（二首）、《答许椽诗》（二首）等。其他著作有政论文《报殷浩书》、《上司马昱笺》、《致殷浩书》、《与谢万书》、《临护军教》、《与桓温笺》等。他的作品，后人辑成《王右军集》两卷。其书迹刻本甚多，正、行书以《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兰亭集序》、《快雪时晴帖》；草书以《姨母帖》、《初月帖》、《忧悬帖》、《丧乱帖》最著名。其书法真迹现已无存，唯有唐人双钩廓填的行书《姨母帖》、《奉橘帖》、《丧乱帖》、《孔侍中帖》及草书《初月帖》等。

王羲之有七个儿子。第七子王献之善书法，人称小圣，与其父合称“二王”。

老城夜话

(连载)

刘家骥

南马道巫婆聚会 西菜园神汉骗人

南城门的西侧是登城的马道，马道前有一门称马道门。马道门向西的一条小巷称南马道巷。巷南是城墙的背阴，过去是一片官地，后来一些无住房的穷人便在那里搭棚居住。时间久了，就汇聚起几十户人家，一些棚房逐渐改成了土墙草房。

这些居民中有一黄姓人家，夫妻俩过日子。后来丈夫病死，这妻又换了几任丈夫，不久就又都离了。原来这个女人就装神弄鬼，自称有仙家附身。她拜了一个名叫“红姑娘”的老巫婆为师，学会了一套跳大神的歌咒，并声称是黄鼠狼附身，称“黄姐姐”。外人当面称她黄大仙，背后称她黄巫婆。这正如朱柏庐《治家格言》上所说：“三姑六婆，实淫盗之媒”（三姑乃是尼姑、道姑、卜姑；六婆是：巫婆、媒婆、稳婆、虔婆、牙婆、药婆）。这黄大仙因给某贪官指点前途而算准了，从此出了名。于是一些贪官、财迷、



1945年的临沂城南门

做了亏心事的人都找她来“消灾”、“指点前途”……。上当受骗的还有不少病人。许多年轻巫婆也拜她为师学骗术。她每年还要在家搞两次大聚会：一次是三月十五日，一次是八月十五日。她称之为“皇经会”。聚会的内容是交流骗人的经验、拜师收徒，大吃大喝三天。谁知乐极生悲，这位黄大仙在民国二十五年的三月十五日聚会上表演跳大神时心脏病发作，当场就死亡了。

有巫婆就有神汉。旧社会的临沂城神汉中有名的当属南关西园的胡神汉。此人姓胡名真九，曾读过小学，经商不成又在赌坊鬼混了几年，终究未能发财，于是当了一名神汉。由于城关的巫婆神汉大部分不识字，而他上过小学，故此不久他就成了神汉当中的头目。巫婆和神汉皆称他为胡师傅。他顺水推舟自称是狐狸仙附身。狐胡音近似，从此又称他为胡大仙。这个胡神汉的骗术远远高于其他神汉巫婆，他曾去江苏宿迁跟一个变戏法的学会不少小魔术。他卖“仙药”时从不说是他家的，而是当着求仙药人的面用变戏法的办法从空中取药，让人以为是神仙赠药。他还收买了不少眼线专门打听人家的隐私，等他们前来求神时便能说得让人口服心服。

这个胡神汉还给人消灾送鬼、安胎、说阴亲。由于他识字，巫婆神汉集会时他便书写文书领念经文。因他住在东南关西园，故他又称他是“西天皇经会”。他的组织很大，每年还组织去泰山进香，借机聚敛钱财。他还联合巫婆捐钱置办了一套经箱，他自任经头，经常给人家去消灾祈福名曰“做会”。少则一天，多则三天，骗吃骗喝骗财。

解放后，这些神汉巫婆并没有收敛他们的行为。装神弄鬼，诈骗钱财卖仙药致死人命，包办买卖婚姻，造谣生事，求仙药喝神水，无所不为。在取缔反动道会门时，政府将胡真九等首恶的神汉及刘媒婆为首的巫婆判处劳改。后来胡神汉病死在劳改队里。

七夕七女拜织女 九重九老祭寿星

中国农历的七月又称巧月，这月的初七就是中国传统的七夕乞巧节。古典名剧《长生殿》就有李隆基与杨玉环七夕乞巧的故事。过去在临沂，乞巧节已不是为爱情而乞巧，也不是所有人皆乞巧，而是未婚女孩为求织女传授女红技艺的日子，因此临沂的七夕乞巧就限于未婚女孩了。

进入七月后就开始准备乞巧活动了。因为必须要七个女孩参加，所以七夕前几日正是组织七人小组的日子。七人定下后再选择地点和购买供奉织女的瓜果。地点一定要选一个僻静的院落，因为活动时不能让外人看见更不能让男孩看见。七月初七的夜晚满天星斗，一片月牙挂在天空，这时乞巧活动就开始了。先在院中设一香案，摆上各种瓜果，点上香烛。为首的女孩先给织女上香叩拜，然后每人要向织女乞求传授绣花做针线纺织等女红技艺。大家祈祷后就开始进行穿针的活动。穿针是乞巧活动的最高潮：每人准备好一根针和一根线，对着月光进行穿针。视力好的很快就穿上了，视力差的要费时很久才能穿上。穿完针后乞巧就算是圆满结束，然后大家开始分食供织女的瓜果。会乐器的开始演奏音乐，吹箫吹笛弹月琴。在外边的家长听到院子传出乐器声就知道孩子们的乞巧活动结束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进步，女孩无需再学习女红了，七夕七女乞巧的习俗也逐渐被人淡忘，只留下这美好的传说了。

旧历九月初九是中华民族传统的节日重阳节。九在《易经》中是最大最高的数字，九月初九双九相重，此时又是秋高气爽的好季节，因此古人有登高的习俗。临沂重阳节登高的习俗也由来已久。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一篇《癫道人》的故事就是描写临沂人去蒙山登高的故事。抗战前临沂城还有人重阳节时组织人去蒙山登高。但古城离蒙山太远，交通又不发达，多数人还是就近登高了。据临沂县志记载，最佳登高处是今兰山区李官镇的茶叶山。茶叶山平地拔起非常陡峭，登山盘道两旁植有松柏，山半有泉曰澄金泉，泉旁

有白云寺。寺中原有古茶树，此山以此而得名。至山顶有玉泉殿和文昌阁，南可观望郡城，东可看沂河流滔，西北可观蒙山巍巍，故此每逢重阳府县两级的官员皆来此登高。此山虽好但终究还是离城较远，年老体衰之人是很难来此的。自民国年间范筑先县长在东关琅邪王墓修一公园，墓上建有一亭，名琅邪亭，住城的年老体弱者多来此登高庆重阳。

临沂城当时还有一老年人组织名曰“九老会”，这是借“香山九老”的典故命名的。刚成立时确有九老。有进士王思衍，拔贡狄建鳌、狄学勤、颜士钦，举人石鲁山、刘树祯，贡生翁调元、张守思、李宗仁，共九人。后来陆续又增加了刘宪邦、陈伯熙等秀才。这九老会是在重阳日于旧县署之梅山香林馆成立的，县长范筑先还到会祝贺。当天大家还乘车去茶叶山登高，在白云寺举行了重阳宴会。九老会是临沂最早的老年组织，当时入会者限在60岁以上，都是男性参加。九老会活动到1938年日寇侵占临沂后就终止了。

掠古董秋田丧命 犀角杯永留神州

日伪时期，沂州古城的旧县署所在地改为伪道尹公署和县政府。仪门两侧增修了两座建筑。东面是“退思园”，西面是“顾问住宅”。顾问住宅内住着日本各种顾问，像教育顾问名叫加藤，专管临沂中学，平时还教日语，实际上是个特务，该校校长就是被他所害。他老婆叫加藤幸子，专管小学，每日到模范小学去教小学生日语和日本国歌，进行奴化教育。道尹顾问名叫秋田，是个老牌的特务，会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他实际是伪道尹的太上皇，汉奸道尹及其他伪官都要听从他的指挥。

这秋田是个中国通，讲的满口仁义道德话，干的是丧尽天良事。他还是一个古董迷，百般搜刮中国古董。他的古董来源是：一些想买官的汉奸献给他的，城内各家日本洋行替他收购的，还有各地修工事出土的。白沙埠村汉奸修工事时发现一座汉墓，出土的玉器全部被他拿走。更有甚者他还参与了盗掘于滕墓的罪恶活动。晚清拔贡狄建鳌的住宅内有一夹壁墙，内藏不少书画古董。日军侵占后，后墙被打开，全部书画古董也被秋田占有。

这秋田是黑心不足，听汉奸告诉他苍山县东车辆村有明清两代的文人世家宋家，字画古董甚多。这秋田以“扫荡”为由亲赴车辆宋家。宋家见日寇突然来到慌忙逃走，文物被洗劫一空。秋田返回时汉奸又告诉他文峰山上的寺庙内有不少佛像，这又引起他的贼心。结果到山上一看，各庙造像已不存在。汉奸又领去看“琅邪八景”的“文峰积雪”。殊不知这时秋田的末日到了。原八路军老四团早已接到报告，在此埋伏下一个连的兵力。正当秋田欣赏“文峰积雪”时，八路军突然出现，给秋田及日伪军以迎头痛击。秋田当场毙



犀角杯（现藏于临沂博物馆）

命，日伪军也死伤了不少。

八路军打扫战场时不仅缴获了不少武器弹药，还收回了秋田抢掠的文物。老四团团长杨尚儒对这批文物非常重视，很快交给了滨湖区行政公署。这批文物一直在解放区保管，1948年运到驻临沂城的鲁中南行署，后来又转交给临沂行署文教科。1964年文教局长薛密基将其中最珍贵的文物交给了临沂文物收集组。1979年全国流散文物展在北京故宫开幕，临沂送展的文物就有其中的一只犀角杯。这只明代的犀角杯是清代宋开蕤所藏，上有“宋开蕤珍玩”五字的铭款，展出后故宫还给制作盒子。现犀角杯和这批文物皆珍藏在市博物馆。

秋田掠夺文物而命丧黄泉，这正如临沂人的一句古语：“掠得财宝空自喜，到头难把老天欺”。

进德会设在北禅寺 博物馆初建地藏庙

上世纪30年代蒋介石在全国搞起了“新生活运动”，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的韩复榘则在山东搞起了“进德会”。他命令驻临沂的国民党六十六旅旅长李占标在临沂成立进德会分会。此时正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李占标会同其参谋长郭鸿儒、县长范筑先筹备办理。会址选在城西北隅的北大寺（民国初年改为关岳庙，但民间仍称为北大寺）。此寺是佛教寺院水陆寺，内有北宋时的铜钟和明泾王铸造的铜佛像。关岳庙成为进德会会址后，将大雄殿改为礼堂，戏楼改为同乐亭。还设立了图书报室、招待会员室、乒乓球室、国术国乐室，另建了篮球场、网球场、鼓书场、办公室、小卖部等场所，还养了山鸡、水雁、猴子等动物。一切准备完备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七月一日进德会正式成立。会员2000余人，多是仕绅名流、地方富商和政府职员。因每人每月会费五角，一般人缴不起，故少有平民参加（当时五角钱能买一袋面粉）。其经费来源一是靠各大商号的捐款，二是政府的部分罚款，三是京剧演出卖的票收入。进德会的主要活动，一是定期请前清拔贡李宗仁宣讲儒家的仁义道德，二是办了一所进德小学（设在龙神祠），再就是搞些文体活动。平日，进德会里篮球活动最兴旺，前来看报的人很多，但说书坊来的人很少，后来停办了。最热闹的还是京剧场，每晚皆是客满。它既有本地的班底，又有聘请的外地名角，一时间成为老城最热闹的去处。国术组聘了武术教师，爱学武术的人皆来学习各路拳术，有时还请驻军武术队前来表演。这个进德会还成了住城机关的重要会议地点。一些重要的会议、典礼、迎送宾客等也皆在这里举行。可惜的是，这里一时的繁华被日军侵华战争所毁灭。1938年日寇进攻临沂，空袭的炸弹将进德会炸为废墟，进德会从此就永远消失了。

临沂有博物馆始自抗战前范筑先任县长的时期。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重阳节，范筑先和其他官员去北城楼登高，发现北城楼上保存了清代的部分官书（官府的图书）和一批出土文物，于是就想建一座博物馆。他发现进德会会址的西侧还有一座大庙，经查看乃是地藏庵（俗称地藏王庙），于是就决定在此兴建博物馆。依靠募捐和政府拨款，地藏庵整修一新，成为博物馆。接着开始征集文物。首先将北城楼的文物全部迁来，又将在四处散存的古碑和汉画像石运来，原来泾王府门前的一对石狮和太湖石也被搬来，还动员士绅们捐献了一批字画。一座小型的博物馆就这样建成了。这地藏庵三面临水景色幽美，环境又十分幽静。博物馆对游人免费开放，馆内费用由进德会支出。可惜的是这座博物馆也毁于1938年日寇进犯临沂时。侵略军从城西北角攻入城内，首当其冲的就是这座博物馆。日寇进馆后首先掠夺了各种文物，接着又放火将整个博物馆烧毁。范筑先苦心经营的博物馆就这样被毁灭了。唯一没烧毁的是泾王府的石狮子和那块北宋的太湖石，现在保存在华东革命烈士陵园内。



泾王府存北宋太湖石，现在华东革命烈士陵园纪念堂前

消失行业留文物 手工制做忆当年

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旧的事物不断被新的事物所代替。古城临沂也是这样，有的事物早就消失了，有的正在消失。20世纪20年代还有人使用铜镜照面，结婚时还有陪送铜镜的习俗。与铜镜相伴的是磨镜业，但那时从业的皆是70岁以上的老人了。至30年代就再也没人用铜镜了，磨镜业也就从此消失了。有的改行磨刀师傅。

20世纪30年代还有一种行业一做灯笼。很快，至40年代灯笼铺就消失了。现在的大红纱灯完全是节日的装饰物，而过去的灯笼却是照明的用具。30年代时考棚街还有几家灯笼铺在营业。这灯笼是用铁丝制做成灯罩，糊上棉纸再涂上桐油就透亮了。灯罩上还要写上主人商家的字号，家用的则写上堂号。也有画上五福捧寿的，也有只写一个福字的，官府则写上官职的称号。因为过去没有电灯也无路灯，故夜间外出的必须要打着灯笼才能行走。到了30年代临沂有了发电厂，有了路灯，灯笼就逐渐失去了用场，至40年代灯笼铺就彻底没有了。

小炉匠也就是俗称的錾漏子，这一行业在过去非常重要。人们在平日生活中打坏的铁锅、陶瓷器皆要请小炉匠给修复。特别是细白瓷十分珍贵，弄坏了也不舍得扔，必须铜上再继续使用。一般大的陶缸、盆用铁錾子，白瓷用铜錾子，而更珍贵的瓷则要用银錾子。随着社会的进步，白瓷已在民间普遍使用，打破了也费不上再錾上，因此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小炉匠就逐渐消失了。文艺节目中还有《小錾漏担挑下四乡》的表演，这一行业只保存在文艺节目中了。

贵重金属制作业有银楼、铜匠铺、锡匠铺。银楼业前文已讲过；这铜器锡器制作业过去也很兴盛，因为和人们的生活中息息相关。抗战前铜锡铺大多集中在南门瓮城内，主要



的有李家杨家铜器铺、高家王家锡器铺。铜器主要制作铜盒、铜针、铜勺、铜锁、铜铺首（木器上的饰件），这些皆是出嫁的姑娘家陪送之物。锡器也是女儿出嫁必备之物，如锡脂粉盒、锡梳头盒、茶叶盒、锡酒具、锡烛台、锡花瓶等。锡器的用途更为广泛，酒店的蒸酒锅、卖酒的锡漏斗、锡酒壶、锡酒量等，皆是不可缺的用具。

人为的因素加速了铜锡器的消失。那就是1958年的“大跃进”时，号召居民卖铜锡器给国家，一时间铜锡器在市面上就不见了。干这一行业的人士也都改行打白铁、修自行车等，虽然农村还有零星铸造铜旱烟锅的，但铜锡器这一行业算是消失了。

丝线店在过去人们的生活中也是不可或缺的。所谓丝线店实际上就是蚕丝业。过去城乡居民普遍养蚕，丝线店就是收购加工蚕茧的主要经营者。解放前临沂城有丝线店多家，最有代表性的是位于今沂州路老城里的王家丝线店。它有店员30人，有缫丝工、打线工、织绢工、织带子工、染工、打结工，是一个很像样的手工作坊。每年蚕茧上市时店门前就搭上缫丝棚，烧上一口大铁锅开始替人家缫丝。店主也开始收购蚕茧，然后缫成生丝后加工各种丝制品：丝绢、带子、绦子。还要打线，制做衣线、绣花线，打各种结子制流苏。技术工是染工和打结工，特别打结工要打释迦结卖给人家做衣服上的扣子，其他花样的结子也就是今天流行的中国结。

古城的丝线店在解放后公私合营时都并入了丝绸公司，从此这一行业也就消失了。

淋硝淋碱是古城的一个特殊行业。古城的土路日出前会有地下的硝碱浮到路面或土墙根，于是就出现了扫硝土的行当。从事这一行业的居民大部分是城西隅的住户。这些硝户白天大都走街串巷买高粱秸用于烧火淋碱淋硝。夏天可淋碱，冬天淋硝一定是晴天和结冰的气候才可出硝。制成的硝一般卖给制做鞭炮和火药的。夏天淋的碱卖给各面食商号，红色的卖给制做松花蛋的，白色的卖给丝线店做织绢和抽丝用。这一行业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后古城路面皆已硬化已无硝土可扫，亦无再用高粱秸烧火的了，这一行业自然就消失了。

染坊这一行业过去在人们的生活中十分重要，因为人们穿衣用布，印染是不可或缺的一项。古城在抗战前有染坊30家。他们染布大多用植物颜料。染的颜色一般是黑色和蓝色，还有红色。染蓝布主要是用本地产的靛蓝。本地有一种植物称蓝，收割后放在大陶缸中发酵后就成了蓝布染料颜色。黑色主要是用本地产的回青和藏青。红色是用本地产的红，红也是一种植物。印花布主要是红蓝两色。这是一种民间工艺。上世纪30年代有了化工颜料，人们称作煮青和煮蓝，逐渐替代了植物颜料。抗战前城关主要染坊有蒿家、卢家、张家、李家几户大的染坊，至上世纪70年代还有小型的染坊，到80年代这一行业在城内也就消失了。

此外还有挂货店专卖粗线织物，如装粮食用的口袋，外出背在肩上的褡子等，皮货店专卖牛皮制作的各种农具套，牛驴用的各种牲口套，一直到装旱烟的烟包等，出赁婚丧嫁娶的各种用具的赁铺，专门为丧事抬棺材服务的架子铺，这些皆成为历史了。

以上的行业虽消失了，但留下了不少的实物。像金银首饰、铜锡用具皆成了人们的收藏品；旧丝织品也是收藏的一项；褡子、灯笼皆成了演戏、拍电影电视剧的道具。过去通用的铜盆也成了客厅的摆设物。这些行业消失了，保留下来的遗物成了历史的见证。

平邑汉阙形制及阙身画像浅释

李常松

平邑县博物馆里并排矗立着3座造型古朴的东汉早期石阙，这就是全国著名的平邑汉阙。平邑汉阙包括功曹阙一座，皇圣卿阙两座。

一、汉阙形制

阙是我国一种传统的古代建筑物，其名称最早见于《诗经·郑风·子衿》：“纵我不往，子宁不来，佻兮达兮，在城阙兮。”阙是一种什么样的建筑呢？《广雅》：“阙，门观也。”《释名》：“阙在门两旁，中央阙然为道也。”《说文解字》：“阙，门观也，从门，朔声。”把上面的解释概括起来，用现在的话讲，阙是门前道路两旁高起的建筑物。因为在道路两旁，所以阙都成双成对。平邑功曹阙原亦有两阙，东阙已无，现存者为西阙。

阙根据质地可分土阙、石阙两种。土阙起源于西周，多建于宫殿之前，它不仅是宫殿的重要装饰，而且是国家颁布政教法令的地点。西周时期封邦建国，国王诸侯彼此仿效，土阙成为当时不可缺少的建筑物。因时代久远，西周土阙早已荡然无存。

东汉开始流行石阙，位置多由宫殿之前改为祠堂或坟墓之前，并得以流传今世。据有关专家统计，我国现存东汉时期石阙共26座，平邑的功曹阙、



功曹阙



皇圣卿东阙



皇圣卿西阙

皇圣卿阙就是其中的两座。皇圣卿阙建于东汉元和三年（公元86年），又称元和石阙。功曹阙建于章和元年（公元87年），又称章和石阙。元和、章和都是汉章帝的年号，此时距汉光武帝建武开国仅60余年，时间上应属东汉初期。

平邑汉阙原址在城北八埠顶。光绪二十二年《重修费县志》载：“元和石阙在平邑八埠顶，东西二石对峙。章和石阙在元和阙之南微西约百余步，东石之无存，存者乃西石。”1932年，平邑公学校长米弼民主持将石阙迁到镇内，从南向北排成一行，按次序分别是功曹阙西阙（简称功曹阙），皇圣卿阙西阙，皇圣卿阙东阙，后二者合称皇圣卿阙。

功曹阙、皇圣卿阙均系墓前石阙。据阙身残存铭文记载，墓主人分别为“南武阳功曹”、“南武阳平邑皇圣卿”。南武阳，县名，治所在今平邑县仲村镇南北昌乐庄之间，东汉时平邑属南武阳县，隶属泰山郡。功曹，汉代官名，当时郡设功曹史，县设功曹，负责掌管任用迁转和记录功过。“南武阳功曹”应为县吏，可惜无具体名字。“南武阳平邑皇圣卿阙”之“皇圣卿”，当为谥号，但其人其事无考，不好推断死者的身份。

功曹阙共由灰青石4层筑成，分阙基、阙身、斗拱和阙顶4部分，总高210厘米，壮硕稳健，造型特殊。阙基大半埋入土内，据露出部分所示，上缘作斜削状。阙身高152厘米，宽72厘米，进深（厚）59厘米，四面周围边框各隐起凸线一道，其内先以凸线构成内外二框，然后再用水平凸线将内框各划为4层框，框内雕有人像、车骑、奇禽、异兽，内容丰富，是山东重要的画像石刻。阙身铭文在今南面第四层东半部，隶书，字径约一寸，竖写，9行，可识者有“南武阳功曹章和元年二月十六日等”，其余字迹模糊难辨。阙身上施石一层，高41厘米，刻为上下两层。下层较阙身微微挑出，表面无雕刻，上层亦挑出少许，四周各镌斗拱一朵，阙顶上部刻四柱式屋顶，底部有檐椽一排。

皇圣卿阙东西两座形制相同，均稍大于功曹阙，除阙身边框内四面各为5层外，其他部分和功曹阙几乎没有差别。皇圣卿阙铭文在西阙南面第四层西半部，隶书，字径约2寸，竖写约八、九行，首行有“南武阳平邑皇圣卿冢”9字，次行为“之大门卿以元和三年”9字，后面各行字迹模糊难辨。功曹阙、皇圣卿阙建于同一地点，时间上只相差一年，形状如此接近，可能出自同一工匠之手。

在我国现存汉代石阙中，平邑功曹阙、皇圣卿阙的建筑年代，仅晚于四川梓潼的李业阙和山东莒南的孙仲阳阙。李业阙，建于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只剩残石，不能窥知全貌。孙仲阳阙建于元和二年（公元85年）。皇圣卿阙东阙已无，西阙亦仅阙顶、阙身尚存。平邑功曹阙、皇圣卿阙基本完整，阙身画像内容反映了古代历史的各个方面。阙身、阙基的形制，特别是阙顶镌刻的屋脊瓦垄、檐椽斗拱，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在建筑艺术上的高深造诣。

平邑汉阙是研究历史特别是研究古代建筑史的宝贵实物资料，1979年公布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阙身画像浅释

平邑皇圣卿阙和功曹阙画像是我国著名的汉代早期石画像，北宋赵明

诚《金石录》记载后开始著称于世，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知名。但历代有关著作对其具体画像内容的记述均失之过简，读者无法从中知其全貌。到目前为止，已公开发表的较为详细记载平邑汉阙的学术著作，是近代著名古建筑学家刘敦桢先生于《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5期上发表的《山东平邑汉阙》一文，但该篇着重评述平邑汉阙的建筑形制，而对画像内容基本上未予涉及（现多数介绍平邑汉阙的文章描述均源于此）。其他有收录平邑汉阙阙身画像的《汉代画像全集》等书籍，可惜又无具体的文字说明。为便于读者全面了解其画像内容，笔者特撰此文，以补前人之不足。

1、皇圣卿东阙画像

阙身四面有画，每面五层。

南面：纵1.55米，横0.7米。自上而下，第一列画像是一人手搂抱伏羲女媧的蛇尾。此人头上插有若干枚发簪，身体肥胖近圆形，外着斜领宽袖袍，内着圆领衫。伏羲执矩，女媧执规。伏羲后面有一鸟，展开双翅。女媧身后有玄武一只。第二列画像是一辆轩车，一辆辚车，轩车在前，辚车在后，均一马拉。第三列画像，右方是一辆有四维的主车，一马拉。车前有二导骑。第四列是乐舞场面，右方四人是乐手，右起第一人吹竽，第二人摇手鼓，第三人抚琴，第四人吹笛。左方二人舞蹈，一人挥长袖舞，一人作掷倒舞。第五列画像是一列迎宾图，但不见客人，只见四个迎者，最左方一人面向左，戴前低后高的冠，身穿圆领窄袖长袍，手扶一彗，略欠身似有所迎。他的身后，一人捧盾躬身低头，身佩剑。此人身后有一人头戴斜顶高冠站立，略欠身，右手扶一桠戟，左手提一盾。他的后面，又一人扶桠、提盾，亦戴斜顶高冠。

北面：纵1.55米，横0.7米。自上而下，第一列画像是周公辅成王的故事。成王为小孩像，站立当中。成王右方一人，手举黄罗伞盖，罩于成王头上。持伞者身后二人，戴斜顶高冠，身着斜领宽袖长袍，手纳于袖内，在对面相互交谈。成王左方三人，均头戴斜顶高冠，身着宽袖长袍，面向成王站立。第二列画像模糊不清，经仔细辨认，右方似为孔子见老子。老子在右，面向左。孔子在左，面向老子躬身施礼。他们中间一小孩，当是项橐。孔子身后，有二人共抬一兽，兽头朝下，可能是羊。后方抬者身后有一人肩扛长戟。第三列画像是车骑。当中一辆带四维的主车，一马拉，面向右。车后方似有二从骑、一步卒。第四列画像是泗水起鼎的故事。右方有砖砌的堤岸，上坐二人。左方有一半圆形水池，池边立一架子，每边各数人拉绳子，绳子一端系于鼎耳上，鼎已起到半空，有一鼎耳已脱落。第五列画像左方为一辚车，车上坐二人，有四维。二右边模糊不清。

东面：纵1.55米，横0.58米。自上而下，第一列，右上方有一人肩扛一耜。他的下方似有一人坐，稍左有一圆形物，似一纺车。再左方，有二人行走。左上方有一人头及其上半身，后拖长长的波浪式的两条尾巴。第二列，刻一辆有四维的辚车，一马拉，向左行驶。车后跟一从骑，车上坐二人。第二列，画面不清，似有一辆一马拉的车，向左驶，后一人相送。第四列，刻一辆辚车，一马拉，向左驶，车后一从骑。第五列，左刻辚车一辆，一马拉，向右驶。右方似有二人站立，面向来车迎接。

西面：纵1.55米，横0.58米。自上而下，第一列，刻一历史故事。中有一女子，身穿斜领衫，内着圆领衫，手持弓，发出一箭，射中前面一人背上方的一包袱状物。他们之间有一阙。女子上方有题榜曰：“信夫”。被射者



皇圣卿东阙南画面



头上有一题榜曰：“孺子”。女子身后一人，头戴斜顶高冠，身穿圆领宽袖长袍，双手纳入袖中，面向右站立。此人头上方亦有题榜，似为“宣王”。第二列，刻三人站立。左方一人面向右，戴斜高冠，着长袍，手持板。右方一人，正面立，戴两边平中央高的“凸”字冠，穿斜领窄袖口长袍，右手举起执一板。中间一人面向左，头戴一低矮山形冠，着长袍，双手抱于胸前。第二列，刻三人正面立。中间及左方一人上身穿鱼鳞铠甲。右方一人穿斜领窄袖长袍。左右二人各手持一长棍，中间一人左肩扛一个粗的棒槌。此三人看来是执法或护卫长官的武士。第四列，中央刻一建鼓。鼓座作兽状，兽头回转。鼓帮上有波浪形花纹。鼓旁有二人正挥舞鼓槌击鼓。第五列画像，正中刻一株大树，树干作波浪形来回扭曲状。树枝作细条状，无规则，树叶多作三角形，很茂密。树干左方一马，由缰绳拴于树枝上，面向树，膘肥体壮。树右一人，头戴尖顶帽，面向树，身穿窄袖长袍。

2、皇圣卿西阙画像

南面：纵1.55米，横0.7米。画分五列。自上而下，第一列刻六人站立。分两组。左组三人，左边二人面向右，右边一人面向左，似在交谈。右组三人，左方一人面向右，右方二人面向左。左方相对面的二人中，左方的人双手撸起袖子，其持刀的左手被对面一人的右手握住。撸起袖子的人显然是一刺客。第二列刻胡汉交战图。图中部略上，地上躺着三具无头尸体，其上方悬挂三个人头。尸体下方，两个戴尖顶帽的胡兵被绳子捆住双手，在向左方走去。左方一汉官，头戴斜顶高冠，身着斜领衫，袖手坐于地上。胡兵右方，有二人对面立。画左部模糊不清。第三列，左方一人手持绳三根，每根远端均拴着一只飞鸟。此人似乎坐在一辆车上。右方二人，有一人四肢着地，作膝行状，头戴斜顶高冠。另一人坐着，面向爬行者，但头部已模糊。第四列，右方一人，坐于地上，手持弩弓、矰缴，正在射鸟，鸟有四只，有两只已被矰缴射中，有两只未被射中。左边是题字五行。可见者有：“南武阳平邑皇圣卿冢”/“之大门卿以元和元年十二”/“月廿□日己卯□□□□□”/“元和三年八月”等字。第五列，刻四人，面向右而立。最前方一人手拄一长彗，低首欠身。其后一人，身佩长剑，手捧盾，俯身躬腰。其后一人手持板肃立。此人后面，一人躬身。四人皆是迎接客人来访的。

北面：纵1.55米，横0.7米。画分五列，自上而下，第一列刻五人。左边二人，一人侧面向右站立，一人正面立。正中一人面向左跪。右边二人面向左行走，似押看跪者。第二列，右方一人坐，其前似有人禀事。此人身后一些骑兵，画面模糊，但与南面可联系起来看，也是胡汉战争图。第三列，庖厨图。右下方，似有一人欲杀猪。左上方悬挂兔、鸡、猪头之类的东西，其下方有灶，一人在灶前烧火。其余模糊不清。第四列，拜谒图。右方一人跪坐，面向右，其膝上横置鸠杖，面前一人向他跪拜叩头。跪拜者后方，有二人向坐者躬身施礼。第五列，狩猎图。中部、左方各有一人手持毕，正欲扣兔。右方一人举一毕走来。有一犬正在逐兔。

东面：纵1.55米，横0.6米。画分五列。自上而下，第一列，当中一人正面端坐，左右各二人面向中央坐者跪坐。第二列，模糊不清。第三列，一辆轺车，一马拉，向右驶，其后有一骑跟随。第四列，刻四人站立。第五列，左方二人用长棍抬一兽向右走去，其前有一人，肩扛长戟向左方走去。

西面：纵1.55米，横0.6米。画分五列。自上而下，第一列，刻两只怪



皇圣卿西阙南画面

物。左方一只前后有首，共一个身子，四条腿。此怪物亦见于嘉祥武氏祠石阙。右方一兽，有长颈和细长尾。二兽皆是人面兽身。第二列，左方二戴尖顶帽的胡兵，手执弓箭向右射。其前一汉兵手拿刀盾与之搏斗。右方模糊不清。第三列，刻二人手执长钩，各坐在一只大兽上。第四列，中部一人正面对端坐，穿斜领衣。左方有二人面向他跪坐。右方置一件三足酒樽，一件豆。第五列，左方一人手执毕，欲扣一只惊呆的兔子。右方一人手牵一犬，另一手执一猎具（不清晰），犬伫立。

3、功曹阙画像

阙本应有二，如今只剩一座。四面有画，每面四列。

南面：纵1.5米，横0.72米。自上而下，第一列，中部为轺车一辆，一马拉。车上乘二人，坐。车后二人，其中一人拉弓欲发箭。车前一人牵马，二人面向车迎接。第二列，骑兵作战场面，已模糊。第三列，中部一人头顶一竖竿，用双手扶着，竿顶端上有一人俯卧。此人朝左，用手提另一人的脚，被提者脚朝上，双手及头部朝下。竿戏右方，有二人坐，分别吹笙和排箫。竿戏左方有一人坐，吹乐，余者模糊不清。第四列，右方二人站立，面向右，手拥髻。左方为题字八行，隶书，现多不清楚，文曰：“故南武阳功曹卿嗇夫文学掾平邑君□□” / “卿之阙卿（缺六字）困苦天下相感” / “□□□仟□□□三□观朝廷□□明君” / “□直任人□□□□来德□以为国” / “三老（缺四字）章和元年二月十六日” / “□子□文学叔□□石工□□□乡嗇” / “（缺十一字）伯□廷直□□” “四万五千”。

北面：纵1.5米，横0.72米。自上而下，第一列左上方有两只鸟对面立，右鸟有尾羽五根。右上方一人牵马。下部为孔子见老子图。右方老子只身一人，面向左。左方孔子及其弟子共五人，面向右。孔子与老子之间有一小孩，当即项橐。第二列，刻一些戴尖顶帽的胡人。上方一胡兵步行，拉弓搭箭欲射。右上方二胡人坐，右者似为胡王，左者是来禀报战况的。右下方有很多山包，层峦叠嶂。下方中部一人骑马向右驰。左方不清晰，似有一人执盾向左走。第三列，刻人物。中部二人似在舞蹈。右立一人，左坐一人。第四列，右下方刻一辆轺车，一马拉，向左驶。左方二骑作前导。左下方一骑已不清晰。

东面：纵1.5米，横0.59米。自上而下，第一列，又分上下列。上列西王母当中坐，头戴胜杖。左右不清。下列右方一人坐，面向左。其后一人侍立。其前一人向他伏拜，伏拜者后面一人躬身立。第二列，画面不清楚，约略可见一些汉兵与胡兵在作战。第二列，刻大树一株，枝叶繁茂，上空有数只鸟飞翔。树下拴马一匹。第四列，左方有大树一株，树右拴一头牛。

西面：纵1.5米，横0.59米。自上而下，第一列，刻四人站立。左方一人面向右。右方二人面向左，略微躬身施礼。第二列，骆驼、大象各一，它们背上各乘二人。第三列，左方立一建鼓，羽葆飘扬。鼓左右各一人，手执槌击鼓。右方一人站立观看。左上方二人坐。第四列，为泗水起鼎图。右上方为砖石砌的河岸，有人坐岸上观看。左方为滑轮架，数人手握绳，通过滑轮，将鼎升起。鼎内升出一个龙头，将一绳咬断。左下残缺，具体画像内容不详。



皇圣卿西阙东画面



费邑曾氏奉祀生

李洪廷

明景泰年间，朝廷诏封圣贤后裔，颜、孟后裔俱受封为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吏部左侍郎、翰林院学士顾鼎臣上疏请求以颜、孟二氏例，诏封曾子后裔，授以翰林院五经博士，代代承袭，以主祀曾子祠墓。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曾子五十九代孙曾质卒于江西永丰县，诏令以布衣徙居嘉祥奉祀。十八年（1539年），授翰林院五经博士，准予世袭，并赐祭田、庙户。

明代成化初年有“山东守臣上言”，说在今嘉祥县南武山发现了“碣曰‘曾参之墓’”的“悬棺”。由此，曾子故里始出现了“嘉祥说”。此后，不明真相的人便以为曾子故里在今嘉祥南武城。

关于曾子故里问题，先秦典籍如《论语》、《春秋》、《左氏传》、及《孟子》中均有明确记载，历代名家注疏亦确认为费县之武城即汉至北魏的南城县，今之平邑县南武城，而且直至明初本无异说。曾子故里始出现“嘉祥说”后，明嘉靖间学正、费人姚庭槐有《曾子南武城考》一文，被收入明万历元年《兖州府志》卷八《圣贤部》，明清史学大家王雅量、于慎行、顾炎武、叶圭绶、阎若璩、俞正燮等人纷纷发表言论，严加考证，据理力争，进行了有力辨驳，一致认为曾子故里并非嘉祥南武城，而应是费县之南武城。



（今平邑县南武城）。茱茱侯墓在费之武城向无争议。清光绪《费县志》在《宗圣曾子墓》条称“茱茱侯既葬武城，曾子未闻他徙，亦葬武城耳（《费邑曾氏谱》云：墓在武城境之土桥）。”清杨佑廷《费邑古迹考》亦有同样记载。清末李景星《费县乡土志》亦有澹台墓、曾子墓俱“葬县境”，“澹台墓在曾皙墓东”之记载。

清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费县重修了南武城的曾点、曾参墓。清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礼部复示山东巡抚国泰，准予在今平邑县南武城重修曾子父子墓，各设奉祀生一名。清嘉庆十三年督粮道孙星衍同费县知县郭志青立曾子墓碑，钱泳隶书。

然曾据南迁后，南武城仍有滞留曾氏后裔居住于此，本文称为“费邑曾氏”。根据平邑县辉泉村和沂南县青驼镇窝庄村曾氏墓（谱）碑记载，证明该地曾氏确系曾据南迁后滞留费之武城曾子后裔陆续自武城散居之（见《山东省志·曾子志》之《费邑曾氏碑文选》），其主要任务就是“守先人之坟墓，故居之也特久”，“其先世居费西南之武城，即古武城也，曾皙之墓在焉。曾氏之子孙居者守其坟墓也。”滞留在武城的曾氏后裔为今费邑曾氏先祖，费邑曾氏十六代至五十四代世系无考，自其五十五代后世系井然，今已传至七十九代。

清代选费邑曾氏奉祀生，是朝廷对曾子墓在费之武城的认可。奉祀生负责祭祀先圣先贤庙墓。曾氏奉祀生从曾氏后裔中选拔，经礼部审查注册，给以衣巾奉祀，负责曾子祠墓的具体事务及祭祀仪礼等。清雍正四年，已有各地曾氏奉祀生18名。至乾隆年间，陆续增加到41名。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礼部咨复准于费县曾皙、曾参墓各设立奉祀生1名，此为费之武城设曾皙、曾参墓奉祀生之始。

费邑所设奉祀生均为费邑曾氏后裔。今沂南县窝庄《曾氏谱碑》载：“六十八代兴仁。六十九代毓溪，行一。毓池，行二，字青川，咨部奉祀，生于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子时，卒于嘉庆二十年十月初三日酉时，娶孙氏邑庠生之女。毓沼，行三，字汝潜，咨部奉祀，生于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酉时，卒于嘉庆二十二年四月初一日戌时，妻芦氏。毓溶，行四。毓奎，行五，字殿华，咨部奉祀，生于乾隆五十六年正月初十日戌时，妻杜氏”。据以上谱碑知，窝庄曾兴仁共有5个儿子，其中二子毓池、三子毓沼、五子毓奎先后“咨部奉祀”，袭任奉祀生。知其二子曾毓池生于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可见据朝廷批准于清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准设奉祀生数年后，经过严格地筛选考查，首选窝庄曾氏后裔就任曾点、曾参墓奉祀生。但以上三人始任时间均不详，二子（34岁）、三子（33岁）英年早逝，最后由其五子曾玉奎接任奉祀生时，当在清嘉庆以后，任至何时不得而知。曾玉奎后曾子奉祀生继任者由窝庄转至今平邑县辉泉村，始由曾传道继任奉祀生，但具体奉祀情况今已无可考稽。

查今平邑县辉泉村《曾传道碑记》，碑记中生卒年月不详，但其中提到两件事：其一“宗主曾纪琰以兄弟相争，让以位，坚不就，且邀族众为和解之”；其二“咸、同间，盗贼蜂起，众举公为资邱社团长”。另有“享年八十一岁”、“清例赠文林郎”之记载。清光绪《费县志》载其为武城曾参曾点墓奉祀生，父、祖墓碑均载其“身列成均”（入京师国子监读书）。考：清道光初年，曾纪琰承袭翰博后不久，因事革职，不准其后代承袭。道光七年（1827年），由曾传锡之子曾纪瑚袭任翰博之职。在此所谓“兄弟相



争”事件中，不管曾传道起了什么作用，想必是重要的参与者，此时应已袭任奉祀生，且在曾氏家族中德高望重，已经是一个小有影响的人物了。曾传道逝世后其长子曾纪忠例袭奉祀生，曾纪忠任至何时不见记载。至民国十一年，曾昭宣等人为曾毓麟、曾传道立石表墓时，亦未见记载。

曾子59代孙曾质粹赴嘉祥袭翰博主祀曾子后，曾子故里费之武城被人们忽视。费邑曾氏奉祀生，自乾隆四十三年后，先后由费县曾子69、70、71代孙袭任，计3代5人。据窝庄曾氏谱碑知，窝庄曾氏后裔曾毓池首任费邑曾氏奉祀生。清嘉庆二十年，曾毓池卒，其弟曾毓沼袭任。再后奉祀生由辉泉曾子70代孙曾传道袭任。曾传道卒后，由其长子曾纪忠袭任。有关奉祀生的奉祀情况，清光绪二十五年续修《费县志》卷七《荫袭》载：“曾子七十应为六十九）代（曾毓池、曾毓沼、曾毓奎，七十一（应为七十）代曾传道，七十二（应为七十一）代曾纪忠袭奉祀生。”曾氏谱碑记载之奉祀生和《费县志》所记完全相符。

上述奉祀生均为费邑曾氏后裔。由此说明，朝廷选拔费邑曾氏奉祀费之武城曾参曾点墓，是对曾子墓在费之武城的重新确认，是继嘉祥主祀曾子240余年后，人们对曾子故里的再认识。用《费邑古迹考》作者的话说“乾隆四十三年礼部咨复山东巡抚国泰，准宗圣曾子墓设立奉祀生一名，与莱芜侯墓同，是宗圣墓在费县有明征矣。”



平邑曾子山

军民鱼水情

本 编

抗日战争中，党领导的军队与沂蒙人民共同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军民鱼水情的悲壮赞歌，发生了一幕幕催人奋进、荡气回肠的军民亲如一家人的故事。

那时，部队不管是领导机关、首长，还是普通战士，不管到什么地方，都住在百姓家里。老百姓把家里的粮食拿给战士，很多人甚至自己不吃，也要先让战士吃饱。就连吃饭用的碗筷、开会用的凳子，也都是从百姓家里借来的。而战斗支前更是踊跃。当年在沂蒙山区坚持抗日的老战士刘永泰回忆说，一次反“扫荡”伏击战中，当地百姓在3天时间内组织了2000多个支前队。一位姓赵的老乡，一家五口人被日寇杀得只剩下他一个人。村里没有让他参加支前队，他非常恼火，自己跑到部队要求参加战斗。一些老战士回忆起来十分感慨：“如果没有老百姓的支持，部队一天也生存不下去。”

而部队每到一个地方，都帮助老百姓种庄稼、收庄稼，挑水、打扫院子。由于百姓对八路军十分信任，各家有什么难事，有什么矛盾也都找八路军当裁判。



慰问亲人八路军



部队转移时做到地净、缸满、借物归还、损坏赔偿。



群众有了困难，战士捐款支援。



战士为老百姓挑水



滨海区妇联拥军慰问团向115师献旗



战士损坏了家具，向房东道歉赔偿，而房东坚决不收。

沂河千里碧 灵韵诗情长

——《沂蒙诗话》之八续二

李兴河

四

沂河经沂水县城西向南流。沂水县以河得名，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改东安县为沂水县。沂水城为鲁中名邑，山环水绕，尤擅形胜。明清诗家，吟咏颇多。

明，杨光溥写有《沂水形势》：

南来一水傍城流，十里封疆接莒州。

桃涧春浓花似锦，龙池夜静水如钩。

士沾鲁俗还逢掖，地坐齐风不起楼。

莫讶文风千古盛，沂山西畔是尼邱。

这首诗从环境美、风俗淳、文明古等方面概括了沂水形胜的特点，抒发了诗人对文明城邑的热爱之情。诗的首联，写沂河从北向南流来，靠近沂水城西流过，又向南流去，从沂水城向东走出十里便与莒州边界接壤。见其地理位置优越。诗的颔联，写沂水城自然环境之美。桃林夹岸的溪涧，春意浓浓，繁花似锦，夜静风平的龙池，水波不兴，像一弯银钩。“桃涧”，此处指流经城西的



沂水形势

沂河。“龙池”在沂水城西，泉深水清，水波流动，声似龙吟，故名“龙池”。诗的颈联，写沂水风俗之淳。文人受古时鲁国风俗的影响，还穿着大袖宽襟的衣服。《礼·儒行》：“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这地方也因受到齐国传统风气的影响，居住不建造楼房。诗的尾联，写沂水文化与儒家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不要惊愕沂水的文化千百年来长盛不衰，是因为沂山的西边就是尼山呀。

明，杨光溥还从不同的角度写了另一首《沂水形势》：

鸡犬千家远近闻，市门车马日纷纷。
两山南列高低见，二水西流大小分。
负郭寺邻关口月，临崖树倚陇头云。
举眸便是东皋在，几度吟诗到日曛。

这首诗主要写沂水城地理环境优越，市面繁荣。诗的首联，写城中居民众多，市街隆盛。诗的颔联，写沂水城南耸立着两座一高一低的山峰，城西流淌着两条一大一小的河流。水绕山卫，真乃地展雄藩，天开画图。诗的颈联，写靠近城郭的寺庙辉映着关口的明月，临近水泽的树林依附于高处的烟云。诗的尾联，写举目就能看到东皋山耸峙城中，曾多次在东皋山上观赏晚照，吟诗抒怀，直到黄昏。杨光溥的两首《沂水形势》，题目一样，但所写内容各有侧重，各具特色，并无雷同之感。

明，杨光溥《龙池浸月》：

百尺清泉浸太阴，等闲风月有龙吟。
汉妃置酒银盘漾，湘女凌波宝镜沉。
半顷琼田呈白璧，一炉丹汞点黄金。
枕边不耐清吟聒，应共蟾蜍说素心。

月映龙池，静影沉璧，称“龙池浸月”，列沂阳八景之一。至清代龙池已湮没。这首诗生动地描写了“龙池浸月”看似寻常却奇妙的美景，表达了诗人热爱自然、娴静恬淡、真诚纯洁的心意。诗的首联，写月光映在龙池上的清静景色，微风荡起涟漪，水波流动发出龙吟似的声音。清泉、月光、微风、水声，静中有动，声色俱佳，呈现出一种恬适的境界。诗的颔联，细写浮动在水面的月光与浸入水底的月影。汉妃，即传说中的汉水女神；湘女，即传说中舜帝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这两句说，龙池水面浮动的月光，象汉妃设宴斟满的美酒在银盘里晃动；龙池水底摇曳的月影，象湘女在水面行走时佩戴的宝镜缓缓沉落。美丽的传说，精妙的比喻，化作新颖的诗句，写出了“龙池浸月”蕴含的诗魂。诗的颈联，进一步写“龙池浸月”的色泽动态，一会儿象是半顷玉田里现出洁白的玉璧，一会儿又象是一炉丹汞中炼出灿灿的金丹。浮光闪耀，玉白金黄，妙趣横生，赏心悦目。诗的尾联，写在枕边卧听淙淙的流水声耐不住声音聒耳，应该静静地面对月亮共话纯洁的心意。由动入静，由景入情，由品景，到沉思，诗人的思绪又进入另一种境界。“龙池浸月”景点早已消失，它的诗魂神韵却留在了优美的诗篇里。

明，杨光溥《东皋晚照》：

晚坐东皋日已颓，余光红映碧云堆。
海霞不雨林头出，野火无烟乌外开。
扶策送将诗客去，骑牛催出牧童来。
明朝有酒真堪赏，不到黄昏不肯回。

东皋山，在沂水县城东，西麓旧有学宫。夕阳西下，红霞满天，余光映山，色彩绚丽，称“东皋晚照”，为沂阳八景之一。这首诗就是写作者坐在东皋山欣赏晚照的情景。诗的首联，写傍晚坐在东皋山上，看到太阳已经西下，落日的余辉映红了碧空的暮云。诗的颔联，写晚照的色彩光泽动态之美，象海上的霞光从林表出现，并不带雨意，又象燃烧的野火在落日周围扩展，并无一缕烟雾。诗的颈联，写晚照下的人物活动，一



东皋晚照

是共赏晚照的诗客拄着手杖披霞而去，一是骑着牛儿的牧童又从霞光中走来。这一去一来的人物，增添了诗的灵动感。诗的尾联，写作者观赏晚照的流连之情。“东皋晚照”这样美的自然景观，观赏一次是不能满足的，明天还要带着酒来细细观赏，不到黄昏是不能返回的。兴致之高，可以想见。人与自然的亲和力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明，杨光溥《岵山耸翠》：

县郭南头路几重，两山隐隐列西东。
云开螺髻高千丈，日出金莲掙半空。
春雨更添无限绿，晚霞别助一般红。
酒醒却忆行吟处，只在青青一抹中。

岵山位于沂水县城南6公里处，两座突兀的山头并列东西，沂河从山下流过。清康熙十一年《沂水县志》称：“旧传山多乔木，有耸翠之名，为沂阳八景之一，而今亡矣。”从这首诗中还可以领略岵山耸翠景观的奇妙。诗的首联，写岵山的位置和山势，从县城向南走过几重山路，就看到两座耸峙的山峰隐隐约约地并列一东一西，山色呈现出一种朦胧美。诗的颔联，写云开日出，岵山高耸晴空，翠峰象千丈高的发髻，亭亭玉立，日光照射，山峰又象金色的莲花在半空张开。用“千丈发髻”来比喻高耸的翠峰，非常新颖，用“半空金莲”来形容奇峰映日，十分贴切。诗的颈联，写春雨更为岵山增添了无限的绿意，晚霞又另外帮助岵山增添了一种红色。红绿相映，山色自然显得更美。诗的尾联，写作者从陶醉中醒来，回想漫步吟咏的地方，只在一片青青的山色中。这回望中的青青山色，正是岵山的翠色。宋秦观《泗州东城晚望》诗写有：“林梢一抹青如画，应是淮流转处山。”看来作者是很巧妙地借鉴了秦观的诗句。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有益于人们的生存、生产、生活，严格保护，科学开发，合理利用，才能长远受益。

清，黄胪登，龙溪（今属福建）人，举人。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任沂水知县。写有七律《沂河》：

乱山东走近城开，水下平原势倒来。
波带夕阳明雉堞，光浮春草照楼台。
岚阴低浸千峰入，柳色斜萦两岸回。

解道船如天上坐，不妨击楫傍溪隈。

这首诗写春天沂河优美的自然风光，表达了作者水上泛舟，览胜抒怀的欢悦。诗的首联，写沂河在乱山丛中蜿蜒东流，接近沂水县城时河面开阔了，河水由西北山间流入城西平原，水势汹涌好似倾泻下来。诗的颔联，写水波上闪耀的夕阳照亮了城墙，春草上浮动的霞光辉映着楼台。诗的颈联，写岚烟笼罩水面，群峰倒映水中，朦胧的柳色，环绕着弯曲迂回的河岸。诗的中间两联，对仗工整，写景优美。颔联中将水波、夕阳、雉堞、霞光、春草、楼台等不同景物，通过日光有机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和谐美丽的画面，写出了近城沂河的夕照美；颈联中写水面笼罩的岚烟、千峰的倒影、朦胧的柳色、迂回的堤岸，呈现出了傍晚沂河岸边的朦胧美。沂河的风光如此美丽迷人，自然会激起人们的游兴。诗的尾联，写理解了杜甫“春水船如天上坐”的诗意，就应当到沂河弯曲处，去尽情地划船畅吟，享受春光。

明，公鼐，字敬舆，蒙阴人，翰林公家臣次子，公鼐之弟。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举人。博学多才，长于书法。先后任中书舍人、工部屯田司主事和翰林院待诏。晚年辞官，隐居家乡，寄情山水，诗文多抒发感伤国事的情怀。有《小东园集》、《千金裘》行世。居家访友时作《东安城》：

禾黍离离覆短墙，黑云千顷昼茫茫。
一间草屋祠山鬼，几尺蓑城属海王。
归鸟渐从村树没，晚风遥送豆花香。
故人只在墙东卧，手拍柴门解客囊。

东安城，即东安故城。西汉置东安县，故城建于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遗址在今沂水县城南15公里处，沂河西岸，前城子、后城子、黄崖头三村之间。这首诗通过对东安故城萧索景色的描写，抒发了对世事盛衰变化的感慨。诗的首联，写东安故城的荒凉，已没有了昔日的繁华，只见生长茂盛的庄稼遮蔽了故城的矮墙，天空乌云密布，昏昏沉沉，白天也变得苍茫模糊。诗的颔联，写故城的凄凉景色，一间草屋用来祭祀山神，几尺蔓草覆盖的城垣遥属海王。诗的颈联，写故城的晚景，飞鸟归巢，渐渐从村中的树林隐没，晚风习习，从远处送来豆花的清香。诗的尾联，写作者所要造访的友人就隐居在故城墙的东面，叩开柴扉，解下行囊，到了故人家中。诗中虽未有交待故人的身份，也没有写见到故人的情景，但可以想见故人是一位与作者志同道合的高洁之士。这首诗的立意与取材，明显受到《诗经·黍离》的影响，“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感叹兴亡之情，只有向故人倾诉。

明，青州府知府卢龙人朱鉴，在巡视蒙阴、沂水时写有《沂水道中即事》：

蒙阴一带路，沂水几重山。
曲径藤萝里，危桥石磴间。
霜酣红叶战，风静白云闲。
追忆江南道，仙霞共母攀。

诗的首联，写蒙阴沂水间的道路山重水复，崎岖难行。诗的颔联，写弯曲的山径掩映在茂密的藤萝里，险峻的小桥横跨在涧溪的石级上。诗的颈联，写寒霜浓重，红叶争奇斗艳，秋风平静，白云悠闲自如。这两句诗写山乡深秋风光，宛然如画，色彩明丽，动静结合，极有特色。诗的尾联，写由眼前景物，又回忆起在江南道上，与亲人一起登山游览的情景。思亲之情，油然而生。

张能麟，清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进士，任青州海防道道员时，巡视沂水，写有《沂水朝发》：

沂阳腊月走山湫，冷透重裘栗烈飕。
半里寒消千日酒，数联诗解一时愁。

驱驰王事难辞苦，咨度民瘼更可忧。

指顾前村姚氏店，穷檐乱砌一蓬丘。

这首诗写腊月一大早从沂水城出发途中所见及感受，表达了关心民间百姓疾苦的心情。诗的首联，写诗人在腊月的清晨行走在沂水的山间溪畔，刺骨的寒风侵透了厚厚的皮袄，冻得浑身发抖。诗的颔联，写才走上半里路，寒气就消除了刚饮过千日酒后的一点醉意，姑且吟咏几句诗以化解心中一时的忧愁。诗的颈联，写为国事奔忙自然难辞辛劳，考察了解老百姓的困难疾苦，更感到忧心如焚。诗的尾联，看到前面不远处有个叫姚氏店的村庄，乱石碇墙的简陋茅屋，疏疏落落地分散在长满蓬蒿的荒丘上。天气这样寒冷，村里的老百姓生活该是多么难熬！这首诗的重点是写诗人忧民之苦，前四句极写天气严寒，穿着皮袄还冻得发抖，正是衬托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屋不挡风的穷苦百姓更是难以度日。诗人对百姓的同情之心尽在不言中。诗句朴实无华，却是情真意切。作为一个正直的封建官吏对百姓之苦能如此忧心，也真是难能可贵。



蒙山雪景

姓氏百家漫谈——杨姓 (下)

赵丹峰

叙论明代杨氏名人，杨廷和、杨慎父子不可阙如。杨廷和系武宗正德八年首辅（宰相）。武宗死后，无子嗣继承皇位，杨廷和依据《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之义，倡议迎立宪宗之孙、孝宗之侄、兴献王朱祐杭之子朱厚熜继位，得到阁臣赞同与太后的照准。身居封藩地湖北安陆的朱厚熜继皇位后，即为明世宗，年号嘉靖。但由于当时交通不便，世宗从藩地至京，途中竟走了38天。其间，由杨廷和总揽朝政。杨廷和利用新皇尚在途中这个空缺，做了几个重要决定，其中一项就是将锦衣卫裁去14万人，既精减了机构，减少了开支，又在客观上打击了昔日那些邪恶势力。但日后在议礼之争中，由于违背了世宗的意愿，被削职为民。

杨廷和子杨慎系明代著名文学家。正德间中进士第一（状元），后因向世宗直言进谏，被谪戍云南永昌长达30余年。其中致力于考论经史、诗文书画，研究文学、训诂、音韵等，著作多达百余种，其著述之富，推为明代第一。今存诗词2300余首。人们所熟悉的置于《三国演义》开卷之首处的《临江仙》词，即杨慎所作：“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此词系作者晚年之作，是其长篇弹词《廿一史弹词》中演唱秦汉之事的第三段的开场词。清人毛宗岗父子取之置于《三国演义》卷首，遂为人们广为传诵。不少不明其中缘由的读者，还误认为该词系罗贯中所作。诗中，作者用看似通俗平易的语言，抒写了由历史兴亡而引发的人生感慨。20世纪90年代，大型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拍成播放，引起轰动。杨慎的《临江仙》词，作为该剧每集开场的主题歌，经由同为杨姓的当代著名歌唱家杨洪基用浑厚深沉的歌喉演唱后，更加深了杨慎原词所蕴含的历史沧桑感，故而连同三国的故事一起，走进了亿万观众的心中，成为久唱不衰、家喻户晓的经典名曲。

清代，杨氏族群不乏名人。杨秀清系太平天国前期主要领导人之一。因其贡献仅次于洪秀全，故被封为东王九千岁，后死于内争。不久，洪秀全又恢复其爵号，并将其忌日定为东升节。杨建春，回族，系山东沂州府费县西马庄人，清末爱国将领。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决定派军前往朝鲜平壤，以阻日军进犯。杨建春即随主帅左宝贵奔赴平壤。9月15日，他在左宝贵的指挥下率部抗击来犯之敌。在敌众我寡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奋勇杀敌，身受数创仍不下战场，直至壮烈殉国。杨文会乃清末著名佛学家、南京金陵刻经处的创始人。杨深秀系清末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在京城已开始搜捕维新派的危急时刻，他不畏艰难，仍欲上书诤问光绪帝被废之由，请慈禧太后撤帘归政，后与谭嗣同等就义于菜市口。

杨度是清末民初的一位特殊人物。他先是力倡君主立宪，反对暴力革命，其理论与主张当时既为革命党人所抨击，又受保守派所反对。辛亥革命后，一度追随袁世凯，袁死后向往革命，1927年李大钊被捕后，他曾多方营救未果。晚年移居上海，于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为党做了诸多工作。

现代以来，杨姓更是代出名人：杨虎城是举世闻名的爱国将领、革命英烈。1924年起任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开始与中共合作。说起杨虎城将军，还与临沂有着一段渊源关系。1928年11月至翌年5月，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的杨虎城率部驻扎临沂。时间虽只有半年，却在临沂百姓中留下了极好的口碑。一是率部剿匪。20世纪初叶的鲁南地区匪患甚炽，百姓受其祸害苦不堪言。为解民众之倒悬，杨部相继在临沂地区的临沂、郯城、莒县、沂水、费县等地进行剿匪。诸匪伙中尤以巨匪刘桂堂（绰号刘黑七）为害最烈。该匪部人多势众，且武器装备不亚于正规军队，虽屡受政府收编，但匪性不改，每每反水。所袭村镇，往往被荡为废墟，百姓多被残害，甚至孩童不留。为消匪患，杨虎城遂将刘匪列为打击重点。如1929年3月，刘匪石增福部窜至沂水县东北乡大肆抢杀掳掠，一时吏不能治，官军民团望而生畏。杨虎城闻讯后，即派一团精锐将此股顽匪歼灭。沂水民众甚为感激，将杨部阵亡官兵备棺厚葬于城西沂河畔，并立碑刻书“碧血鲜花”四个大字以志纪念。二是创办报纸。驻防期间，杨部在临沂创办了《鲁光日报》。此报虽为军报，却面向地方。当时，地方当局在县境多处设卡征收出入境货物税，以致商家不堪负担。为此，郯城县马头镇商人举行罢市，要求取消税卡。事件发生后，该报不但及时做了报道，而且还撰文要求取消苛捐杂税。地方当局在舆论压力下，遂取消了各地的税卡。由于《鲁光日报》申张正义，抨击时弊，故深受临沂民众的赞誉。离开临沂后，杨虎城相继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张学良率东北军入陕后，二人共存抗日救亡宏志，拒绝剿共。1936年12月12日，他与张学良毅然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以八项抗日主张通电全国。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迎来了国共再次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但杨虎城却被蒋介石长期囚禁。1949年9月17日重庆解放前夕，杨虎城及其家人人口被蒋介石授意的国民党特务杀害。

杨尚昆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总政副主任、红三军团政委（彭德怀为军团长），作为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他支持、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抗日战争中，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组织领导了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建党、建政和建军工作。后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解放战争中，任中央后方委员会副书记、中央副秘书长，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建国后，长期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文革”中被诬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成员，遭受残酷迫害，被长期监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相继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是十二、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作为党和国家、军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杨尚昆为国家改革开放大业和新时期人民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共和国开国上将中，有四位杨姓人士名列其中，他们是杨得志、杨成武、杨勇、杨至成。在万里长征中，作为中央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即中央先遣团）团长的杨得志，率领红军精锐，肩负起为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首长扫除障碍、开辟通道、北上抗日的艰巨任务。1935年5月，红军在渡过金沙江后，到达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渡口。此处水急山陡，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北渡未成而全军覆灭的地方。面对惊涛骇浪，杨得志指挥红军神炮手用仅有的三发炮弹炸掉对岸守敌的炮楼后，即组织



杨度



杨虎城



“三杨开泰” 杨得志、
杨成武、杨勇学毛选

十七勇士用仅有的一条船只强渡大渡河，策应杨成武三日后指挥由红二师四团飞夺泸定桥告捷，从而挫败了蒋介石先前曾夸下的“要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的海口。

在建国之初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杨得志、杨成武、杨勇三位骁将挥师入朝，再建奇功。1951年2月5日，政务院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召见即将赴朝的杨得志时说：你的十九兵团，还有杨勇、杨成武同志指挥的两个兵团，战斗力很强。我曾经说过，要把你们“三杨”拿出去，叫做“三杨（阳）开泰”。随后，杨得志遂率第十九兵团（即解放战争中威震八方的杨罗耿兵团）、杨成武率第二十兵团相继跨过鸭绿江，奔赴硝烟滚滚的朝鲜战场。1953年4月，杨勇亦奉命挥戈赴朝。在朝鲜战场上，智勇兼备的“三杨”屡屡重创美军，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于是，“三只羊（杨）打败了一只虎（美军）”这一形象比喻，遂在军内外长期流传，成为一段军史佳话。“三杨”中杨成武奉调于1952年回国，杨得志和杨勇则相继擢升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司令员。1979年春，保卫祖国南疆的自卫反击战拉开序幕。杨得志奉命出征，成为自卫反击作战的前方主要指挥者之一。由于运筹得体，指挥若定，善于根据战场实情的变化及时调整战略、战术，从而使此次反击战取得了辉煌战果，赢得了“国威军威看西南”（胡耀邦语）的高度赞誉。翌年，杨得志成为“文革”后重新设立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为新时期治军做出了重要贡献。

除上述叱咤风云的高级将领外，杨姓中亦不乏智勇双全的基层优秀指战员，如解放战争中因智取威虎山而名扬天下的解放军特级侦察英雄杨子荣；在朝鲜战场上数次退击敌人反扑，最后抱起炸药包冲向敌群而壮烈牺牲的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率尖刀班奇袭敌王牌白虎团的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杨育才。在历史新时期，还有退而不休，十几年栽树不止，而让群山披翠的原云南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和2003年首乘我国神舟号宇宙飞船遨游太空的航天英雄杨利伟等，都是受人称道的功臣英模。

在科教界，杨姓名人主要有：杨献珍，中国著名的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家。作为1926年入党的老共产党人，曾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中共直属高级党校（即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兼党委第一书记，长期从事马列主义教学和研究工

作，为提高党和国家中、高级领导干部的理论修养做出了重要贡献。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后，以浮夸风和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共产风”一度盛行。杨献珍面对现实，经过认真思考，认为浮夸风根源是将思维当作存在，遂极力反对哲学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命题，发表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坚持实事求是作风，狠狠批判唯心主义》和《离开唯物主义是危险的》三篇文章，结果被批判，被认为和彭德怀是“山上山下，一文一武，一唱一和”，其职务由校长被降为副校长。1963年2月，他在给中央党校学员讲课时，首次提出“合二而一”的哲学概念，认为事物既是“一分为二”的，也是“合二而一”的。此论点即被看成反对毛泽东所主张的“一分为二”的哲学观。翌年，各大报刊奉命发表批判杨献珍的文章达500余篇，成为在报刊上首位被公开点名批判的正部级高级干部。“文革”中，杨献珍以71岁高龄入狱。1975年被解除监禁。1980年，在邓小平支持下，方获彻底平反。杨石先，中国农药化学和有机磷化学的开拓者。曾在南开大学创建中国高校第一个科研机构——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先后研制出杀虫剂、除草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等多种农药。后在除虫菊酯类、抗胆碱酯型及内吸杀虫剂等新课题研究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他在60余年的教学生涯中培养了大批人才，像杨振宁、李政道等举世闻名的大科学家均出其门下。杨乐，当代著名数学家。曾与张广厚合作，在解析函数组的正规性方面，发现了“亏值”与“奇异方向”之间的联系，这一重大研究成果被世界数学界称为“杨——张定理”。杨开道系中国农村社会学的主要开创者之一。针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践，提出了从教育入手，依靠专家，通过农村自治和政治改良达到改善农村生活状况的理论主张。他的这一理论主张，在当今的台湾地区和韩国取得了实践上的显著成果，对今后中国农村的社会建设仍具有不可低估的参考价值。杨振宁，著名美籍华人物理学家。他与李政道合作研究，提出了几种检验弱相互作用中宇称是否守恒的途径，后由吴健雄以实践得以证明。为此，杨振宁与李政道一起，于1957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文学艺术界，杨姓代表性名人主要有：杨朔，现代著名散文大家。其散文创作充满激情与诗韵，极富时代感，《荔枝蜜》、《茶花赋》、《海市》、《雪浪花》等散文名篇被广为传诵。杨沫，当代著名女作家，其创作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曾在广大青年中产生了深远影响。杨鸣玉，系中国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大师。以攻丑闻名。其表演和唱念规范严谨，形态传神，擅演剧目有《问探》、《盗甲》、《下山》、《访鼠》等。他当时在京城声望甚高，有“杨三已死无昆丑”之说。清沈容圃将其饰演形象绘入《同光十三绝》之中。杨小楼，系著名京剧表演大师。辛亥革命后，挑班主演，与梅兰芳、余叔岩齐名，有“武生之宗师”之誉。其塑造的赵云、高宠、姜维、孙悟空等戏剧艺术形象威武传神，与梅兰芳合演的《霸王别姬》，更是珠联璧合。他的武生表演艺术技巧，为日后武生演员所师法，称为杨派。新风霞（原名杨淑敏），系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她通过实践，创造了许多新的板式与唱腔，使其表演具有嗓音甜润清脆、婉转玲珑的显著特色。她在《花为媒》、《刘巧儿》、《杨三姐告状》和《金沙江畔》等剧目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个血肉丰满、个性鲜明的舞台艺术形象，赢得了亿万观众的喜爱。白杨（原名杨成芳），系当代著名电影、话剧表演艺术家。她主演的《十字街头》、《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和《祝福》，成为中国电影的经典之作。她在上述作品中塑造了众多个性不同的艺术形象，且均具有东方女性的神韵与风度。上世纪60年代初，她被评为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之一。



中国共产党在临沂 最早创办的警察学校

根据刘少儆口述整理



刘少儆，山东新泰人，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8年参加徂徕山起义，历任山东纵队四支队连指导员、营教导员。1939年赴延安，在延安马列学院、中央社会部学习后，任军委总部锄奸部秘书，1945年回山东，历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保卫科科长、山东省公安总局科长、山东警官学校副教育长、华东局社会部办公室主任、鲁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鲁中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47师代政委。1949年南下，历任上海市公安局治安行政处处长、华东公安局治安行政处处长、苏北行署公安局局长、江苏省公安厅副厅长、江苏省民政厅厅长、中共江苏省政法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江苏省委政治部副部长、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兼党组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委员、淮阴专员公署副专员兼科委主任、中共淮阴地委常委、华东政法学院党委书记。

日本投降以后，我们解放和接管了一批中小城市，迫切需要有一批懂得业务的我们自己的警察队伍，去接管敌伪警察机构。另一方面，蒋介石还控制着接收大权，妄想独吞胜利果实。为了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一定要继续解放和接管一些大中城市。同时根据“双十协定”的精神，还要准备把一部分要整编的军队，转为公安部队或城市警察，以保存我们的实力，不致被蒋介石吃掉。根据这个指导思想，1946年5月，我们党在临沂创办了第一所警官学校——山东省警官学校。

提起办警官学校，那真是个新鲜事物呢！过去我们虽有了一些锄奸保卫工作的经验和对付隐蔽敌人的办法，但是对于接管大城市、维持城市社会治安、同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作斗争，却从来没有做过。华东局决定筹办工作由华东军区保卫部和山东省公安总局共同负责。筹办这个学校的主要负责人是梁国斌，他是华东局社会部的副部长，也是军区政治部保卫部的部长。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兼任校长，梁国斌和杜明两位同志任副校长（以后舒同不兼校长了，由梁国斌任校长）。我与盛同志任正副教育长，具体负责学校党政领导和组织教学工作。校部设有教研室、组织干部科、总务科和一个大队部。教研室主任是王健，组织干部科由我兼任，总务科科长是杨友和，大队长是张席真，教导员是陈志坚。在筹办过程中，梁国斌表现了极大的智慧和才能，他敢想敢干，勇于创新。他在作报告时说：“我们这个学校是新型的抗大式的学校，过去我们处在战

争的时期，主要任务是打仗，现在党要求我们搞和平建设，接管城市，就要学会我们不会的东西，要在干中学。”这所抗大式的警官学校就是这样办起来了。

警官学校的校址在离临沂城十多里的梨杭村，没有现成的校舍和课堂，都是借用群众的房屋和逃亡地主的宅院，校部工作人员住的就是一个逃亡地主的四合院。这个四合院中间的空地，就是学员集中上课的课堂。学员共有200多人，组成了两个队：一个警官队，主要是部队连排骨干和地方公安部门县股长以上的干部，少数是从学校调来的有中等文化的知识青年；一个学警队，主要是部队的班排骨干和公安保卫部门的侦察员、警卫员。学员分别住在梨杭村周围的小村庄里，生活基本按连队建制编队，以队为单位成立伙食单位，队以下设分队，每个分队有三四个班。警官队还有一个女生班。队长由校部委派，分队长以下的干部，都是从学员中产生。警官队队长是范权功，支部书记是于云；学警队队长是蓝志彬，指导员是严检行（女）；文化教员是方萌（女）。学员由于大都来自连队，能唱革命歌曲，还有个别是文工团来的，教唱歌的任务也由学员自己承担，每天吃饭前或听课前都要整队唱几首歌。学校生活紧张活泼，办得很有生气。

我们没有现成的教材，每个阶段的讲课内容，一般是邀请有关部门的领导根据学校课程安排，先来作报告，然后由学校指定专人整理后编写成教材。后来调来了几位从上海国民党警察局撤退到解放区的地下党员，他们曾在上海敌伪警察局从事地下工作多年，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也熟悉城市生活和警察局的内部情况。如张席真、刘潘泉都是原上海市国民党警察局地下党支部的前后任书记，以后又调来了刘友洁、刘继霖、苗雁群等同志，他们成为我们教学工作上的得力人才。他们介绍了敌伪时期上海警察局的情况、组织机构情况、国民党特务系统以及他们内部矛盾情况和上海地下党与其斗争的情况，加上我们手头保存的一些敌情资料，我们整理、编写成比较系统的资料，作为我们的基本教材。我们还请军区保卫部和省公安总局的部门负责人同志兼任教员，他们讲述的课程有政治形势、城市管理、交通户籍、政治保卫、刑事侦察、国民党党派及日伪特务组织系统等内容。

学员们学习半年后，从10月开始分别到地方公安部门实习。警官队到省公安总局，在临沂城区内由省局指导进行城镇社会调查。我同大队长张席真带领学警队部分学员，到莒县农村配合县公安局搞剿匪工作。一个多月时间，边学习，边实习，理论联系实际，效果很好。在社会调查中，实习学员还和省公安总局的同志一起，破获了几起案件。其中较大的一起是原山东大学党委书记朱达章失踪一案。当时华东局机关因国民党蒋介石的飞机经常到临沂城内扫射，就搬到城南郊区农村，住在群众家里。朱达章是个棋迷，几乎天天要到邻村去找原淮南行署的一位负责同志下棋。有一天，朱达章去邻村下棋，突然失踪。案发后，省公安总局组织力量作为重点案件侦破，特派侦察队长陆斌为首组成侦察小组在这个庄子住下来，我校警官队一个实习组的学员也参加了他们的侦破活动。他们一起作社会调查，基本掌握了这个村子的政治情况。侦察对象集中在几户逃亡地主、反革命分子的家属身上。侦察人员明确分工，密切监视他们的行动。有一天，侦察人员到井上打水，发现有个妇女头上戴的斗笠帽有点特别，不像当地产品，颜色是黑白夹花，当地是很少见到的，而且系在一个很陈旧的斗笠上，也不大相称，看上去很不协调，就产生了怀疑。经过进一步调查，朱达章也曾经有个草帽是用这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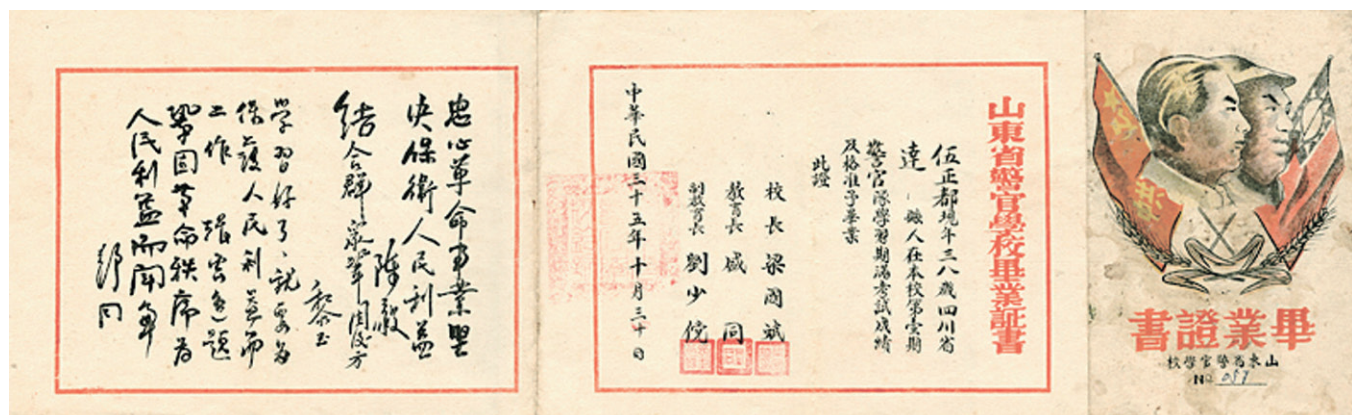


帽带的，于是对这个妇女做了进一步调查。经查明，她是一个逃亡匪特的家属，其丈夫最近也确实回来过。抓住这一线索，便对这个妇女进行了拘留审查。审查结果证明，这是一起国民党武装匪特杀害我干部的政治案件，朱达章同志就是被这股武装匪特杀害的。国民党匪特利用反革命家属的关系，秘密窜回，了解我驻军情况，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他们对朱达章的行动规律已有了解。那天晚上，下着小雨，朱达章下完棋回家，经过村头时，突然几个歹徒从背后扑上来，卡住脖子用麻袋套头，背上就跑，然后投入井中。说来也巧，朱达章的帽子被匪特带回家中烧毁了，但帽带被匪特的家属用了，正好成了这次破案的重要线索。这个案子的侦破对我们警校学员来说，是上了生动的一课，这是书本上学不到的。临沂是新解放的城市，是国民党游击司令王洪九的老巢，社会情况也很复杂。如果警惕性不高、思想麻痹，就会出乱子。朱达章同志被害的案件就是一个极大的教训。

警官队实习的另一组住在临沂城西门内天主教堂的修道院里。通过社会调查，他们也发现了修道院的一些罪恶内幕。这个修道院原是美国天主教会主办的，院内原有20多个修女，还有一个孤儿院。我们进城时，已经是人去楼空，修女、牧师都跑掉了。这所修道院房子比较宽敞，除学员30多人住在这里外，校部工作人员也住在这里。后院有个大花园，已是杂草丛生。在一次打扫卫生、清除杂草的时候，从土堆中挖出了很多儿童的骷髅。原来这里的牧师、修女竟是残害儿童的刽子手，他们披着宗教的外衣，美名曰“慈善”，而实际上干的却是另外一套。我们根据这些社会调查所得的材料，以教堂为课堂，控诉了帝国主义利用宗教麻痹中国人民，进行文化侵略和特务活动的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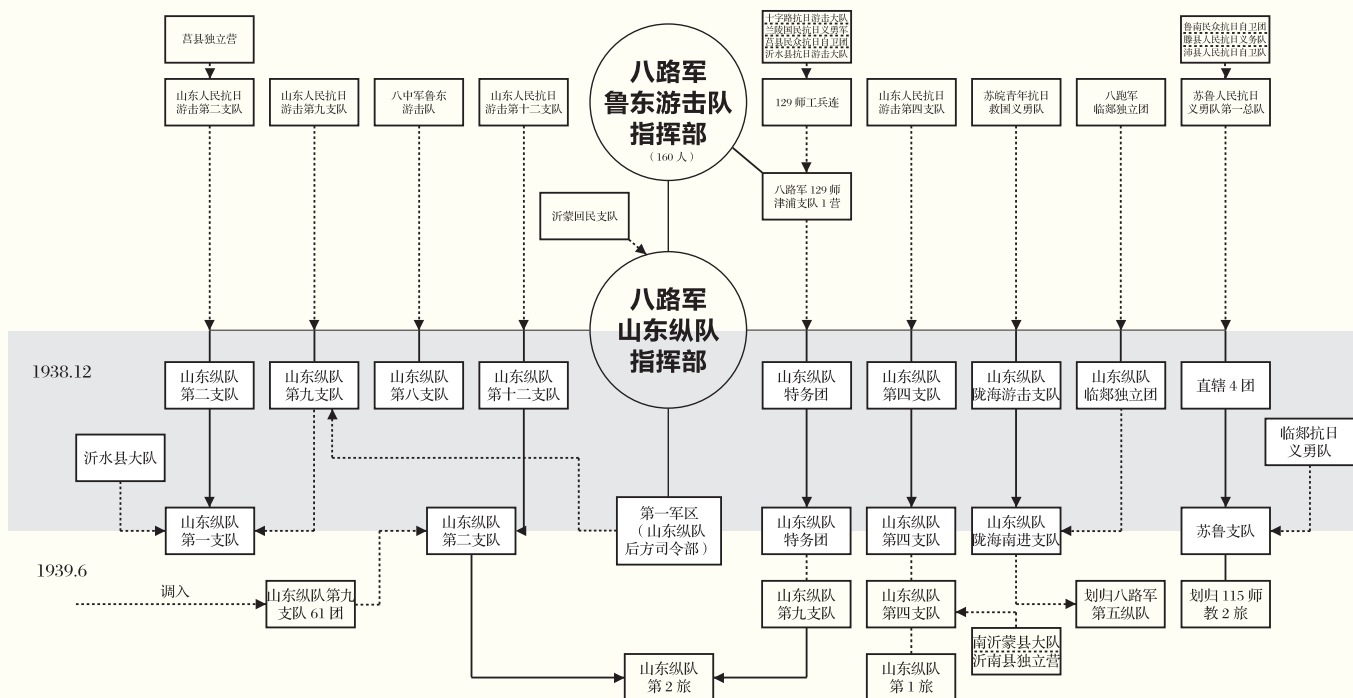
由于时局的变化，警校只办了一期就停办了。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挑起内战，战火已经烧到了临沂，飞机天天在临沂上空袭击骚扰。到1946年11月，学校不得不迁到沂河东边的板桥崖坊庄一带进行了结业典礼，同时宣布了警校停办。

1949年1月5日，在济南市府东大街重新开办了山东省第二期警官学校，学校更名为“华东警官学校”。1949年4月，根据全国解放形势的需要，华东警官学校还未正式毕业的800名师生，连同济南特别市公安局干警800余人，奉命南下上海接管国民党警察局，创建人民公安机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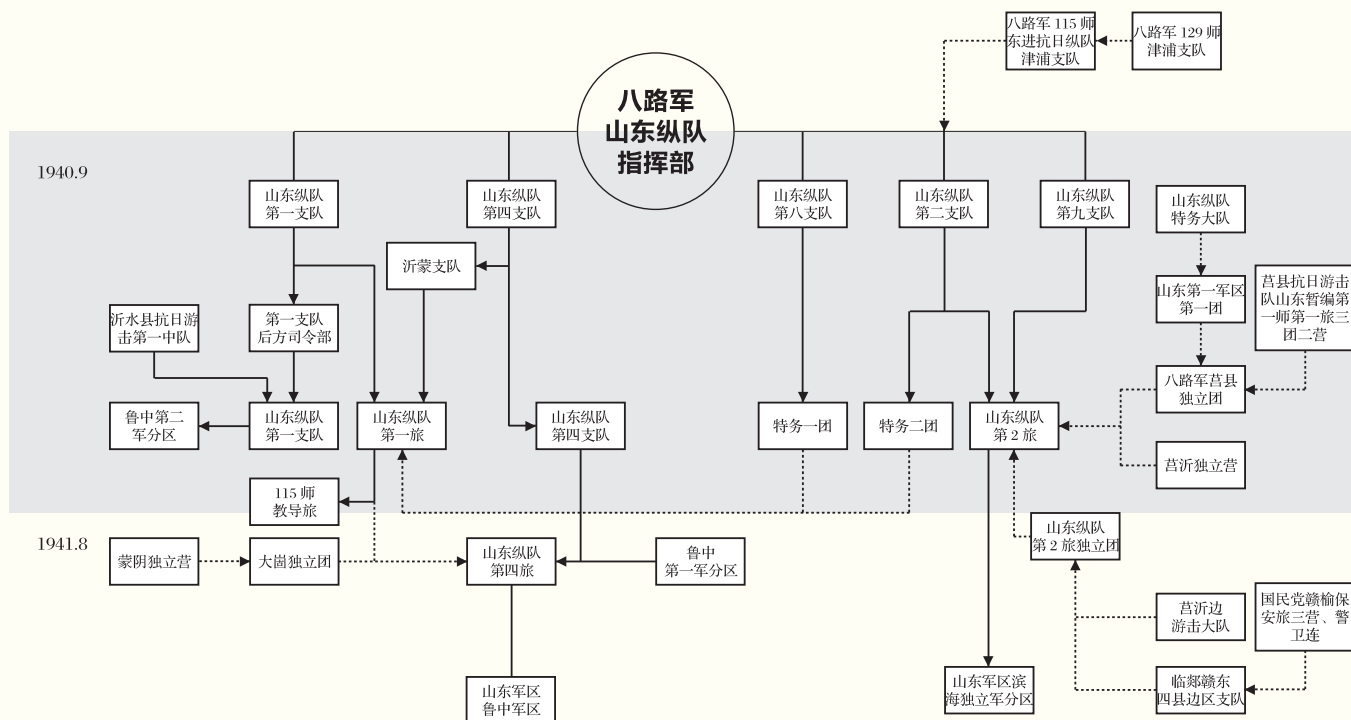


高 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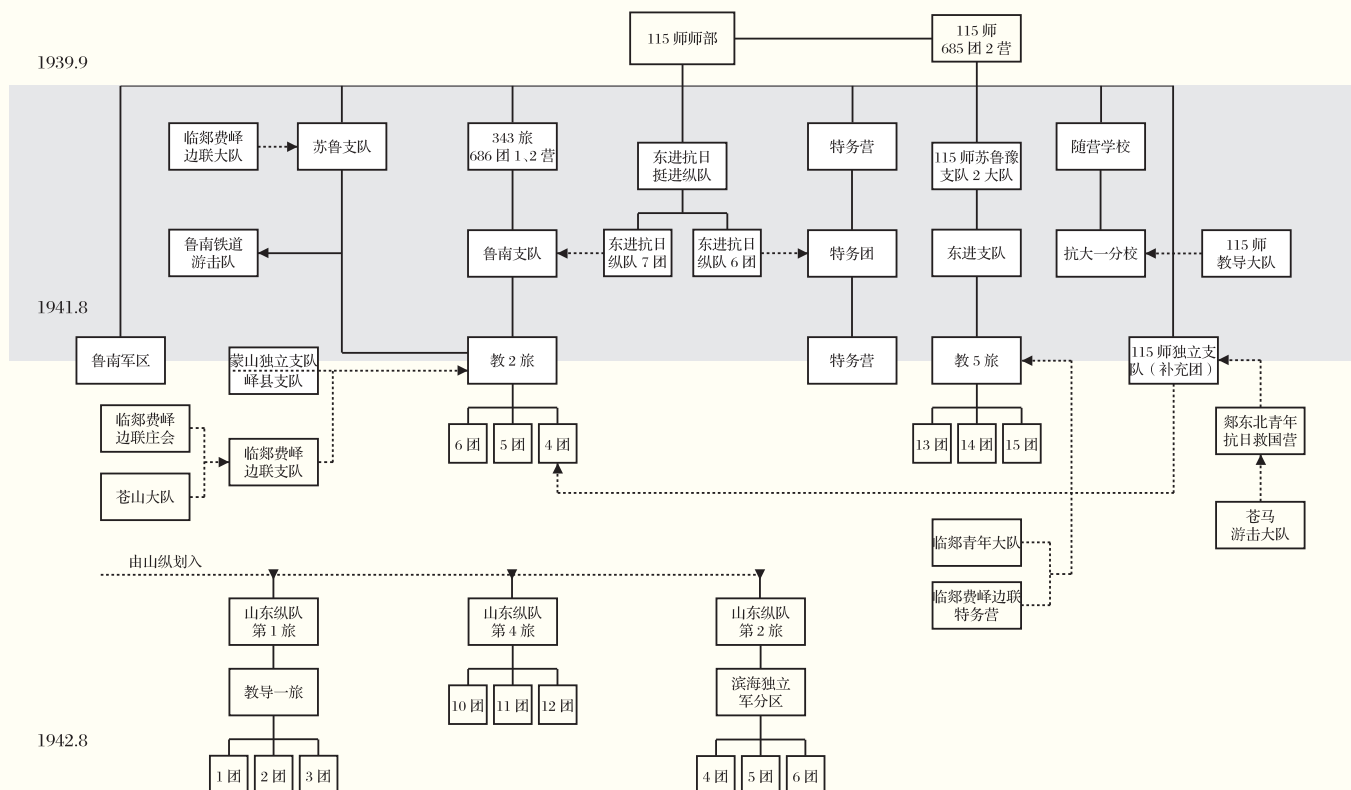
山东纵队 1



山东纵队 2



115 师



圣洁祥云

——王圣祥“自传”

刘凤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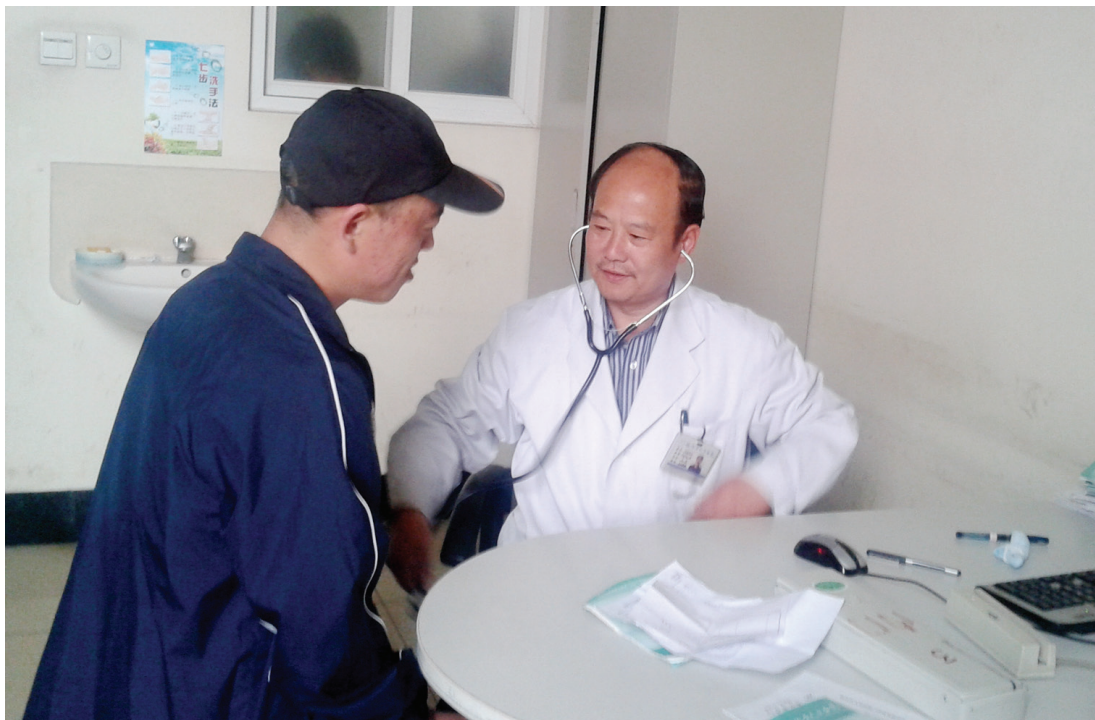
题记：圣祥先生是一位十分谦逊又相当认真勤恳之人。本文原为其自传，承蒙其委托，笔者在拜读之时仅将内容作了一些简单整理，并为方便表达对其敬意，改为第三人称。未敢掠美，故副题仍标示为“自传”。

蓝天上，最美丽的风景之一是圣洁祥云。它兆示着安康福瑞，寄托着万象祈愿。

社会中，最崇高的行业之一是医坛杏林。它肩负着救死扶伤，实行着至高人道。

权钱势利身外物，健康才是真幸福，而且是无价财富，是人间百姓夙求。一位尽心竭力为他人送健康、谋幸福、德艺双馨的医者，正恰如一片给芸芸众生特别是患者带来福音的“圣洁祥云”。

或许是天意，或许是命缘，当然更是因为有志有为者受“不负盛名”之激励，王圣祥这个名字，本身就蕴涵与散发着一股“圣洁祥云”之气，而这与他的医生职业、骄人成就、高风大德更是浑然天成，相得益彰。他是临沂市人民医院内分泌一科主任、主任医师，市医学会首届内分泌糖尿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省糖尿病学会委员。他个头不高，却是内分泌专业的高手、医坛“达人”；名气甚大，却温良恭俭让，一付谦谦君子之风；年过“知天命”，却兢兢业业，孜孜不倦，思维与辨析透着机敏与睿智。把他比作一片“圣洁祥云”，更不是虚赋盛名。“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在临沂及周边地方广泛流传的关于王圣祥的一句句赞誉之辞及一件件感人故事，象“要降糖找圣祥”，“治甲亢是高手”，“救助流浪老人”，“为糖尿病足老人修脚”等等，乃是最好的例证，且俯拾皆是，不一而足……



“要降糖找圣祥”

前些年，一则手机短信相当“雷人”：我们乡下人刚刚吃上糖，你们城里人开始尿糖了。其实，被雷的绝不仅仅是城里人。糖尿病是最常见的内分泌疾病，病程长，并发症多，病情复杂，危害严重，患者痛苦大，有“富贵病”与“小癌症”之说。有关资料显示，在慢性病中，其患者总数仅次于心脑血管与乙肝疾病而位列第三，对人体的危害甚至高于前者。如何攻克这一人类健康的大敌与顽症，成为患者的急切期盼，医者的重大课题。

——怎么才能把异常高的血糖降下去？

——“要降糖，找圣祥！”

这句不胫而走的话语，是临沂一位有名的企业家为王圣祥创作的“广告”，也是各县区及周边地区广大“糖友”赠给他的最珍贵的“礼物”。

王圣祥从事于内分泌专业特别是糖尿病的研究与诊治，整整30余载，尤其是1990年后实现了突破。是年11月，他被领导批准到上海瑞金医院内分泌专业进修班学习。其时，正在为解决温饱而奋斗的沂蒙老乡们，满心渴望的是能“吃上糖”、过上甜蜜蜜的日子，而内分泌专业在临沂也还是个“冷门”，没几个医生感兴趣、愿意干。然而在大城市的大医院中，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北京、上海等正在“热起”，一般的医生还干不上这个专业。在瑞金医院，他从师于全国内分泌学会主委、大教授、大专家陈家伦先生，学艺整整1年，更加打牢了专业基础，全面掌握了内分泌特别是糖尿病的诊疗技术，为“祥云起飞”扎上了坚实的翅膀。机遇总是垂青于那些准备超前与充分的人。回院不久，医院在大内科中设立内分泌专业，又为“祥云腾空”提供了强劲东风。其间，他曾先后到韩国、日本、香港、新加坡、新西兰、德国、法国等地参观学习内分泌糖尿病专业技术，了解国际动态与先进方式方法，极大地丰富了知识面。数十年的锤炼与磨砺，使这片“祥云”越飞越高。

今天，王圣祥在治疗糖尿病上，已经探索了一条成功的路子，创建了一套完整的方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有自己很多的“独家秘笈”，人皆称奇。试举一二：

——“几分钱的药片治大病”。即针对不同个例，采用优选方法。在对不同患者的具体病情作出明确诊断后，因人制宜，对症下药。同时，他又十分为病人着想，开的药方总是“最简单”：一般只有一两种很便宜的药。有一次，他为一位农民开了1瓶不到4元的降糖药，却受到病人的质疑：“我得病这么多年，吃过几千元的药都不管用，你开这点便宜药还不够我的路费，别糊弄咱老百姓了。”他心平气和地说：“贵药不一定治病，便宜药只要对症，照样有效，请您试试看。”一个星期后，这位喜出望外的病人又来到门诊，一到门口就情不自禁地对“糖友”讲：“王医生真是位好医生，没想到三四分钱的一片药就如此神效，俺真服了！”

——“几杯温开水救治无数高糖高渗昏迷病人”。众所周知糖尿病人有“三多一少”症状：即多饮、多尿、多食、体重下降，而不少患者在限制饮水的情况下却仍然多尿，这就导致了患者出现严重的高血糖高渗性昏迷，如不及时抢救，病人就会迅速死亡。这种高渗昏迷的抢救，快速大量补液是关键，但仅以静脉补液，进量小而且速度慢；补液的性质更受限，只能补等渗的5%葡萄糖及生理盐水，而这两种液体既含糖又含氯化钠，大量补液，必然反过来加重高糖高渗昏迷。若干年来，这对矛盾一直是困扰内分泌医生的难题。王圣祥不仅有扎实的基本功，更有着坚持不懈的钻劲与独到的悟性。1992年，他在抢救一位高渗未昏迷仅神志恍惚的患者时，让病人大量饮用温开水，竟然一举获得成功。王圣祥从中得到重大启发，敏锐地想到：尽管昏迷者不能饮水，但是可

以通过插胃管注入大量的温开水，解决充分补液的关键问题呀！几杯温开水，一下攻克了糖尿病第一急危症抢救的重大难题。后来，他历时5年，开展了“管饲温开水抢救糖尿病高渗性昏迷临床研究”，经过省级专家鉴定达到国内领先水平。该成果获1997年山东省医学科技进步奖，其论文发表在《实用糖尿病杂志》上。近20年来，此项技术已被全国各地同道们推广应用，不知救活了多少这种病人。由此，王圣祥不仅在临沂、在山东省，而且在全国糖尿病学界也声名鹊起，有了相当的知名度。

王圣祥不仅有着“几分钱治大病”、“几杯水救人命”的绝活，在治疗糖尿病的其他急性危重并发症如酮症酸中毒、乳酸性酸中毒、低血糖昏迷等等方面，其抢救成功率也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对糖尿病眼病、肾病、周围神经病变，尤其是糖尿病足的诊疗上，同样领先于国内水平。对糖尿病足，他在实行传统综合治疗基础上，积极开展VSD（全封闭持续负压吸引术）、血管介入（球囊扩张、支架）等技术，并在我市率先开展了自体干细胞治疗术等。

“要降糖，找圣祥”，看似“广告”，实则是对这片“圣洁祥云”的赞誉。

“治甲亢是高手”

在广大群众的口碑中，王圣祥不仅是糖尿病的克星，也是治疗甲亢的高手。

所谓“甲亢”，是人体颈前气管旁甲状腺功能亢进，分泌过多的甲状腺激素所导致的一群症状。治甲亢，国内外公认的治疗方法有3种：一是使用抗甲状腺药物，口服方便、安全有效价廉，适合大多数甲亢患者。但因其疗程长（1.5—2年），治愈率低（50%左右），常引起过敏、白细胞减少、肝功损害等而受到限制。二是手术治疗，虽治愈率高（80%），但因创伤大、费用高、难免引起嗜哑、抽风、甲低等并发症，而难为患者接受。三是口服¹³¹碘，是目前国内外公认的首选方法，优点是安全、简便、治愈率高达90%以上，而且恢复快，除甲状腺功能减退外一般无不良反应，而甲低可以用甲状腺激素纠正，不影响发育和生育。

为使广大患者尽早摆脱此种疾病的折磨，王圣祥也做了大量探索与研究。他根据甲亢患者的个体化治疗原则，灵活选择“三大疗法”。特别是他于2000年去华西医科大学核医学科培训班学习，回来后立即带头与本院核医学科联合开展¹³¹碘治疗甲亢、甲状腺高功能腺瘤及甲癌。由于这种方法优点多，缺点少，涉及多学科合作，又只能在三甲医院开展，因此，吸引了大量处于基层及周边地区、甚至省外的患者前来就诊。特别受到那些口服药物久治不愈、复发又不愿手术、或手术后复发的患者的欢迎和称赞。10余年来，王圣祥及其团队用¹³¹碘治愈了上万例甲亢病人，治愈率达95%以上。据了解，临沂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与核医学科“联合模式”在全省是第一家，得到山东省内分泌糖尿病学会原主委、山医附院王德全教授的充分肯定和推广运用。

2001年某天，从急诊科转来一位生命垂危的农村中年妇女，深度昏迷、呼吸急促、有痰鸣音、黄疸、心律失常、心衰……，王圣祥立即率领同事们实施紧急抢救，并邀请全院相关6个科室的专家会诊：患者病情极危重且非常复杂，不仅患有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并且患甲亢危象及甲亢性心脏病，还合并双肺结核。根据诊断，王圣祥迅速制定了救治方案：先救命，抢救昏迷、呼吸衰竭及心力衰竭；同步抢救酮症酸中毒及甲亢危象；积极治疗甲亢及肺结核。治疗第三天，患者神志逐渐清醒；第七天，酸中毒及危象缓解；两周后，进入恢复期的治疗。此时，他们针对患者甲亢，采取决定性¹³¹碘治疗，然后转结核病院继续治疗肺结核。最后，患者终于康复出院，其丈夫携子女专程给王圣祥他们送来一面写着“华佗在世，妙手回春”的锦旗，以谢救命之恩。

现在，因大多数基层医院已掌握了糖尿病的防治方法，并且已有“中国糖尿病诊疗

指南”做依据，因此，找王圣治疗甲亢者已远超过治疗糖尿病的病人。

王圣祥在治疗其他内分泌疾病上也有独到建树。2011年12月，临沂监狱某干部家属在网站上发给王圣祥一封信，全文如下：“王医生，您好！我妈妈是今年4月听糖尿病讲座时被您看出来脑垂体瘤复发的。我们做儿女的疏忽，一直不知道妈妈越来越高的血糖是因为垂体瘤作怪，手术虽然不是您做的，但却是因为您，我妈妈才找到病根，在济南手术后又去您那里治疗了一段时间。现在我妈妈好几年的高血压症状消失了，血糖也比之前下降许多。妈妈一直在我们面前说多亏了您，她才减少了许多折磨，才知道这几十年的病痛从何而来，非常感谢您！所有大夫都应是您这样，不仅医术高超，还胸襟宽广，耐心细致，您高尚的医德点亮了众多病患的生命之灯。衷心地感谢您、祝福您！感恩！”

这些年来，王圣祥在专业上可以说硕果累累，共获省市科技进步奖2项，国家发明专利1项，在省级以上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3篇，主编医学专著2部。

“治甲亢是高手”，正是对这位内分泌专家的全面褒奖。

“媒体上传口碑”

2003年冬天，《沂蒙晚报》曾经报道过一则感人的故事：

有一位昏迷的流浪老人被民警送到急救中心。王圣祥应邀参加紧急会诊。当他确诊老人系糖尿病昏迷并患有多种并发症，又了解到是位“三无”病人时，他二话不讲，毅然把老人转入他所在的内分泌科一病区，立即组织抢救。等老人清醒后，王圣祥才得知：老人叫范金梅，费县人，离异几十年，在临沂城附近靠一个有残疾的小女乞讨为生，露宿街头，患糖尿病多年没钱治疗。老人身边无依无靠，王圣祥却有满腔仁心爱心热心。他与同事们留下了老人，而且一留就是整整3个月，治疗费全免，吃穿靠医护的捐助。春暖花开的季节，老人康复了。王圣祥和赵立明医生亲自打的，把老人和残疾的小女儿送回她多年失去联系的大女儿家，又留下一些药品。对待自己的亲生母亲不过如此，老人感激得老泪纵横。

2007年，《沂蒙晚报》又报道了“一位75岁老人的自述”：

一位从东北回临沂探亲的杨大伯，因患糖尿病坏足前来住院。前后两个多月时间，王圣祥和他的同事刘红艳医生不怕脏不嫌臭，亲自为老人洗脚，剪趾甲，处理溃烂的伤口。而当时的王圣祥身为科室主要负责人、知名专家，刘红艳医生则当时已怀孕6个月。老人感动得无以复加，康复后亲自到院长办公室对值班的人员讲：“我不会写，但我会说，我想把自己在内分泌一科住院的见闻感受讲一讲：‘王主任是我遇到的最好的医生，他不仅对我好，对我同房间的病友一样好！有一位糖尿病坏足的病友从外地转来，正是中午快下班的时候，王主任二话没说，亲自为病友处理又脏又臭的坏足，忙活了一个多小时，王主任累得满头大汗，直不起腰。更令人感动的是刘红艳医生，怀孕挺着大肚子，为我洗脚换药。我活了一辈子，给我洗脚的，除了我母亲，就是王主任和刘医生。王主任个子不高，但所做的事却很伟大！他和他的团队精神，就是当代的白求恩精神！”

王圣祥的名字，也多次出现在“好大夫”网站上。2008年10月，天津大港一位患者家属在该网站发帖：“我母亲在山东临沂老家探亲期间，突发糖尿病酸中毒及肾衰竭，呼吸、心跳一度停止。多亏王主任及全体医师、护士全力抢救，及时挽救了我母亲的生命，并以其高超的医术，在极短的时间内将我母亲的血糖、血压等指标恢复稳定到正常。在住院的短短5天之内，王主任每天亲自询问、了解我母亲的病情，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并亲自为我母亲清理包扎腿上的伤口，令我们亲属感动、感激，这份恩情让我们终身难忘！”

2011年11月，临沂市农行某职工在该网站上发帖说到：“王主任医术高明，医德非常好。我在今年3月做了甲癌手术。术后5月份找到王主任。由于当时住院的人很多，王主任把他自己的办公室给我做了病房。我与王主任素不相识，我没有想到他对病人这么好。……他非常认真地给我做检查，果断的给我制定治疗方案，积极地催促核医学科给我安排131碘治疗，每天都到我病床前询问病情，随时给我调整药量，态度和蔼可亲。我老公为了感谢他送他购物卡，被他坚决拒绝了。他说只要病人康复比送他什么都好，都让他高兴。现在我检查各项指标都很正常，已经康复了。谢谢王主任！”

各种媒体的报道表彰，也如一座敬慕钦佩的口碑。而王圣祥则更似一片圣洁的祥云，以其崇高的医德之辉，映照温暖着人们的心胸。

或许是他农民出身的经历，也许是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教，还是医生职业的修养，王圣祥天生就有一颗仁爱之心，把人间真善美和诚信义毫不吝啬地奉献给病人和弱者。

他对病人一视同仁。无论是“权贵”富人，还是山村穷苦农民；不论是熟人还是首次就诊，他都一样地热情问候，精心检查，耐心说明，总是让痛苦而来的患者满意而归。

他对患者急人所急。为了减轻候诊排队长久的压力，他常常提前半小时上岗，延迟1小时下班，加班加点已成为习惯。

他对弱者尤其呵护。对年事已高的老人，行动不便的孕妇，路途遥远的患者等，他只要看见知道了，都要安排他们优先就诊。

他对贫者无私奉献。对看完病却没钱拿药，或没有路费的农民，他常常慷慨相助，从50元到100元。但是人心换人心，有一位来自苍山农村的病人，专门跑到医院向他还钱，还送给他一袋子大蒜。然而王圣祥却坚持只收下大蒜，无论如何也没要所还之钱。

他对自己近乎苛刻。30年来，他的生活轨迹基本是“两点一线”——只要不出发，就是从家中到医院，无限往复。而他的专家门诊，用同事们的话和自己的体验，可谓是“战斗的早晨，紧张的中午，疲劳的晚上”。他的“老黄牛精神”受到广大患者的称颂，也得到同事们的钦佩。难怪每逢他出诊，总是门庭若市；如不预约挂号，找他看病确实很难。坐门诊，他最忙；在病房，他更忙。带头查房之余，还要接诊来自门诊的病人，特别是那些慕名而来又不知他出诊时间的人……

他对朋友亦以德相待。王圣祥天天对患者应接不暇，对他而言，时间就是健康，或者就是生命。笔者占用其宝贵时间闲聊，确实于心不忍。然一旦如约，他仍然礼仪有加，宾至如归。尤其让笔者感动者，作为一名大专家，他一意坚持打的，冒雨亲自前来接送，让人备感其诚挚与厚道。

圣洁者，大仁德；祥云者，播福祉。把王圣祥比作一片“圣洁祥云”，不是溢美之辞。

“从士兵到将军”

王圣祥有今天的名声和成功，还得从他的出身、学历、从医路程说起。用他自己的说法，可以概括为两句话：

从医士到主任医师——专业上。

从“士兵”到“将军”——行政上。

而医士与主任医师，也可姑且比喻为专业上的“士兵与将军”。都是一个相当大的人生跨度，相当大的事业台阶。这其中，包涵着无数的艰辛，不息的奋斗，顽强的开拓，难忘的故事。

1959年10月，王圣祥出生于地处鲁苏交界、临沭县蛟龙镇后利城村的一个农民家

庭里。父亲是恪守身正为范、学高为师的信条、兢兢业业的山村小学教师，母亲是一位善良勤劳的农村妇女。他从小受到传统的良好家教，追求礼义诚信，艰苦朴素，勤奋好学。从小学到高中毕业的10年，年年是“三好学生”。放学回家，帮母亲挑水劈柴，洗衣做饭，推磨烙煎饼，样样会干。放假期间，积极参加生产劳动，跟农民大叔学会了耕、种、锄、割、肩挑、手推等所有农活。而他记得最牢、学得最到位的，是老人立下的两条家训：“学习跟好的比，吃穿跟差的比”；“人行好事，莫问前程！”这两句家训，使他至今受益。

1977年秋，他刚满18周岁，高中毕业后已经在家务农两年。看到同学们一个个当了工人，或被推荐上了大学，当了民师……他开始产生了那个时代所有“我们村里的年青人”都曾有过的美好憧憬。他不安心也不甘心打一辈子庄户了。他悄悄地作了两手准备：一边报名参军入伍，一边复习准备高考。为了比较有把握地考上学，他给自己留了点“保险系数”，背着高中班主任老师，把报大专的志愿改成了报中专。然而就是这一改，让他不得不艰难地开始了从“士兵”走向“将军”的人生之旅。

1978年春天，他被批准入伍，已经穿上了绿军装，正准备当个“志在四方”的铁道兵。几乎同时，却又接到了临沂卫校医士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双喜临门，让这位农村青年飘飘然，不知如何选择是好。武装部一位前辈既爱兵，也爱才，让他选择了后者：上完学，当大夫，进城去，吃“国库”。

1980年12月，王圣祥从临沂卫校医士专业毕业。他算是个“幸运儿”，被分配到全地区的最高医疗机构——临沂地区人民医院。但是，这又注定他要当一个“苦孩子”：一个农村出来的小小中专生，在大医院大内科当医生，可想而知会有多难！一个专业职级最低层的医士，要想从“象牙之塔”的底层“爬”出来，简直如同梦想！曾先后有3次领导与他之间的谈话，让他深深感到了巨大压力与窘迫。第一次，1982年，领导找他谈话，让他改行，学“营养”到伙房工作，被他拒绝了。第2次，1984年，院领导换届，又找他谈话，让他改行到医务科当秘书，又被他拒绝了。第3次，是他找科领导“谈话”，要求进修学习B超，却被婉言拒绝了。这3件事，从心灵深处触动了他，却没有把他压倒，反而激发、推动了他继续升学深造、“拿高文凭”的志气与决心。为了在大内科生存，1985年9月，他刚刚当了几天爸爸，便撇下心爱的孩子，通过成人高考，踏进了沂水医专的大门，全脱产学习了3年。毕业后重返原岗位时，终于和以前的大专生平齐了“肩膀头”，他的职称也由医士晋升了医师。两年之后，他在同龄同事中才又最后一位到上级医院进修。回院后，他风风火火创事业，踏踏实实做医生。好钢需要反复炼，真金终有闪光时。几年后，他就凭借娴熟的临床技术，让人折服的科研成果，分别于1993、2001年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和副主任医师。两次破格，使他从专业上的“士兵”一跃而为“准将军”，让人刮目相看，啧啧称叹。

然而，王圣祥并没有就此止步。他的目标是真正的“将军”。他又分别于2003、2005年经过4年的努力学习，终于拿到了山东大学临床医学本科毕业证书、青岛大学医学院硕士研究生班结业证书。

2006年12月18日，当得到省高评委通过他晋升主任医师的消息后，他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兴奋，开怀一醉，泪流满面。他不是一个看重功名利禄的人，他也不完全把文凭等同于水平。也许，最终晋升为主任医师，这对于一个起点高的大学本科毕业生来说，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可对他这位起点低的中专生来说，就截然不同了。这泪水，是他26年心血和汗水酿成的，充满了他人生中的酸甜苦辣咸！

对自己的人生与事业经历，王圣祥有独到的体会，这就是：“寒窗虽苦，苦中有乐，学而有长，长为新用。行医虽难，酸中有甜，有失有得，有败有成。对成功，要懂得珍惜和热爱。而成功又是新的起点。正所谓学海无涯苦作舟，登上高处更有峰！”



他不但在专业上，而且在团队中，也同样成功地从一个“士兵”走上了“将军”之位。有人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可王圣祥却说：“要当好将军，先要当好士兵”。在科里，他从最底层的“兵”扎扎实实地埋头苦干，到担任科主任、主任委员，经历了20余年。首先是当了17年的好“士兵”，又在“将军”的位置干了13年。这13年，也是他为学科发展，为集体操劳，关心爱护同事，有口皆碑的13年。他多次被评为医院劳模，先进工作者，最佳医生及优秀共产党员。2003年春天，当“非典”袭来时，他担任抗击“非典”第一梯队队长，冒着生命危险，连续两周奋战在没有硝烟第一线。面对大量来自广州、北京的发热病人，他认真仔细地排查疑似“非典”病人……战斗结束后，他被中共临沂市委授予“抗击非典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在他的带领下，全市内分泌专业队伍不断壮大，甲亢、糖尿病治疗防治与研究事业，越来越红火。他所在的内分泌学科建设已大步迈入全省甚至全国同级学科的前列。2011年，在“一科三室”的基础上又成立了甲状腺病研究所和糖尿病研究所，专业医师已达30余人，编制床位130余张。他和他的团队正以崭新的姿态迎接未来的挑战。

对自己的人生与事业经历，王圣祥还有两句十分深刻的概括：

“22年寒窗苦，一步一个台阶；32年行医难，一步一个足迹。”

王圣祥，这片为民造福的圣洁的祥云，正是如此腾起的。我们祝愿他更加绚丽多彩，以自己的圣洁，为大众百姓带来更多的健康幸福，带来更大的如意吉祥！



管虎：电视剧当饭吃 电影当酒喝

高雪萍



管虎，祖籍平邑县。1968年8月出生，1991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父亲是老演员管宗祥，妻子是女演员梁静。曾被称为第六代电影导演中的怪才，与贾樟柯、王小帅等同为中国第六代导演代表人物，作品犀利、先锋，有着强烈的人文关怀和现实批判性，视听技巧纯熟并独具特色。

24岁执导处女作《头发乱了》，记录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年轻人的迷茫与寻找；电影《西施眼》获得2002年夏威夷国际电影亚洲电影评审团奖（NETPAC）、第十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受欢迎影片。其作品《再见，我们的1948》（1999年）、《上车，走吧！》（2000年）等，均广受赞誉。2009年，管虎导演的《斗牛》入围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主演黄渤凭借此片同年获得金马奖最佳男主角。管虎同时也是中国内地最有商业号召力和品质保证的电视剧导演。2001年的《黑洞》、2005年的《生存之民工》、2008年的《活着，真好》、2009年《沂蒙》等，均为电视台收视力作。

虽然并没出生在小山村，他却总是喜欢拍乡土味浓郁的影视题材，就像是一种寻根的本能。人总是会对自己遥远的出身产生浪漫联想，尤其是在那个长于出产传奇的年代。管虎的父亲管宗祥生于平邑县仲村，四十年代参加八路军，进入文工团，父亲的经历，或许就是后来在管虎脑海里浮现出的那些发生在遥远地方的故事的起源。比如《斗牛》，再比如《杀生》。

刚毕业没多久，管虎作为新生代导演，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新锐精神，自筹资金拍摄了《头发乱了》。在这部低廉成本的处女作中，体现着他关心生活，充满激情。影片对身边的人和事采取写实态度，一反第五代符号化过重，过分刻意强调画面造型而带来的死板僵硬的毛病，将北京的胡同从画面布局、光线控制到场景的切换都注入一种充满活力的流动真实感，影片还选用非职业演员出演摇滚歌手及其他人物。这是一部年轻导演表现自我的片子，其中也不乏有些躁动不安。

影片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上世纪80年代末的北京城，年轻的姑娘叶彤考取了北京的医学院，回到阔别十几年的地方。她从奢华的大街走进狭窄的胡同，发现那里还是老样子。在那血风腥雨的动乱年代里，叶彤和郑卫东、郑卫萍姐弟及迟萱、雷兵几个孩子在这里度过了他们的童年。后来，叶彤的父亲受到冲击，举家搬到广州。现在，她又回到这条胡同，见到了儿时的朋友。卫东当上了片儿警，迟萱发了点财，雷兵刚从监狱逃出。每个人都有了不小的变化。在学院举行的联欢会上，叶彤接触到一个外来摇滚乐队，她被

乐队主唱彭威所吸引，主动为他们寻找排练场所。迟萱把他的仓库借给了彭威。卫东和彭威是中学同学，关系一直不好，这一次二人又因居民对排练不满发生冲突。叶彤不知如何是好。卫东也和雷兵有宿怨：雷兵出逃，差点儿被卫东抓获。医学院的压抑生活使叶彤不快，她一有时间就和彭威在一起，在音乐中寻找慰藉。卫萍离了婚，她要求叶彤帮她做流产手术，但一上手术台，她又改变了主意，决定留下孩子。卫东犹豫不决地向叶彤表达了一点意思，但叶彤决定不明确某种事，对学业和生活都无所谓，甚至在她发现彭威与另一女子同居也漠然置之，只是从此脸上少了笑容。雷兵与卫东终于碰面，在激烈的争斗中，雷兵扎伤了卫东，自己也从桥上失足落下摔死。叶彤决定退学，她去医院看望卫东。卫萍生下了孩子。彭威由于手头拮据，解散了乐队，只身远走他方。叶彤退了学，在走之前的校庆上，她唱了一首与乐队排练已久而没能唱的摇滚歌曲。叶彤最后瞥了一眼她逗留一年的城市。她走时，几乎掉了泪，背后传来的是朋友们为她送行的口哨声。

《头发乱了》荣获第一届大学生电影节艺术创新奖；日本东京电影节票房第一名；参展法国蒙比力埃亚洲电影节，获荣誉市民奖；参展维也纳32界国际电影节。

2011年，管虎执导的电视连续剧《沂蒙》获得第28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导演奖，荣获“第28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一等奖”。《沂蒙》真实再现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沂蒙根据地人民以平实、质朴的情感，超凡的牺牲精神，无私的奉献行动支援人民军队，投身民族解放事业的光辉业绩。

对擅长拍摄小人物的管虎来说，《沂蒙》的拍摄动力是一种呼之欲出的责任感。“在沂蒙山走访后发现，这个以革命老区而闻名的地方，处处保持着战争年代的历史风貌，人们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中对党和八路军的炽热真情。那种质朴而单纯的情感燃起了我们的创作动力。”读完《沂蒙》剧本后，管虎被深深感动了，用他的话说“我读了七遍，每读一遍都会流很多泪水”。但他挑选剧本极其慎重，为确保电视剧拍出后能受到各个层次观众的欢迎，他把《沂蒙》剧本交给了邻居家一位17岁的女孩子阅读，想试试这个剧本能否感动年轻人。数日后，这位小姑娘抱着剧本来到了管虎家，用肯定的语气对管虎说：“管叔叔，我读剧本时流了很多眼泪，你快拍吧！这个电视剧一定能在全国获大奖。”得到了青年人的肯定，管虎还不放心，他还想听听老年人的意见，便把剧本交给了自己的父亲管宗祥。管宗祥是我国著名影视演员，曾在电影《包氏父子》、《祝福》等影视剧中成功塑造过许多重要角色。当年近80高龄的管宗祥读罢剧本后，他不但支持儿子导演这部电视剧，而且明确表示自己一定要在剧中扮演一个角色。既然老年人和年轻人都喜欢这个剧目，管虎对拍摄好《沂蒙》充满了信心，开始组建摄制组，并决心将《沂蒙》拍成中国革命战争历史题材的经典之作。

“革命战争题材的电视剧不好拍，要做到在观众心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更是难上加难，如何把这部剧打造成一部老百姓喜闻乐见且具人性化品质的革命战争剧，成为一个摆在当面的难题。”管虎曾在一次采访中说，这个难题在和一位沂蒙山下渊子崖村的老人聊天之后豁然开朗，“他用最朴素的语言告诉我：南京的国民党兵如果都能像沂蒙山的人这样，鬼子他别说进南京，中国他也不敢来！”

管虎说：“沂蒙山区人民有一种血性，沂蒙山的老乡虽不识字但知大义识大体。”剧中第一主角是迟蓬扮演的于宝珍，“她把最后一粒粮食当做军粮，用最后一块布做军装，送最后一个儿子上战场”，用一个普通沂蒙女人的朴实、善良诠释了沂蒙精神。虽然于宝珍大字不识一个，但处事果断，脑瓜也好使，村里谁家还剩多少余粮、谁家里还有多少布料，她都用自己的符号记得清清楚楚。

管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过，对电视剧，严格挑剔题材，“无法把不喜欢

变成喜欢”，而对电影，没法指着那个吃饭，如果是，则“无法维持内心”。管虎说谁也不能拒绝好看，但好看完了，乐完了，观众走出影院去饭馆，“这不是电影”。“最起码，要有一点琢磨。酸楚、不舒服、小震撼、或者被打了一拳。”

与《沂蒙》套拍的《斗牛》，2009年获得第4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获得了包括最佳导演在内的七项提名，黄渤因此片成为金马影帝。

用管虎的话说，《斗牛》是按照他的电影观拍出来的，好看最重要，但又不是嘻嘻哈哈的商业电影。《斗牛》的灵感是突如其来。在沂蒙山区拍电视剧时，他在老乡口中听到了一个故事，说村里有一个人，在1937年养了一头奶牛，不但避过了日本鬼子，还在全村人几乎死光的情况下一直活了下来。9月11日，该片在中国内地和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一种关注”单元公映。负责选片的法国电影人杜阿梅女士表示：“在去年延续至今的金融风暴大环境下，大片仍然有人投资，小片还能做，但出现了投资规模中等的电影的真空。《斗牛》就是中等片的好例子。它是一部很不错的电影。”

这个充满传奇感的故事在管虎的电影中，最终呈现为了一幕充满悲悯意味的黑色喜剧和人性寓言。一个人，一座空村，一只母牛，就是整个故事的载体，日本人、难民、国民党轮流登上舞台，你来我往，乒乒乓乓，最终却什么都没有剩下。在这个农民眼中看出去的世界是如此血腥、滑稽而荒谬，人与人互相残杀，没有原因，没有理由，背弃理智，离弃道义。他绝望心碎，悲愤莫名，却从不肯放弃，固执地坚守着一句承诺，直到最后。

管虎导演自称“电视剧当饭吃，电影当酒喝”，这次他应该甘之若饴了一把。甚至有人评论说，在《斗牛》中可以找到《阿甘正传》的影子：影片都用耿直倔强、单纯又有拼劲的人做男主角，男主角都有一种精神寄托的象征物陪伴左右，比如牛二的那头大奶牛；阿甘的好腿脚（或者那根白羽毛）。两部影片都如出一辙地利用了“小人物反映时代变迁和更迭”的模式。《阿甘》是此类模式的泰斗，一些乒乓球的桥段，加上“小球推动大球转”；《斗牛》也用牛二的遭遇，清楚地交待了从抗战时期到解放战争的时代变迁。两位倔强的男主角心中都有一种永恒的信念，至死不渝。都属于悲喜剧作品，同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悲剧式白描，又是“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的跳跃式喜剧玩笑，悲喜交加，笑中泛泪。



省史志办副主任翟世林来临沂调研。6月5~6日，省史志办副主任翟世林一行来临沂，就贯彻落实全省史志工作会议精神、方志馆建设及方志期刊建设情况进行专题调研。6日上午，调研组在天元商务大厦召开研讨会，市史志办主任朱海涛、总编辑王瑞柱、副主任伊永航就相关工作作了详细汇报，并对《山东史志》提出了意见和建议。翟世林对临沂史志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要求市史志办在抓紧时间、保质保量地完成修志任务的同时，抓住公共文化场馆建设的机遇，完成方志馆建设。

全市史志工作会议召开。全市史志工作会议6月14日召开，副市长赵爱华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市史志办主任朱海涛作了工作报告，市政府副秘书长秦鸿伟主持会议。

赵爱华在会上要求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史志工作的重要作用，增强做好史志工作的责任感；明确任务职责，强力推进，按时完成第二轮修志任务，加快推进方志馆建设，积极开发地方志资源，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加强组织领导，落实经费，强化责任，加大督导检查力度，积极为史志工作提供有力保障；树立精品意识，力争编纂一流志书。

市史志办主任朱海涛在会上传达了全省史志工作会议精神，回顾总结了前段时期的全市史志工作，要求全市史志工作者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围绕“服务文化名城建设”这一目标，突出落实“两个条例”、推进“二轮修志”两个重点，抓好年鉴编纂、信息化与方志馆建设、历史文化和市情研究开发三项工作，促进全市史志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临沂市河东区华野主题公园史料组赴南京、徐州等地考察。5月

29~31日，临沂市河东区华东野战军诞生地主题公园项目建设领导小组史料组，就华东野战军史料征集工作赴南京、徐州等地考察。通过对南京军区档案馆、南京军区军史馆和徐州市淮海战役纪念馆的实地考察，史料组在有关华东野战军军史的重要文献、华东野战军军史展示资料以及纪念馆的陈设布局上取得一定收获。

沂南县史志办举办纪念成立30周年座谈会。5月18日，沂南县史志办公室举行纪念沂南县地方史志办公室成立30周年座谈会，回顾过去，审视现在，展望未来。市史志办副调研员于芹，沂南县政府党组成员、一中党总支书记姜自忠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市史志办积极开展“慈心一日捐”活动。5月24日，市史志办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开展“慈心一日捐”活动，全体人员踊跃捐款，支持慈善事业。

沂水县积极推进基层志书编纂工作。近日，《沂水县人民法院志》、《沂水镇志》、《泉庄镇志》、《西朱家庄村志》等志书编纂工作先后启动。其中，《沂水镇志》为全县首部乡镇志，《西朱家庄村志》为全县首部村志。

临沭县史志办到江苏东海考察交流史志工作。6月4日，临沭县史志办主任王敬涛一行5人到江苏省东海县考察交流史志工作。临沭、东海两县史志办就县志续修、年鉴编纂、网站建设等工作进行了深入探讨交流，并交换了部分志书。东海县史志办主任王忠新介绍了东海史志工作开展情况。双方还就创新史志工作、发挥读志用志作用和加强业务交流等交换意见和看法。

曹玉海纪念馆隆重开馆。6月27日，曹玉海纪念馆在莒南县大店镇开馆。纪念馆位于大店镇山东省政府旧

址暨八路军115师司令部旧址，由莒南县史志办负责设计、施工及布展。馆名由原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将军题写。纪念馆面积375平方米，以从沂蒙山区走出的抗美援朝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曹玉海生平为基本陈列，分前言、苦难深重的童年、为抗日两次参军、解放战争中的英雄、抗美援朝第三次入伍、血战350.3高地、崇高的荣誉、英名永存和后记等九部分。展出历史照片120余幅，文物几十件，辅以第四次战役350.3高地复原光电沙盘、实物展示、曹玉海电视纪实片等现代化陈列设施，生动地展示了曹玉海战斗的一生。

蒙阴县史志办开展“七一”走访联系活动。6月下旬，蒙阴县史志办贯彻落实县委部署和要求，到第一书记任职单位和盛重工有限公司联系走访党员群众，开展纪念建党92周年活动，扎实推进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

蒙阴县《金山村志》出版发行。6月28日，蒙阴县第二部村志——《金山村志》举行发行仪式。该志编纂历时20个月，共21章，118万字，内有图片1317幅，全彩印刷，上限起自1796年（清嘉庆元年），下限断至2012年，由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市史志办副调研员于芹到莒南调研。7月11日，市史志办副调研员于芹一行到莒南，就《莒南县志》二轮修志情况进行指导并调研史志工作，针对县志稿观点、结构、资料真实性、语言等方面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